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年 第1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目 录

专论·中俄教育年

- 3 维克托·萨多夫尼奇 / 莫斯科大学与中国：
面向未来的合作

国别与区域研究

- 5 翟 崑 包胜勇 / 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
学学科建设访谈录——关于指导思想
与学科定位的讨论

大国关系

- 26 于 滨 / 关于大国竞争的博论
65 庞 珣 曲明珠 / 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
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91 孙 超 / 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秩序重建
的挑战与未来

国际组织

- 126 李孝天 左凤荣 / 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经
济合作：俄罗斯的立场选择逻辑

150 俄文摘要

156 英文摘要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Виктор Садовнич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 Кита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устремленное в будущее (3)

Чжай Кунь, Бао Шэньюн

Интервью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дискуссия о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и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м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5)

Юй Бинь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26)

Пан Сюнь, Цюй Минчжу

Влияние примен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 украин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65)

Сунь Чао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91)

Ли Сяотянь, Цзо Фэнжун

Углуб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логика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126)

Аннотации (15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6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Viktor Sadovnichy

The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and China: Future-Oriented Cooperation (3)

Zhai Kun, Bao Shengyong

Interview on Discipline-Building of China'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A Discussion on Guiding Principles and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5)

Yu Bin

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reatise: A Critique (26)

Pang Xun, Qu Mingzhu

Impacts of AI's Involvement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Great Power Relations (65)

Sun Chao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Rebuild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ami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91)

Li Xiaotian, Zuo Fengrong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The Logic behind Russia's Choice of Position..... (126)

Abstracts..... (156)

专论·中俄教育年

莫斯科大学与中国：面向未来的合作

维克托·萨多夫尼奇*

作为一所拥有 270 年历史的高等学府，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以下简称“莫斯科大学”）在 20 世纪中叶开启了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历程。近几十年来，学校在对华合作领域呈现出持续、稳步推进的发展态势。

1957 年 11 月 17 日是历史性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会见了当时在苏联学习中国留学生。现在，俄中两国元首宣布 2026—2027 年为“俄中教育年”，莫斯科大学将与中方合作伙伴携手，积极推动与实施一系列对两国科学与教育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项目。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学生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超过万人。师生间的面对面交流为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专业领域的相互理解奠定了基础。莫斯科大学定期接待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几乎每周一次。这些代表团均致力于推动联合科研与教育合作。其中许多是我们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但也有不少是首次到访莫斯科大学。与此同时，莫斯科大学的代表团也积极出访中国，加强联系。各层次合作协议的研拟与筹备工作正在常态化地进行，涵盖了从学术交流项目、双学位项目到建立联合实验室及科研中心等多个领域。

截至目前，莫斯科大学已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了约 250 项合作协议。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建立的良好互动，确保了双方的合作倡议能够在外交层面获得有力支持。

在众多合作中，一批规模宏大、特色鲜明的联合项目尤为引人注目：2014 年，莫斯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目前，该校在校生近 5000 人，涵盖本硕博共 60 个专业方向。这所

* 维克托·萨多夫尼奇（Виктор Антонович Садовничий），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联合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依托俄罗斯最优质的教育标准，在中国本土培养能够在亚太地区实施双边经济项目的青年专业人才，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对话与相互理解。

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合作的基础不仅源于学者、教师之间的共同志趣，更依托于一系列务实且具有规模影响力的具体项目。其中，俄中数学中心自 2020 年起持续运行；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于 2025 年联合成立了俄中基础科学研究院，下设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五个前沿领域的科研中心。

莫斯科大学特别关注语言能力的培养工作。随着俄语与汉语日益稳健地步入国际通用语行列，学生与专业人士对这两门语言的掌握已经成为深理解与成功协作的关键前提。同样重要的合作方向还包括开展联合研究，以及创办并出版具有全球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以促进前沿经验的深度交流。

自 2023 年起每年 10 月在中国举办的“Nauka+”国际科学节，已成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形式。这一科学节最初由莫斯科大学创立，现已证明是吸引青少年投身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领域的高效平台。

2026 年，俄中综合性大学联盟将迎来成立十周年。十年来，该联盟已发展成为巩固两国顶尖高校联系、推动教育与科研合作的有效平台。此外，俄中大学校长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年。目前，共有 14 个俄中高校专业性联盟正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近年来，俄中科学与教育合作在多边框架内蓬勃发展。例如，莫斯科大学与厦门大学、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数字经济中心，旨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内的项目开发；与青岛大学的伙伴关系及相关合作项目则主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稳步推进。

俄中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2026—2027 年为“俄中教育年”，这为现有项目开辟了崭新愿景，将为深化双方学术交流、提升师生流动性、拓展联合培养项目以及启动俄中高校间新的科研合作项目注入强劲动力。

（翻 译 阳书平，莫斯科大学全球进程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国别与区域研究

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访谈录* ——关于指导思想与学科定位的讨论

翟崑 包胜勇**

【内容提要】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这一战略性新兴学科进入系统建设阶段。目前，全国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布局、师资队伍培养及智库建设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访谈从国家设立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切入，探讨了该学科在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分析了区域国别学在新时代国家战略和智库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实学属性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统筹推进的“三位一体”建设路径。访谈强调，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平等互利的价值观为根基，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访谈还结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实践，探讨了如何平衡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规范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系，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成的使命与担当。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1-0005(21)

* 本文系2025年北京大学学科建设专项课题“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阶段性成果。

** 翟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包胜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优、蒋飒茹对本访谈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这一战略性新兴学科进入系统建设阶段。三年多来，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科布局、师资队伍培养、智库建设、科研项目安排、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总体布局、路径方法与未来方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胜勇教授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翟崑教授进行了学术性访谈。访谈围绕六个主题展开：指导思想与学科定位、三年建设成果与布局、学科建设的内涵、路径与方法论、建设中的问题与困难、提升与改进的思路、未来发展方向与学科展望。访谈兼顾学理高度与实践深度，希望能为全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①

一、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的战略意义

包胜勇：区域国别学从 2022 年 9 月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您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我想就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向您请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为什么要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一级学科目录？换句话说，设立区域国别学这样一个一级学科，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谢谢。

翟 崑：谢谢包老师。非常期待跟您进行深度交流。因为您十多年前就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带领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在非洲、东南亚和南亚开展中国的海外发展研究与实践。用现在区域国别学的行话来说，也是服务国家战略、交叉在地、学用相生的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先行者。多年来，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对话，我也受益良多。

首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对国家内政外交知行合一的认同。国家在治国理政时要知行合一。从“行”的角度来看，在治国理政中，对外战略是很重要的一环；从“知”的角度来看，要深入把握外部世界，就必须实现“知之于外”与“行之于外”的有机结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已经从崛起阶段迈入发挥大国使命的新阶段。习

^① 由于篇幅较长，本刊将分期刊出。

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针对外部世界，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风险因此更多，责任也更多，对“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知”的供给尚难以匹配“行”的需求，而“行”对“知”的需求却在几何级增长。从“知”的角度来讲，单有过去传统的“国家队”，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涉外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传统的服务国家战略和从事对外政策安全研究的机构似乎已经不够，要把全国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有组织、有规模、有体系地参与到国际问题研究中来，尤其是要把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基础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研究透彻。

所以，国家需要组织调动高校力量，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力军。这些具有深厚研究积淀和人才培养能力的学校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从注重学术研究发展到学以致用。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教授概括得很形象，他说，区域国别学应从“书斋之学”走向“田野之学”，从“历史之学”迈向“现实之学”，担当“大学之学、经略之学、治世之学”的三重使命。其实区域国别学在全国，尤其是在高校的兴起，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学术界提供更强的智力支持，这不仅是对外工作层面，还体现在国家战略需要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设立区域国别学是水到渠成，也是生逢其时。

为了健全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在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20年年底设立了交叉学科门类，我认为这一门类的设立，具有学科革命的意义。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第一，学科越分越细，各有各的规范，甚至形成壁垒，越来越难以综合、交叉、互通；第二，国家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高校可以组织动员起来发挥集体攻坚的作用；第三，国家各个部门需要既有专业知识、又能做好实践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高端的战略急需人才；第四，通过交叉学科门类的建设，优化高校发展机制，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在2022年9月，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区域国别学在各方面努力之下，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第七个一级学科，学科代号是1407。

交叉门类下的第一个一级学科是国家安全（1401）、第二个一级学科是集成电路（1402）。据此，可以认为，这些新兴的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主要还是以智报国，重在化解国家面临的重大的、现实的、战略性的问题。具体到区域国别学，就是一门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对外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的学科，简言之，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实学。对此，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钱乘旦先生反复强调区域国别学的特征是“实”，实用、实践、实证，“实”是学科的“灵魂”。202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姜锋教授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过一篇重磅文章，核心是强调实践是检验区域国别研究成效的核心标准。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我们这些做具体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非常兴奋，有点额手称庆、奔走相告的意思。除了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目标的喜悦感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区域国别研究这个以前“散落”在各个学科之中、学科地位不太高的研究领域，得以在以学科为基础的高校体制内确立了很高的合法地位。这里有个背景，就是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前的十年左右，我国已全面部署和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了。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全国高校建立了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与基地，至今已达到四五百个，形成了较好的区域国别研究基础。

但是，由于缺乏学科支撑，多数高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得不到重视，并非实体，发展不如预期，服务国家需求的效能大打折扣。当时，很多前辈和引领者积极倡导建立独立的交叉一级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学用相长。这一过程并非坦途，钱乘旦先生在接受《俄罗斯研究》访谈时，以及很多专家都有论及。比如，北京语言大学的罗林教授，全程参与了区域国别学“成学”的过程，了解个中的艰辛与所成。因此，我们常说，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家战略的迫切需求。为了实现这一需求，国家层面确立和提高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地位和组织形式。

二、区域国别学在新时代国家战略和智库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包胜勇：智库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相继出台了系列战略规划。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在构建服务于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智库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如何理解与界定其角色定位？比如，其在战略研判、政策供给、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创新等方面承载着哪些不可或缺的功能与价值？

翟 崑：对于区域国别学来说，这是最应该剖析清楚的一个枢纽性问题，所谓枢纽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牵涉面广，连通性强。

关于国家战略，可以从近期一项动态谈起。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是中央文件首次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其中。我印象中该“建议”中八次提到研究，有两次提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就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提高国际传播效能而言，是构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融通中外的传播话语，强调对不同区域国别的精准传播，“一国一策”和“一国多策”。“一国一策”是指我国要面向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强调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一国多策”是指面向一个具体的国家，也不能一刀切，要针对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设计不同的传播策略，强调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比如说，我国面向巴基斯坦的国际传播，一方面要有别于向印度的、阿富汗的、尼泊尔的、伊朗的、沙特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还要有针对巴基斯坦部落的、不同部门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在地化的国际传播。要让懂巴基斯坦的人帮着做设计并去参与其中，不仅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做传播，还要依托巴基斯坦的人脉，希望巴基斯坦人能帮助做好关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这就是区域国别学可以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场景。

当然，区域国别研究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复杂广博，国际传播只是区域国别研究服务的场景之一，不是唯一。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洁勉先生在2024年专门撰文论述，他认为区域国别学应该服务三大战略，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国家的对外战略。我认为这是个广义的说法，非常有道理，也很明晰，而且对三大战略的服务是相互交叉的。这也说明，

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是个统筹内外的系统工程。比如国际合作与冲突、全球与区域治理、国际发展与对外援助等，都是区域国别研究服务的场景。

包胜勇：您谈到了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发挥智库功能，需要统筹内外的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在内外之间可以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引入一个类似“圈层”的概念，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中华文化圈和中国周边国家的问题，这和地缘政治格局有关。

翟 崑：您这个内外不能割裂的认识特别对，很有层次感和纵深感。我先顺着您这个意思再补充一下。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不能把内外割裂，这是学术语言的说法；政策语言的表达就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做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比如，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时，必然涉及对美国、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现代化的深入把握、比较、竞合甚至是共进（我们希望）。

我记得复旦大学范勇鹏研究员 2024 年在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做过一次讲座，主题是中国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中国的中国学与区域国别学应该是一体两面，互为镜像。中国学是“知己”，是在世界之中，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了解自己；区域国别学是“知彼”，也是在世界中，在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了解彼此。“知己”与“知彼”不能分开，但各自有所侧重，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与世界”。

进一步而言，浙江师范大学的刘鸿武教授有比较形象的描述：“两头落地，中间担起”，一头是搞清楚中国的需求，包括地方、企业的实际需求和现实困难；另一头是你要研究的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需求和现实困难。这两头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帮助对接起来，他自己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是区域国别研究和实践的经验总结。总而言之，区域国别学服务的是整体性国家战略，落脚于中国自身需求；区域国别学也需深入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与价值观，因此其服务的战略范畴应更为广阔。

我以前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的时候，老院长陆忠伟先生说，国家智库研究的宗旨应该是“起自学术，终及国家”。这句话影响我很多年。

现在，我到北京大学工作十多年了，对应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目标，深感还需要在老院长八字箴言的基础上再加八个字，就是“服务社会，惠及世界”。合起来就是“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服务社会，惠及世界”。这是区域国别学应该做的。

包胜勇：我们的讨论可以进一步深化。若加上“周边命运共同体”，则形成四个不同圈层的共同体，覆盖中华文化圈。而中华文化圈对世界具有更广泛的辐射力，涉及中华文明如何与全球文明共处的问题。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从宏观层面指明了方向，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操作路径与国际社会接受度。从文明维度看，中国提供的解决框架需超越以往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论断。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非常关注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他的理想是文明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他提出了“文化自觉”。中国经过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有文化自觉。有了文化自觉，我们对待世界和其他文化的态度会有转变。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中国的发展还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但是那时候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天已经在国家层面被吸收、发扬和重新论述了。所以我认为应当关注中国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关联。区域国别学建设也应该进一步讨论内外相互联系的问题，要有中国的立场。

翟崑：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学与区域国别学的问题，反映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很好的学术遗产，具有很强的时空适用性。

我一直很欣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提出的“爱国关天下”这个口号，你怎么断句都很有意义。比如，“爱国，关天下”，这就很契合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爱”和“关”有程度上的区别。区域国别研究是有价值观、历史观的。不可能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必须坚持本国主体性。各国学者都爱自己的国家，虽然共同关切全球与区域治理，但层次有差异。区域国别学者对本国与对他国的情感认同程度必然不同。差异在于我们毕竟是本国学者，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爱国即“各美其美”，但目标是“美美与

共”。

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还有您刚才讲到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是中国很本土的、很原创的一个概念，就像“天下”一样，反映中国人的视角。一部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周边变迁史，具有极强的跨越时空的特征。理念、心态和现实不同，对周边的理解就不一样，既可以是更内视的小周边，也可以是更开放的大周边。天涯若比邻，即使远在天边的国家也可以是我的邻居，是我的周边。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更加重视周边。2013 年 10 月召开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25 年 4 月召开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从周边外交到周边工作，从座谈会到工作会议，再到更加明确地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对外部分，再次强调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且摆在外交布局的最前面。在当下时空看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承中华民族共同体，尤其是我们的边疆地区；外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一个继往开来的“新三体”格局。

包胜勇：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目标，都是要促进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理解，只有“各美其美”最终会导致文化中心主义，所以费孝通先生用“美人之美”来平衡，这样，世界上再弱小的文明、国家与文化也能得到尊重。如何处理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要辩证对待，如果把握不好标准或者尺度，就会演变成一种强势文化主义。因此费老又加上“美美与共”，这就是文明互鉴。最后是“天下大同”，实际上也回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古人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都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国别学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学科。对中国而言，区域国别学就是要光明正大地阐发理念，并从学科建设层面推进具体实践。

翟 崑：您这个阐发很深刻，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为区域国别学服务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张目。“美美与共”也给如何发展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提出了要求，因为区域国别学重视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地方知识、国家知识、区域知识，如何处理这些差异性极强的知识呢？也就是说，大家美在何处，又如何美在一起呢？北京大学唐士其教授对于如何做好区域国别

研究，也提出了十六个字：整体知识、问题导向、专业基础、本土价值。您刚才一说，我马上就想到，唐士其教授强调的本土价值，也有尊重本土（优秀）价值的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各国美在何处，美从哪里来，如何共美的问题。

包胜勇：文明互鉴，我们能互鉴和之所以要互鉴的基础，就在于我们有共同的一种全人类所共享的价值观。所以区域国别学第一个阶段要研究的就是对象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对方是怎么想的，然后才是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跟我们拥有一致性，这既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东西，也不是原始时期的同化，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的有教无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我们新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

三、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路径

包胜勇：我注意到您在多个场合提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三位一体”，也就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这三个组成要素要统筹发展。您还特别强调智库建设要在其中发挥枢纽作用。这是说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传统学科建设有什么不同吗？

翟 崑：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以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为宗旨，成为显学。钱乘旦先生的《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可谓区域国别学的奠基之作。他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作了区分。区域国别研究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各个部门展开的有组织科研，是对具体的区域和国别展开基础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研究。区域国别学是指在我国学科管理体系中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建设路径是三位一体，包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三位一体建设路径，专指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建设。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其他传统学科不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经世致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简介，在谈到该学科的学科建设时，提出“三位一体”的建设路径。我曾在《宁夏大学学报》撰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我又作了一些更深入的阐发。

学科发展是说要吧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学科建起来。人才培养是要培养区域国别学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既能做学术研究也能做政策研究，既能做研究也能做实务。智库建设是做好跟区域国别有关的咨政工作，培养智库型的研究人才。三位一体集中体现了国家对该学科的战略考量。三位一体建设路径也是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检验标准，三者都有，均衡发展，就是国家期待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反之就不是。

包胜勇：您提到三位一体既是建设路径，也是检验标准。实际上三位一体的建设路径进展如何呢？换句话说，传统学科的学科建设，它有个路径依赖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形成了很强的思维方式、规范机制和惯例做法。这种传统的路径依赖适合区域国别学这样的交叉学科建设吗？

翟 崑：路径依赖，这是个根本问题。2022 年 9 月区域国别学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目录后，区域国别学终于被官方认定为“学”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成学”到“建学”。山东大学张蕴岭先生率先在威海召集了全国多家高校和研究单位代表参加的会议，探讨区域国别学科如何建设的问题。会上，张蕴岭等前辈普遍担心，我们现有的学科体制能否建设好区域国别学，能否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端人才。他认为，老办法培养不出新人才，由此提出“勇者先试”，得打破和改革原有的机制，以交叉学科需要的机制来建设区域国别学，能干的先干起来。回到您提的路径依赖问题，这就是打破路径依赖的倡导。受此鼓舞，我还以“勇者先试”为关键词，在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倡议以“东盟学”作为区域国别学先行先试的领域，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2023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立，这是区域国别学学科的第一届评议组。我有幸成为评议组一员，实际参与学科建设工作。很多人还不太了解专家评议组是做什么的。专家评议组的功能就是为本学科建章立制，规划布局，监测评估。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是从无到有，从 0 到 1，任务很艰巨。一方面要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要符合学科建设规律。评议组做的第一件事是写学科简介。用钱乘旦先生的话说，这是起草区域国别学的“根本大法”。为此，评议组做了大量调研工作。2024 年年初，国务院学位办出台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简介，解决了区域国别学是什么，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宗旨、研究对象、问题、理论、方法以及学位授权点建设的规范问题。学科简介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区域国别学三位一体的建设路径。几年实践下来，我对三位一体建设路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理解更深刻了。

包胜勇：比如说呢？三位一体对打破传统路径有什么作用吗？实际效果如何？

翟 崑：我从这三方面谈谈这几年参与学科建设的一些体会。

第一，学科建设。刚才您说到传统学科建设路径不一定适合区域国别学，有道理。传统学科有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甚至是很牢固的规范和边界，以及成体系的知识论、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而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它为打破边界、交叉融合、学以致用而来，需要与之相配的建设路径。区域国别学虽然依托诸多传统学科，但显然不能按传统学科的规范来建，否则就变成传统学科了，失去了建立交叉学科的意义。但是，对于交叉学科应该如何建，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仍在探索的初期阶段，需要众智众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个基本认识，仍需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传统学科的学者，包括开始做区域国别学的一些学者，在讨论区域国别学时，经常连学科简介都不看，自说自话，这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2025年4月，钱乘旦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在座的诸位来自各个学科，有自己的专业认同。但是，今天我们坐在一起，就有一个共同的认同，这个认同就是区域国别学。最近几年，做区域国别学的学校很多，我参加了不少学科建设的会议。有时规模很大，有大几百人参会，与会者包括教授、学生、政府部门的干部、企业经营者、记者等。如果有我的主旨发言，我会先跟大家对一下暗号——1407，不管你在海内外，只要说一下1407，就知道咱们都是区域国别学学术共同体。1407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代码，14是指第14个学科门类，07是指区域国别学是该门类下第7个一级学科。有的老师有时给我发微信，先呼唤1407。

第二，人才培养。传统学科建设更加侧重于知识、理论、方法，而区域国别学更重视实践性，要求学生赴企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从事涉外实习，参与智库实践，开展田野调查。对人才培养实践性的认知提升，是这几年学科建设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区域国别学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很高的。

通俗地说，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既要懂中国，又要懂外国，还要文武双全，也就是研究与实践都得行。这是这门学科学以致用的属性决定的。

那大家就问了，这种跨学科的全知全能型选手怎么培养，能培养出来吗？很难，但是难也得培养。这个坡必须得爬，一步一个脚印地、一层层地爬。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之难，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人才能力结构问题。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学应培养 T 型人才、 π 型人才，“杰”字形人才等，“六边形战士”——不管是几边形战士，具体如何培养呢？北大教育学院杨钊教授提出了区域国别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混”模式，就是重视学生、教师、教学、实践等方面的重混，就是说要重视这些方面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机制的协同重混。

二是人才水平的层次问题。区域国别学主要培养研究生，即硕士、博士等高端人才。人才层次也是有区分的，就像围棋选手有段位一样，区域国别学的人才也可以划“段位”，“段位”越高，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就更好一些。这需要专门机构来设计不同层次人才的门槛、考核、认定标准。在我们部委和企业中，有一些非常好的区域国别人才，他们懂当地国家语言，长期扎根，经验丰富，乐此不疲。在我看来，这就是很高级的区域国别人才，仅仅是学院式的培养可能不行。

三是人才海外实践问题。到对象国去做田野调查和实践，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要件。学科简介明确提出，硕士、博士分别需要在对象国进行长期扎根调研，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遇到不可控因素，战争、疫情、灾害、国家关系恶化，学生去不了对象国怎么办？安全问题怎么办？除了学生自己要有完整的“海外求生”训练之外，有关部门相应的配套和规则都需要跟上。比如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2018 年 4 月建院，2019 年第一批博士生进来，主要是俄罗斯、中亚、中东研究方向，因为当时认为这几个方向是重点。果不其然，但培养过程也是困难重重。这批学生不仅经历了区域国别从研究领域到一级学科的转型，也经历了国际形势恶化。比如说，当他们把专业课和学分修完、博资考和开题报告完成后，就得去海外访学做田野调查了。但是，新冠疫情来了，再后来是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怎么出去？怎么做田野调查？在学生、研究院、北大国际合作部、研究

生院等各部门，以及海外相关方的支持下，这批同学基本上都完成了海外田野调研，安全回国。回想这些事，我真的挺佩服这批“北大区域国别一期”学生的。

四是人才储备问题。刚才说到区域国别学目前主要是培养高层次的研究生，这必然涉及人才池子和人才储备的问题。截至 2025 年年底，教育部批准了 12 家高校可以招收培养区域国别方面的本科生。如果再往下沉，还要培养中小学生的“知外意识”。我有幸担任了多年高中政治统编教材《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主编，对这个事有体会。这个教材也是来之不易的，有助于提升大国公民的国际素养。但还远远不够。比如中学教材可以跟上目前区域国别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衔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据我观察，现在高中生在新高考中选考政治科目的比例不够高，不少中学生对政治常识和外国知识的掌握比较有限，跟大学教育衔接不上。

第三，智库建设。区域国别学强调学以致用，服务国家战略，当然需要智库作为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支撑转化。没有智库建设的所谓区域国别学，都不是真正的区域国别学。我个人对智库建设还算熟悉吧。一方面是 1998 年到 2014 年，我在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国家队”之一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接受了长达十六年、较为完整的严格智库研究工作综合训练。从具体的东南亚国别和区域研究，到比较宏观的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等综合研究，对智库研究和智库管理相对熟悉。

另一方面，2014 年我到北大之后，正赶上新时代国家要求高校等部门加强智库建设，做好咨政工作这一波持续的新浪潮。我明显感觉到，高校对做好咨政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大幅提升。目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些老牌 985 院校的整体智库建设都做得不错，人文社科和理工医农全面开花。一些重要的高校擅长某个地区的智库研究，比如兰州大学的中亚研究、云南大学的缅甸研究、西北大学的中东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等。还有一批学校很特殊，也是我经常提及的，他们开拓了专精特新类的高校智库研究工作。比如，山东的聊城大学专注于南太平洋岛国研究，浙江的杭州师范大学则关注加勒比海岛国等。

区域国别学的智库建设就是在这个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全国高校区

域国别学建设的智库工作而言，仍需要一个过程。我看过不少学校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规划方案或者培养方案，从开始时的忽略或缺少智库建设，到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日益增强，可以感觉到大家对智库工作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最近，西北大学副校长韩志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题为《区域国别学的归宿是智库研究》的文章，提出智库不是简单的研究成果输出端口，而是整个学科体系的价值检验场和功能实现终端。它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超越书斋里的理论推演，将学术洞察力转化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能力。因此，智库建设在学以致用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是交叉学科门类的重要特点。而且，随着传统学科服务国家战略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区域国别学的智库建设也起到了显著的助力和支撑作用。

四、中国区域国别学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差异

包胜勇：从现代学术体系的发展来看，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在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开展得较早，积累了很多成果和经验，我们在这方面算是后发国家了。基于国际比较角度而言，您觉得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美国、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 Area Studies 有何本质区别？

翟 崑：我先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官方英文名称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一位领导曾说，他发现各个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英文名称都不太一样，有的翻译成 area，有的翻译成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有的翻译成 global and area，有的翻译成 regional……正式的英文名称应该是什么呢？我说的确如此，区域国别研究的英文名称在学界讨论很多，反映了在学科建设前期或准备阶段，不同学者对区域国别的理解差异，更多还是在学术层面的辨析。这是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学科史发展的印记。他又问，美国主要还是用 area 研究吧，如果咱们的英文翻译成 area，这样会不会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就是完全效仿美国的地区研究呢。我说完全可能啊，在某些国家，area studies 的名声并不好，是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工具，体现着一种不平等的

关系。这与我们国家构建平等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行目标并不相同。领导的这个提问，我认为中国对区域国别研究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学术的政治性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问题。

问题是，从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角度，应该用什么词呢？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姜锋教授，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党委书记。他咨询了不少国内的英文专家，认为“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更合适。“Country”指国家，“Region”指区域，简洁且避免歧义。区域国别学学科简介也将区域国别学的英文名称定为“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建议新设学科点使用这个名称，各单位已有的英文名称可以保留。这件事，体现了中国建立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和政治自觉，不是照搬也不能重走美国道路。

包胜勇：这个故事是您在推动学科建设过程中亲自经历的，很能说明问题。重新梳理中外区域国别学的异同，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近年来区域国别学在建设中存在诸多讨论，有必要对其中的核心与基础性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汇总与总结；二是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尚未提出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对文化霸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实现了对它们的超越。二战后的美国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本质上服务于冷战及其全球霸权的构建，后续日本、苏联的相关研究也抱有类似意图。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带有其时代烙印。因此，我们进行理论梳理与构建，旨在确立一条不同的、自主的学术路径。这或许是本质的区别所在。

翟 崑：对，如果说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虽然都是服务国家战略，探索外部知识，但关键在于底层的价值观是否平等。虽然大家普遍这么认为，还是需要进行完整细致的学科史研究。您提到的学术自觉是个边破边立的过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学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吹响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号角，至今已经10年。最近几年，破立结合的进程明显加快，势头也更强劲。尤其是2025年年底至2026年年初以来，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都在组织相关讨论和成果公布。区域国别学是目前最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破立过程也在进展中，在反思与批判西方化的同时，摸索建构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方面的探索很多。举一个例子，2025 年年初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负责的《国际观察》杂志发表了两篇对话文章，一篇是王逸舟、王婉璐合作的《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另一篇是我写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互联互道路径的“三个需要”——品谈王逸舟、王婉璐之〈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我们就如何以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互联互道路径，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进行了讨论。总体上，我赞成两位老师互联互道路径的观点，并且根据我这几年实际从事学科建设工作的感悟，补充了三点看法：第一是把区域国别学学科史的探索，放在交叉学科视角下；第二是利用现有条件，充分记录和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创生阶段的互联互通；第三是培养中国区域国别学互联互通的良好生态。目前，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绍雷教授在牵头的一项大研究，即对欧美俄等主要国家，以及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比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山”研究。

五、当前阶段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总体目标

包胜勇：学科建设有其自身规律，前面您已经深入回顾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战略意义和建设路径等相关问题，为了这个新学科未来的更好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清晰定位。当前是区域国别学学科从探索起步迈向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您认为当前阶段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翟崑：我先把当前阶段给界定一下，目前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初级阶段，或者说从 0 到 1 的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个阶段得有个五年时间吧，起点是 2022 年 9 月区域国别学正式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到 2027 年左右，大概五年时间。2022 年 9 月对于本学科而言是个分水岭，此前，学界关注的是“何以成学”，此后是“建学何为”。“何以成学”的意思是，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从散落走向集中、再走向“体系化”的交叉门类一级学科。“建学何为”的意思是，按照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标准配置去建设区域国别学。因此，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纲举

目张”，就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简介，把区域国别学的四梁八柱等基本架构搭建起来，把标配体系构建起来，进行规范性建设，能有效支撑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

包胜勇：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应该分几个步骤或者几个阶段呢？如何为学科建设的过程做一个规划呢？

翟 崑：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出发，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首先是前期酝酿和筹备阶段，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大概十年左右，从2011年到2022年。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2011年以后教育部支持高校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至今已在全国建设了四五百个报备中心和基地。可以说，这是高校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建设阶段。后来，不少高校认为，因为没有学科支撑，这些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甚至无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何谈支撑国家战略。因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找一个学科依托成为共识。2020年年底，国家建立了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国家安全和集成电路两个一级学科，这给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界以很大的启发和激励。2022年9月，国家批准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之所以再把这个十年准备期说一遍，是想强调区域国别学建设是有基础的，并非横空出世。

我重点说一下纲举目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成学科简介，这是学科建设的主要依据。第二阶段是根据学科简介的各项要求开展工作。第三阶段是学科建设评估。这三个阶段工作完成，算是完成了一个闭环。所以，到2026年上半年，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算是真正在路上了。这里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从2023年开始，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985高校率先自设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第二，2024年年初，学科简介完成。第三，2024年8月，全国第一批非985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获批。第四，核心课程指南、区域国别学概论大纲、概论教材、配套教材等将陆续出台。第五，最初几批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博士生毕业。第六，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初期成果相继涌现。第七，完善了围绕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标配建设，比如人财物机制等的建设，从招生到就业的全流程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和成果的评价体系，数据库知识库、智库、期刊、学会、网络、国际交流等。第八，初步确立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评估体系等。

六、“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复合人才”关系的平衡

包胜勇：作为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之一，您对本学科的建设投注了大量心血，是深度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和领航人，尤其是您所在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也是这一轮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大本营之一。结合北大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具体实践，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与统筹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规范与培养复合人才这几个方面？

翟 崑：总体上来说，北大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引领了这个学科的建设，并且符合国家对这个学科的建设要求。北大是典型的综合类大学，具有很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只不过分散在人文社科和理工医农等相关院系。大概在 2016 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发挥平台作用，统筹协调全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从 2018 年 4 月建院到 2026 年年初，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已经跨入 3.0 版。我有幸全程参与。

从 2018 年到 2022 年是 1.0 版，即创建期，创始院长是钱乘旦先生，常务副院长是时任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的宁琦教授。从一开始，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就提出“五位一体”的建设方针，即学术研究、学术管理、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对外学术交流要一体推进。这跟现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三位一体是一致的。我现在回想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很佩服前辈们的战略眼光和学术远见。钱乘旦先生等认为，鉴于区域国别研究是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不能挂靠在任何一个学科院系，而是挂在前沿交叉学院。这为后来区域国别学申请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埋下了伏笔。在 1.0 时期，北大研究生院支持力度很大，每年给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9 个博士生名额。2019 级博士生是北大区域国别学一期，我们提出“双能人才”培养模式，即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值得一提的是，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相关兄弟院校的支持下，代表全国高校，向国务院学位办提交了建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申请。

从 2022 年到 2025 年是 2.0 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唐士其教授兼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大区域国别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也正式从区域国别研究走上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道路。不仅完成了北大

校内的一级学科审批工作，而且渡过了疫情期间的艰难时期，北大区域国别学一期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并实现了比较理想的就业。由于北大 1.0 建制与国家倡导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求一致，因此从区域国别研究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跨越比较顺畅，边建设边学习，日益规范。如果说 1.0 版抓住了区域国别学“学以致用”的灵魂的话，那么 2.0 版则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规范发展”上实现了很大突破。唐士其教授对区域国别研究做了知识论层面的概括和推进，就是前面提到的十六个字——整体知识、问题导向、专业基础、本土价值，强化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有助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用之间的平衡发展。

从 2026 年开始将是 3.0 版，北大更加重视本院作为重要跨学科研究平台的作用，由校领导担任院长，揭榜挂帅，更加高效地开展有组织科研，更加重视您提到的三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当然，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也特别重视国际交流，非常有特色，这个问题也放在后面深入交流。

七、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包胜勇：回望过去的三年，区域国别学自设立一级学科以来，从探索起步正迈向全面发展，学科建设实现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我们正在进行的正是探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发展之路，并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您看来，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学科属性、学科内涵、学科目标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翟 崑：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我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中作了综合梳理概括，总体来讲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是服务国家对外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可以概括为大国之学、交叉之学、在地之学、实践之学、育人之学，简而言之，是“交叉在地，学用相生”。因为这个问题绕不开，我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作些新的阐发吧，主要讲讲这几个“之学”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之处。

“大国之学”，世界性大国无一例外都有成体系的区域国别研究，这算是大国标配，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首先就是大国的世界观问题，中国作为大国的世界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叉之学”，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中国的一大创新。有学者说，这本身就体现出世界级学科的气象，因为其他国家未像中国这样，使其成学，纳入国家学科管理体系，力促其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在地之学”，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及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日益认识到，缺乏实地调研和长期在地考察，研究就难以深入，因此格外强调海外田野工作和实地调研工作。“实践之学”，就是要纠正学科发展脱离实际、日益虚化的倾向，强调通过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实践服务并反哺学科建设，所谓“学以致用，用以强学”。“育人之学”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要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即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的复合型人才。这五个“之学”综合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基本轮廓。

包胜勇：您对于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有非常清晰的定位与认知，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也一定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如何来理解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问题就变得非常关键。您对此有哪些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从学科上去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翟 崑：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主要取决于它的自主知识体系。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目前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工作。从 2025 年年底开始，相关学术会议、成果发布非常活跃。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学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提出了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问题，到 2026 年上半年正好是 10 周年，相关学科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也到了一个成果爆发期。我也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问题，请教过不同学科的前辈，学到很多经验，以及要注意的问题。具体到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可以概括成几个词：

第一，已然起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也是在此期间建立发展的，本身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大成果。这一点要特别明确。从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开始，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号

角就已经吹响了。三年多来，区域国别学界的同仁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不少成果。

第二，后发优势。相较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还有个特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区域国别学可能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情况跟同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有点类似，但比国家安全学还要晚两年多。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在从0到1的阶段，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不过，区域国别学是新兴学科，其学科建设基于“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对外战略实践以及世界各国和区域为研究对象，是有组织的科研，因而具有后发优势。

第三，规范发展。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应包括如下一些基本原则：整体进度上既要稳健推进，又要快马加鞭；既要大干快上，又不能搞一窝蜂造成质量低下；既需要全国性各方面的有组织科研，也需要学者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做好基础研究和前沿问题研究；既要依托借重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也要为其他学科的发展赋能。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大国关系

关于大国竞争的博论

于滨*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国攻/防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论争聚焦中国。米尔斯海默的“竞争论”将美国在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主义——狭隘的自身历史叙事和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对原住民和周边国家持续的、残忍的清除、侵略和掠夺——上升为大国关系的普遍公理。如此“真理”与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一道，堕入了古典现实主义论者摩根索所警示的美国学界过度“理论化”与忽视现实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种族主义”的套路。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既无法解释冷战后期美苏两极体制的“长和平”，也完全忽视了后冷战时期中俄间平等、稳定、互利的正常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曾对冷战两极体制偏爱有加，如今进攻性现实主义却无视中国“和而不同”、大而不霸的历史轨迹，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充满焦虑，个中是否有某种“文明”（即种族）的潜意识，值得深思。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和地缘现实，米尔斯海默的国大必霸、霸则必战的线性思维，难以解读中美两强全然不同的国家战略：21世纪美国“一炸一路”的军事化外交惯性和新瓶旧酒、以邻为壑的“唐罗主义”vs.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的宏大实践。对于如此偏颇、极度悲观的“大国竞争论”，中国学界应有所警觉。在西论现实主义各类变异的“光环”下，多有非现实、反现实的成分，切勿以简单的拿来主义取代常识、理性和历史性的深度辨析。

【关键词】大国竞争 米尔斯海默 进攻性现实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1-0026(39)

* 于滨，美国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上海美國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美國夏威夷太平洋論壇中俄關係特約研究員。

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圈关于“大国竞争回归”的论争陡然升温，其中既有特朗普的政策取向和张扬个性所伴生的一系列内外政策的转向，^①包括其对“联俄制华”的执着，^②也伴随探寻国际大势的种种博论，聚焦单极解体、多极隐现、东升西降、中俄欧美多边互动^③等趋向。近年来国际乱象丛生：战争与和平、开放与孤立、各国间信任赤字上扬等问题，均以各种方式注入“大国竞争”的论争漩涡。^④以至美国两位国关学界现实派领军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

① See M. Wess, “The Return of Great-Power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2025, Vol.104, No.3, pp.24-39; M. McConnell, “The Price of American Retreat: Why Washington Must Reject Isolationism and Embrace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2025, Vol.104, No.1, pp.127-139; “Rule of Don”, Eurasian Group, January 6, 2025, <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risk-2-rule-of-don>; 黄宏伟：“特朗普的终极愿景：美、中、俄三分天下”，纽约时报中文网，2025年5月27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50527/trump-russia-china>；科里夫·库普坎：“欢迎来到‘G零’时代，未来将是中美俄三大强权相争”，观察者网，2025年7月4日，https://www.guancha.cn/CliffKupchan/2025_07_04_781725_s.shtml

② See Peter Baker, “Trump’s Pivot Toward Putin’s Russia Upends Generations of U.S.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8/us/politics/trump-russia-putin.html>; Michael McFaul, Evan S. Medeiros, “China and Russia Will Not Be Split: The ‘Reverse Kissinger’ Delusi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4,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hina-and-russia-will-not-be-split>; “A Nixonian Trump Offer to China? The President wants to break up the Moscow-Beijing ax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July 31,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donald-trump-china-trade-russia-scott-bessent-3529bac6?mod=hp_opin_pos_1; Vijay Prashad, “Donald Trump’s Reverse Kissinger Strategy”, *No Cold War Perspective*, February 2025, <https://nocoldwar.org/news/donald-trump-s-reverse-kissinger-strategy>

③ See Stephen Walt, “How to Ruin a Country: A step-by-step guide to Donald Trump’s destruc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pril 7,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4/07/trump-ruin-us-foreign-policy-country>; Amitav Acharya, “Trump is Hastening the Emergence of a Post-Western World”, August 19, 2025, <https://multiplexworld.com/2025/08/19/trump-is-hastening-the-emergence-of-a-post-western-world>; Martin Wolf, “The US is now the enemy of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b46e2e24-ca71-4269-a7ca-3344e6215ae3>; “Multipolarization”,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5, February 2025,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5>

④ See Graham Allison, James A. Winnefeld Jr., “The End of the Longest Peace? One of History’s Greatest Achievements Is Under Threa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4,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sa/end-longest-peace>; “Top Risks 2025: The G-Zero Wins”, January 6, 2025, *Eurasian Group*, <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risk-1-the-g-zero-wins>; Noah Robertson, “‘Imminent’ threat? Hegseth escalates tone on China in key Asia speech”, *Defense News*, May 31, 2025; Kurt M. Campbell, “The U.S.-China Crisis Waiting to Happen: Beijing’s Reluctance to Engage with the U.S. Military Has Never Been More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6,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sa/china-crisis-waiting-to-happen>

(Stephen M. Walt) 在特朗普二任伊始, 便在美国《国际安全》期刊发表长文, 将国际间大国竞争问题, 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由“争”转“战”的可能性问题, 合力推向前台。^①

大国竞争到底是常态还是个例? 西学中此轮大国竞争论争的着力点在何处? 所谓进攻性/防守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 为何不同版本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古典、结构性、进攻性等)对大国竞争的叙事和解说全然不同? 为何不同文明的大国对大国竞争现象的理解和操作南辕北辙? 如何解读特朗普二任一年来的政策趋向? 在中国历史性崛起的 21 世纪里,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如何审视和应对美国同行的此轮论争?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 本文有三方面重点讨论: 第一, 解析此轮以中国为目标的大国竞争论争的要点、逻辑和政策取向; 第二, 进一步探寻攻/防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 尤其是其前身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轨迹、社会环境和学术/政策导向; 第三, 由于在此轮大国竞争论中, 中国作为一个“问题”贯穿始终, 本文试图评估美式“大国竞争论”在中国学界的衍生效应。

一、大国竞争回归兮: 必然与偶然之间?

美国国关学界关于进攻性/防守性现实主义的争论始于 2001 年 1 月 1 日, 也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出版首日。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米尔斯海默在该书中认定,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 为了生存, 在无法确定对方意图的情况下, 大国之间难以进行合作, 结果就是不断扩充军力试图削弱对手。由此产生的恶性竞争显著增加了战争风险, 构成了大国政治结构性的“悲剧”。根据这一逻辑, 米尔斯海默预测, 未来 20 年, 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构成最具实质性挑战的国家最有可能来自欧洲和东北亚。米尔斯海默认为, 相较于美国退出后可能出现的、以德国与俄罗斯竞争为特征的欧洲多极化格局, 一个经济强大且谋求区域主导权的中国, 对美国

^①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7-36; Stephen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37-70.

霸权构成的威胁更为直接，其潜在冲击强度远超 20 世纪任何单一挑战者，无论是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还是苏联。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米尔斯海默断定中国必然会像 19—20 世纪美国一样谋求地区霸权，进而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制。为防止上述局面的出现，美国必须着手采取措施扭转中国经济上行的趋势。^①

大国悲剧论问世 24 年后，新版的大国竞争/战争论之要点，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窥见一斑：

1. 形态和根源。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回归是国际体系结构性的现实，其主要表现是所谓“单极瞬间”（unipolar moment）的终结。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瞬间”中（1991—2017 年），国际军事冲突的表现是超强的美国“吊打弱小国家”，因此“不可能”出现大国间的安全竞争。而如今的国际秩序呈现“一超多强”态势，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为主导的安全竞争强势回归，且愈演愈烈。如果说米尔斯海默凭借《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奠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那么，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大国竞争在米尔斯海默笔下已踏上了不归之路。

然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论者沃尔特则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竞争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因为美国以外的任何大国若要争取地区霸权，势必引发其他地区强国强有力的制衡，而这种反霸权联盟对崛起大国来说十分危险。不仅如此，美国也绝对不会允许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任何有能力对抗美国的强权国家或集团。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使欧亚国家之间永远处于互相戒备或相互缠斗的状态而无法自拔，无暇顾及万里之外的美国。^②如果美国主导的联盟体制有效，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应该不会铤而走险，寻求地区霸权。

2. 可操作性。如果说美国学界和政策界对大国竞争到底是一个现象、还是假象、或想象/意愿还未有定论的话，攻/防现实主义对大国竞争战略的可操作性的认知则大相径庭。米尔斯海默笔下的大国竞争不是大国在政治与

^①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p.1-28, pp.360-402.

^②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38.

军事手段之间的转换，而是政治与战争手段经常交织，难以分辨；而战争的发起、操控和升级又与政治有不解之缘。这里，米尔斯海默一反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传统认知，认为战争与政治的区分往往是虚幻的，几乎不可能建立有意义的法律和道德屏障以阻滞战争的发生。^①当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战略考量往往先于道德约束；^②政治竞争很容易转化为军事对抗，^③而此时的民族主义只能是火上浇油。^④这里，米尔斯海默以其一贯的悲观主义，认为几乎不可能遏制国家发起战争的冲动，而战争升级本身也具有摆脱政治控制的强大惯性。米尔斯海默笔下的大国竞争并不排除大国之间的合作（例如核不扩散、气候行动、国际组织等），但这些合作往往笼罩在所谓“竞争阴影”之下。也就是说，合作不是消除冲突，而是在风险与实力考量中作出的策略选择。

相对于米尔斯海默的政经混合战略，沃尔特更强调其“不可行性”。他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不排除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尤其是在有着诸多潜在冲突热点的东亚，但他更强调上升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1）中国周边的工业强国不仅具有制衡中国的潜力，而且日益感受到中国的威胁；（2）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衡，其动作包括增加军费，并与美国进行各种针对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协作（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3）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虽然重要，但安全考量仍优于经济利益；（4）亚洲国家仍继续接受或依靠美国的军事存在；（5）日韩两国作为潜在的核国家也使中国更为克制；（6）中国即便可能“夺取”台湾，但这也不一定会立刻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7）美国两党在制衡中国方面保持高度一致；（8）中国以文化/道德为基础的“天下”秩序难以被周边国家接受；（9）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难以以隐蔽方式实现其地区霸权。^⑤

①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20.

② Ibid, p.27.

③ Ibid, p.22.

④ Ibid, pp.29-31.

⑤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60-66.

沃尔特还通过美国区域霸权“例外论”来反证中国谋取区域霸权的“不可行”。美国在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北美区域霸权，原因在于一系列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两洋隔离），使美国远离当时欧洲列强的威胁和侵扰。而伴随欧洲移民的各种病菌（天花、麻疹等）使美洲原住民人口剧减（注意：沃尔特在此完全回避了外来移民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行为），有利于美国官民以“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进行殖民扩张，而美国周边国家及其欧洲的宗主国对美国的早期扩张并未进行任何有力制衡。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具备美国那样建立地区霸权的条件，所以中国很难复制美国的路径。^①

3. 前景/结果。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既然战争是国际政治生态的主轴，既然政治在本质上是冲突性的，那么国与国关系中诉诸暴力就始终是一个可能。即便在和平时期，战争的可能性仍支配大国的言行举止。^②这里，米尔斯海默并非打算把话说绝，他提醒读者说，他的“大战在即论”不是鼓吹战争，而是在提醒人们，防止大规模战争发生的最佳方式，不是依赖理想主义的和平愿景，而是要理解那些“使战争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力量”。^③

对此，沃尔特仍然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过度”强调了大国获取实力的意愿，忽略了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和反噬；不是所有大国都在力图扩充实力和争取地区霸权，因为这会恶化安全环境；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分歧，既在于对国家行为的定义，也在于对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考量。有鉴于此，大国可以避免恶性竞争的惨局。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可以建立某种“可管控的战略竞争”框架来加以规范，^④这包括双方应禁止颠覆或推翻对方的政权。与此同时，双方应同意在贸易和军备控制领域作出让步；如果此类协调难以达成，双方的各自行为应“恰如其分”（well-calibrated），以避免冲突升级或任何一方获取永久性优势。

①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51-56.

②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8.

③ Ibid, p.30.

④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69.

二、“竞争论”的执着与迷失

美国攻/防现实主义论者在“大国竞争”议题上各执一词，但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殊途同归，第一，单极已去，多极当立，国际秩序正步入一个更为动荡、更为多变、更不可测的多事之秋，当然也更为危险，他们之间的分歧则在于如何应对之。第二，两位学者虽承认美国国力和西方整体实力的相对衰退，但却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无论这种崛起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其路径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即便作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沃尔特在其论述中也明确指出，中美潜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国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①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而在大国竞争论中，米尔斯海默则直接排除了国与国关系中超越生存本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设定的存在^②，将国家行为严格限定在实力最大化与安全竞争的本能逻辑之中。

其实，攻防现实主义者们在此轮“大国竞争”的博论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道出，所谓“竞争悲剧”，其根源可能就在于美国本身。在强调中国不可能获取地区霸权的同时，沃尔特以美国为例证明，即便中国取得了地区霸权，也不可能获得安全感。原因很简单，美国在西半球获得地区霸权之后仍然未能获得安全感，即便在二战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始终未能摆脱对安全的担忧。美国社会一直为各类恐惧所困扰：从所谓“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红色恐慌”、“多米诺骨牌效应”，到“9·11”以后的恐怖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混蛋国家”、“邪恶轴心”等。尽管美国拥有傲视全球的、压倒性的核常军力和最安全的地理环境，美国领导层仍经常对外部“威胁”忧心忡忡，甚至草木皆兵。这种持续的不安全感表明，即使成为唯一的地区甚至全球霸主，国家安全感并不会自动增强。^③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军人的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尽管在理论框架的运用、核心概念的解析和历史解读的方式方面多有

①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37.

②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9, pp.28-32.

③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55-56.

不同，但二人均将美国自身对外扩张经历视为西方现实主义范式的主线。按照米尔斯海默“大国悲剧/竞争论”的逻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会因循其“国强必霸-霸则必战-战之必衰”的轨迹。

然而，《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 25 年后，米尔斯海默当年的预测——一个多极/非均势的欧洲^①与崛起的中国称霸东北亚——则与时局走向大相径庭。首先，美国非但没有从欧洲脱身（直至特朗普第二任期），而且一直在主导北约东扩，这直接引发了俄乌战事。回头看，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的心病是所谓“德-俄轴心”的形成，而非源于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称的德、俄竞争欧陆霸权现象。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一个“柏林-莫斯科轴心”已初见雏形，^②强大的德国经济与俄罗斯广阔的市场和取之不尽的廉价能源历史性地结合，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则日渐式微。而阻止和扭转这一趋势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给北约续命，即东扩。此举不仅可以分化“德-俄轴心”，亦可充分利用所谓“新欧洲”制衡“老欧洲”，^③目的是维系美国对欧洲的终极控制。正如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所说，“北约存在的目的是‘排斥俄国，拉住美国，压住德国’”^④。在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看来，北约东扩是一个“致命错误。”^⑤

如今俄乌冲突已逾四载，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 7 月至 1918 年 11 月）的持续时间。特朗普二任的美国去意已定，欧洲却有心乏力，俄罗斯更是欲罢不能，而战争的惯性仍在吞噬整整一代斯拉夫族的青壮年，且冲突外溢和升级的可能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Trump Corollary）——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预测，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谋求美式门罗

①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360-402.

② See M. Orenstein, “Get Ready for a Russo-German Europe: The Two Powers That Will Decide Ukraine’s Fate-and the Reg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 9,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018/mitchell-a-orenstein/get-ready-for-a-russo-german-europe>

③ 最早使用新老欧洲概念的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原因是“老欧洲”国家（法德意西等）均反对美国在“9·11”后进攻伊拉克。See Ishaan Tharoor, “The ‘old Europe’ vs. ‘new Europe’ paradigm i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0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03/04/17/old-europe-new-rumsfeld-eastern-europe>

④ Victor Davis Hanson, “Lord Ismay, NATO, and the Old-New World Order”, *National Review*, July 5, 2017.

⑤ George Kennan, “A Fateful 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97.

主义的地区性霸权^①——已经堂而皇之地载入美国 2025 版的《国家安全战略》。^②此时此刻，攻/防现实主义新一轮的“大国竞争”论争，不仅无视欧陆大国 77 年（1945—2022 年）无战事后再度兵戎相见的巨变，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期间美西方穷兵黩武的现象无感无憾，^③也不去关注为何全球南方在“旧大陆”这场战争中拒绝选边站队——这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后西方无休止的对外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战争以来尚属首次。^④恰在此时，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却把目光投向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发展、安全和治理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国关学界中颇为显赫的流派之一是“大国战争过时论”，众多现实主义论者也参与其中，^⑤代表性的著作有约翰·米勒（John Mueller）1989 年出版的《告别末日：大规模战争一去不返》^⑥和 2021 年出版的《战争愚不可及：美国外交应知足常乐》^⑦。事实上，在后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美国和西方国关学界中一直处于下风。^⑧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后

①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401.

② Greg Myre, Leila Fadel, “White House call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rump’s vers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December 9, 2025, <https://www.npr.org/2025/12/09/nx-s1-5633261/white-house-call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trumps-version-of-the-monroe-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③ See A.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俄乌冲突三周年之际，笔者曾撰文指出，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中拒绝选边，是因为这场由北约不间断东扩所引发的俄乌之争是“由西方主导、参与、为了西方本身利益的战争。” See Bin Yu, “Munich 2025: A Moment of Truth for Europ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13, 2025,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munich-2025-yu-bin>

⑤ See C. Fettweis, “A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r What if Mueller Is Righ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Vol.8, No.4, pp.677-697.

⑥ J.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⑦ J. Mueller, *The Stupidity of 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ase for Complac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⑧ 米尔斯海默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 2025 年的《战争与国际政治》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 1991—2017 年的单极世界里，大国政治问题是不上台面的”。See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7.

历史”时期，以至深度参与“攻/防现实主义”论争的一位中国学者在 2010 年就宣称，国际政治无疑已经由原始、野蛮的、丛林式的弱肉强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型为更为平和的、更为理性的、更加基于规范、基于制度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①

尽管米尔斯海默 2001 年的“悲剧论”与 20 余年来的历史轨迹和美国国关学界/政策界主流严重脱节，作者仍秉信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内核和逻辑。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执着（或固化）终于在 2025 年年初的“大国竞争论”中卷土重来，这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大国竞争/悲剧论”：现实主义版的“历史终结症”？

米尔斯海默在《战争与国际政治》的开篇就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靶子，指出自由派对国际政治认识的通病，是完全排除了大国竞争会导致战争这种可能性。^②按照米尔斯海默的逻辑，大国间的竞争是无解的、你死我活的。米尔斯海默开创的“大国竞争/悲剧论”，从西方自由派“岁月静好”的极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滑向另一个极端，即你死我活的原始丛林政治。然而双方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完全排除了两个极化的、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世界中有任何中间道路的可能。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悲剧论”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美式现实主义并不十分漫长演进过程的最新变异。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国关学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学派。二战以后，至少有三个因素促使美国国关学界转向现实主义。首先是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一批现实主义学派学者（主要是犹太难民）从欧洲移居美国。摩根索于 1948 年

① S. P.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Vol.16, No.1, pp.31-55.

② See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7-8. 有关“战争过时论”的主要著述包括：J.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 Penguin, 2011;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0, Vol.14, No.4, pp.42-64,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38750>; J.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S.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2.

出版其力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提出了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准的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的六项原则，^①奠定了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根基。欧洲学人移居北美的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断崖式溃败之时。一战之后风靡欧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主义，很快被北美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绥靖主义所取代，并在二战中身败名裂。最后，二战结束后美国强大的国力，确立了以实力为基础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也使美国学界在二战后得以跨越两千余年的时空，^②自封为西方现实主义的真正传承者。

然而，源于旧大陆的政治现实主义（如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款学究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摩根索在其独到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中，强调以“政治人”的概念将复杂的人性抽象化；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政治现实主义原则的功能性和可操作性，时刻提醒决策者、执行人在梳理和应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时，要在战略和政治层面高屋建瓴，避免简单粗暴的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干扰；同时审时度势、量力而行。

然而，在泛道德主义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既是一股清流，却又因此而水土不服。在笔者读博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关于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式微最流行的说法是，他过度强调了实力和国家利益的作用：前者导致滥用美国的实力和军力，直接造成了越战惨败；后者则以国家利益为名在内外政策中加入个人或党派的私利。回头看，诸如此类的政策偏失和政坛乱象，与美国政治和决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和人为操作息息相关，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

①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是：第一，政治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其根源存在于人性之中。第二，国际政治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以实力界定利益观念，它提供了理解国际政治理性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第三，现实主义视实力界定的利益为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第四，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政治行动的道德重要性，但不能把一般的道德原则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应用于国家行动。第五，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第六，人性是复杂的，为了推导出—门研究政治行为的自主理论，就必须把“政治人”概念从人性的其他特征中抽象出来。See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3-17.

②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Minneapolis: Franklin Library, 1980.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则不着边际了。事实上，摩根索一直抵制麦肯锡主义，反对越南战争，且严厉批评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后者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对他进行秘密调查，还指使一些学界大老（如哈佛的教务长麦乔治·邦迪，后任肯尼迪政府的国安顾问）对他进行“围剿”。^①

作为古典现实主义领军人的摩根索，其最为“不可饶恕之罪”，是他反对美国国关学界过度“理论化”的弊病。摩根索认为，由于文明的多样性和事物的复杂化，任何以一概全的所谓“宏大理论”都不足以解析多样和多变的现实世界；而美国国关学界不遗余力地探寻和发展所谓终极理论的做法，不过是为了将西方理论强加于他人，而这事实上造成了“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②在这个意义上，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同时代的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如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基本同步，美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种族主义，与其对外政策中对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肆意干涉、穷兵黩武（如越南战争、1973年智利政变等）相辅相成。^③也许正因为如此，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与他本人对越战和对种族主义的批评都很难适应20世纪80年代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宗教化的保守主义（如里根主义）回潮的大势，最终被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所取代。

如今，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已远离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自省、自重和自我约束力，而是一种信念（理论即是上帝），^④它源自美国狭隘的自身历史叙事和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即美国的生成、崛起和早期扩张是建立在对原住民持续的、残忍的清除，以及对周边地区无休止的侵蚀和掠夺上的。进入21世纪，恰恰是在美国综合实力全面下降的这个历史阶段，国际政治在美国学界所谓现实主义大师们（米尔斯海默、沃尔特、埃利森等）笔下，骤然陷入美式的国大必霸、霸者必战的闭环中无法自拔。米尔斯海默的

① H. Karkour, F. Rösch, “Toward IR’s ‘Fifth Debate’: Racial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4, Vol.26, No.2 pp.1-20.

② Ibid, p.7.

③ Ibid, pp.7-11.

④ 米尔斯海默在2025年年底的一次访谈中称“理论即是上帝”（Theory is God）。See “We’d be better off if there was NO ISRAEL!” interviewed by Fidias Podcast, November 15,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SWpl2sHq0>

“大国悲剧论”从自由派天真的历史终结论，一步跨到国际体制悲剧性的毁灭终局，这也算是某种并非不自然的“终结”吧。

四、结构性现实主义与“长和平”

相较于摩根索更为切近现实的古典现实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or neorealism) 则选择远离现实，刻意回避国家利益这类被认为是价值判断性极强的概念，国家 (state) 被看作为一个整体，而非细分为众多利益集团和不同价值/利益观的载体。在方法论方面，结构现实主义由于使用更少的自变量，如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因而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理论层次。^①

然而，自诩为价值中立的结构现实主义，对大国竞争的看法却相当淡定。华尔兹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于 1979 年问世。此时，美苏缓和已近尾声，1979 年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其直接起因是 1979 年 7 月美国总统卡特密令支持阿富汗反共组织。美苏以外，1979 年大事不断：中美建交，伊朗爆发伊斯兰宗教革命，越军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邓小平访美，中国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伊朗袭击美国使馆导致人质危机……在如此动乱纷扰的世界中，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华尔兹却认为美苏两极体制是最为稳定的国际秩序，^②因为两个超级强国在两极体制内都是“守成大国”，都有能力和意愿维持两级体制的持久性，^③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④在华尔兹看来，美苏双方不时对对方采取“过度反应”的两极体制，显然比常常产生“误判”的多极世界更为稳定。“误判和过度反应哪个更糟？误判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最终威胁到力量平衡，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过度反应则相对不那么糟糕，因为它只会造成金钱损失和有限战争”^⑤。

① See Kenneth Neal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② Ibid, pp.161-193.

③ Ibid, p.176.

④ Ibid, p.208.

⑤ Ibid, p.172.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结构现实主义论者都在冷战高峰期间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必要性和合理地位。结构性现实主义出台后不久，美苏关系的缓和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戛然而止，卡特政府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宣布对苏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1年里根任职后不久就宣布苏联为“邪恶帝国”。尽管如此，美国政治学主流不仅没有修正结构现实主义对两极秩序稳定的乐观研判，反而逐步摆脱了早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苏联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范式，大量借鉴西方政治学中的“成熟”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美国“苏联学”的“正常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美国政治学界和苏联学界对苏联体制及其变革更为钟情，以至于对苏联体制的突然解体完全无感。^①

美国国际学界对两极体最为推崇的莫过于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甚至在具有冷战结束标志性事件的1986年10月美苏冰岛峰会前半年，他就在美国《国际安全》期刊发表了著名的《长久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稳定之因素》一文，认为冷战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稳固的国际体系：“冷战纵然有相互竞争、令人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然而大国关系却保持了20世纪最长久的稳定。即便与近代史上最为长久稳定的大国关系相比也毫不逊色。”即便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剑拔弩张，摩擦不断，但经过早期的磨合之后，双方在冷战后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隐性的“规则”，这包括默认彼此的势力范围，容忍对方一些并非友善的行为，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对方领导层危难时不落井下石等。关于最后一点，加迪斯着重指出，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从未公开质疑对方领导人的合法性。^②不仅如此，“两极体制的稳定确实需要双方审慎、成熟，并富有责任感。……双方都认识到竞争是国与国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首先需要意识到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一国之安全不仅取决于为自身安全所采取

① 关于美国苏联学对苏联研究“正常化”的论述可参考于滨：“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6期，第167-197页；于滨：“转型的迷茫与困惑”，《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8-136页；于滨：“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3-20页。

② J.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6, Vol.10. No.4, pp.99-142.

的措施，而且要顾及这些措施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不安全感”^①。

两极稳定论的鼓吹者远不止美国国关学界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早在苏联解体前两年，自由派的福山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②在苏联解体前一年，美国老布什总统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新时代，世界将免于恐怖，人们将致力于公正，追求和平。在这个世界上会让东西南北各国共同繁荣，和谐相处。……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这将是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她将是法制取代丛林规则的世界，各国将共同承担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义务，强国会尊重弱者的权益……”^③

显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苏联解体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④，恰恰是以苏联存在为前提的两极体制。

退一步讲，即便是偏向极端保守派的里根总统，也企盼一个相对无害的、核武库得以妥善管治的两极体制，并不指望改变苏联国家机制的性质或弱化其执政能力，更没有寻求单极世界的奢望。在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期待或臆想苏联即将垮台，而苏联解体时美方毫无准备……事实上，里根总统本人确实相信美苏应该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条件下实现共存……里根所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⑤。

其实早在 1956 年，苏联领导人就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政策，这一政策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最终为美方所接受。数月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讲”，提出要寻求一个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

① J.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6, Vol.10. No.4, p.140.

②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No.16, pp.3-18.

③ George H. W.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and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September 11, 1990,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the-persian-gulf-crisis-and-the-federal-budget>

④ 《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于 1932 年创作的科幻小说。

⑤ E.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p.250.

一个真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的生活有价值的和平，一种使人民和国家能够成长、充满希望并且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①

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的对苏政策并未止步于理想主义式的政策表述，而是在后来的 15 年里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事实上接受了“双边安全”或“两极安全”，即尊重苏联的安全利益，其标志是承认“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并与苏方达成一系列军控条约，允许对等监控和定期核查，以此来规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增加双方核武库的透明度，正如卢金所言，美苏在冷战期间至少就“哪些事不能做”达成了共识并加以制度化，^②客观上为 20 世纪下半叶的“长和平”创造了条件。

即便是在战火连天的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还是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提出了“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原则，不管其动机和结果如何，至少在形式上有别于欧洲列强赤裸裸的帝国/殖民主义，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可以说，美国外交史上的这两种不同的安全观（集体安全和两极安全），都比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单极/绝对安全更为开放和开明。

如今 21 世纪的大国竞争论者（米尔斯海默、沃尔特等）对美国在 20 世纪初倡导的多极安全选择性遗忘，其论述的字里行间完全不见结构现实主义拥抱两极秩序的任何痕迹，而仅仅从美国早期的狭隘历史（门罗主义）中移花接木，“升格”为普世理论，还套用在对他们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非西方大国（中国）身上。如此舍近求远，以一概全，应是美式大国竞争论者的硬伤，也有悖于西方/美国现实主义的传统。^③

① “1963 JUN 06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s – Peace Speech Transcript”, <https://ia800109.us.archive.org/17/items/1963jun06presidentjohnf.kennedyspeacespeechv01/1963%20JUN%2006%20President%20John%20F.%20Kennedy%27s%20-%20Peace%20Speech%20Transcript.pdf>

② “卢金：‘三分天下’这类说法只是炒作，当下真正该做的是……”，观察者网，2026 年 2 月 5 日，https://www.guancha.cn/YaLiShanDaLuJin/2026_02_05_806172_s.shtml

③ 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爱德华·卡尔（E. H. Carr）、摩根索、华尔兹等。

五、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文明问题”

如前所述，冷战高峰时期结构现实主义为美苏两极秩序的地久天长著书立说，乐此不疲，为何到了中国崛起的 21 世纪，大国关系在米尔斯海默笔下就势必蜕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无法共存的原始丛林了呢？

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远超巅峰时期的苏联，但既不输出暴力，也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是致力于提升国民福祉，积极发展生产力，并将国内经济技术的进取以各种方式惠及邻国与世界。过去几年间，中国就发展、安全、文明对话和全球治理提出一系列倡议，换来的却是美国和西方在国际公共空间中持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奇怪组合。

作为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后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完全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

对于当下美国现实主义语境中此类片面性和极端性，古典现实主义论者摩根索在 1958 年出版的《政治的困境》一书中就相当警觉。他指出，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已经在美国生成，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性宗教，是一种将特定民族的标准和目标与普世原则等同起来的“民族-普世主义”。^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科学愿景与实证主义的信仰相结合，变异为摩根索所说的“文化盲点”^②；其“表面中立的文化修辞”迟滞了人们（对世界）的政治想象力，也掩盖了美国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也以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傲慢”来处理对外关系。在摩根索看来，美国内部的“癌变式的”种族主义与对外政策中的帝国/种族主义（尤其是他强烈批评的对越战争）有不解之缘。^③

摩根索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的、“正常的”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知识精英对现实无感和无视、一味追求学科的科学化、理论化的潮流

① Hans Morgenthau,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176.

② A. Lang, Jr. eds.,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ns J. Morgenthau on Aristotle's the Politics*, Westport: Praeger, 2004, p.36.

③ H. Karkour, F. Rösch, "Toward IR's 'Fifth Debate: Racial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4, Vol.26, No.2, p.8, p.11.

一起吊打，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①事实上，直至二战结束，种族一直是美国国关理论的主要变量之一，^②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旗舰期刊《外交事务》创刊头十年（1910—1919年）的刊名居然是《种族发展杂志》。^③然而，二战以后，随着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确立，种族的痕迹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被系统地“清理”和漂白，以至于在整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尽管各种“亚理论”层出不穷（如各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读者却无法找到任何“种族”的痕迹；而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空间中，种族又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④

无独有偶，摩根索批评美国学界“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回避美国的现实问题 60 余年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主任凯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为此，她所主持的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正在制定一项类似乔治·凯南在冷战

① 摩根索对美国种族主义的直接体验，是在他 1937 年作为犹太难民进入美国以后。当时美国严格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入美国，美国移民当局对摩根索在美的生活多有限制。此时，摩根索开始注意到美国针对有色人种的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此十分震惊。See H. Karkour, F. Rösch, “Toward IR’s ‘Fifth Debate: Racial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4, Vol.26, No.2, p.8, p.11；十余年后，陆续到达美国的数万德国战俘也经历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他们作为白人，所受到的待遇远高于美国黑人官兵。See Matthew Taub, “‘Are We Not American Soldiers?’ When the U.S. Military Treated German POWs Better Than Black Troops”, *Time*, July 28, 2020, <https://time.com/5872361/wwii-german-pows-civil-rights>

② R. Vitalis, “The Graceful and Generous Liberal Gesture: Making Racism Invisible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Vol.29, No.2, pp.331-356.

③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1910 年创刊时取名为《种族发展杂志》（*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1919 年更名为《国际关系》（*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1 年再度改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使用至今。See R. Vitalis, “Chapter 7. Birth of A Discipline”, in David Long and Brian Schmidt, ed.,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161-162.

④ 特朗普二任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雇佣了大批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全美各地暴力搜捕非法移民，人为制造种族对立，甚至枪杀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白人。2026 年 2 月 5 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将拥有非裔血统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拼图为猿猴，引发众怒。参见齐倩：“特朗普发视频影射奥巴马夫妇为猿猴：惹众怒后罕见删帖，还甩锅‘工作人员’”，观察者网，2026 年 2 月 7 日，https://www.guanancha.cn/internation/2026_02_07_806405.shtml

期间提出的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①斯金纳作为一名非裔学者型官员，如此偏爱苏式“白人”共产主义，美式种族主义的变态令人无语，更令人震惊。

笔者在此并非指责 21 世纪的现实主义论者们是种族主义者。在美国和西方的公共空间中，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在乌克兰、委内瑞拉、伊朗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做法都强烈批评，在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美国非常难得。

尽管如此，摩根索称之为与结构性种族主义息息相关的“文化盲点”在美国学界普遍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早在非裔的斯金纳对“白种人”的共产主义制度（苏联）“示爱”的前三年，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戴维·莱克（David Lake）在该学会 2016 年 12 月号的《政治观点》上以《国际关系研究是白种人的天地》为题，批评美国国际关系学是由白人主导、为白人服务的建构。^②

莱克对美国学界的批评是建立在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上的，认为只要引入更多的有色人种，美国国关学界的种族主义就会减弱以致消失。然而，三年后非裔官员斯金纳对白人共产主义制度的“偏心”表明，比之冷战期间美国结构性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如法律保护的种族隔离），后冷战期间的美国种族主义的表象更是观念性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冷战期间非常在意苏联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评，为此终于在 1964 年以立法方式终止了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在后冷战时期，即便是美国的自由派精英（包括奥巴马在内）也极力淡化和回避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拒绝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批评。^③

也许纯属巧合，米尔斯海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界“联俄制华”派的主要

^①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foreign-policy/2727423/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② D. Lake, “White Man’s IR: An Intellectual Confess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6, Vol.14, No.4, pp.1112-1122.

^③ 有关探讨参见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56-74 页。

推手。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米尔斯海默加入美国外交政策界为数不多的非主流派（即现实主义派），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警告乌克兰进一步倒向西方的后果。然而与其他现实主义论者不同，^①米尔斯海默最为担心的是，美国和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会不可避免地将俄罗斯推入中国的怀抱，也会分散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注意力。^②米尔斯海默的这一“独特”视角和逻辑，虽未能扭转克里米亚危机以后不断恶化的时局，但也得到主流派的密切关注，在《纽约时报》和《外交事务》等平台上，经常可以见到米尔斯海默的长篇大论，^③有意无意地推动了十余年来美国和西方外交界、学术界“联俄制华”政策的酝酿、成形和操作。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前后，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拓展。在美国现实派看来，美国的长远战略应寻求在大三角中避免与中国、俄罗斯同时对抗，尤其应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以中俄为主体的反美“轴心”。2016年大选前，美国战略界正式启动“联俄制华”研究项目，数十名专家、学者参与的历时三年的研究项目，力图寻找撬动中俄关系的着力点。期间，这个外交/国关研究团队除了著书立说，^④还游说美

① 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Former U.S. Ambassador: Behind Crimea Crisis, Russia Responding to Years of ‘Hostile’ U.S. Policy”, *Democracy Now*, March 30, 2014, <https://www.pressenza.com/2014/03/former-u-s-ambassador-behind-crimea-crisis-russia-responding-years-hostile-u-s-policy/>; George Kennan, “A fateful 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97, <https://www.nytimes.com/1997/02/05/opinion/a-fateful-error.html>

② 早在2008年德国慕尼黑第七届国际关系专家会议上，米尔斯海默在会上以及与笔者会下交流中就坚持认为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See “Who Will Lead the World?” 7th Expert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nich, Germany,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Bonn and the BMW Foundation, October 15-16, 2008.

③ John Mearsheimer, “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 The Underappreciated Risks of Catastrophic Escalation”,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playing-fire-ukraine>;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14; “Getting Ukraine Wrong”, March 1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14/opinion/getting-ukraine-wrong.html>

④ R. Ellings, R. Sutter, A. Stent, C. Ziegler, R. Weitz, P. Mattis, J. Steinberg, *Axis of Authoritarians: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2018; Brian Franchell, Tomohiko Uyama, Angela Stent, Bin Yu, Alexander Lukin, Robert Sutter, Hiroshi Yamazo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Russia-China Relations: Regional Perspectives”, *Asia Policy*, 2018, Vol.13, No.1.

国国会，^①策应特朗普一任期间的“联俄制华”举措。^②2025 年特朗普二任以来，如何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将美国的战略资源转移至“印太地区”，一直是其外交主线，以致所谓“反向基辛格”（Reverse Kissinger，即联俄制华）的说法充斥美西方的公共空间。^③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竞争/悲剧论与种族色彩浓厚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惊人相似，即与非西方、非白人、非西式民主的中国与美国、西方的恶性竞争以至战争，属于“文明冲突型”的无止境的“冲突-征服-再冲突”的死循环。^④

六、米尔斯海默的“真理标准”：实力 vs. 实践

作为现实主义论者，米尔斯海默当年在《大国政治的悲剧》开篇就宣布：“检验理论的终极标准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真实的世界。”^⑤24 年后，米尔斯海默在讨论“大国竞争”的文章中强调，只有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中美俄才符合所谓的“大国”标准，而中美俄三强秩序的起点确立于 2017 年，其标志是这一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此秩序如此定义。^⑥那么，过去八年（2018—2025 年）中美俄三方是如何互动、演绎的？米尔斯海默定义中俄作为已经崛起的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因循其“国强必霸-霸则必战-战之必衰”的逻辑？按照米尔斯海默这个以经济、军事实力为标准的中美俄近乎等边的三角架构，为何美国与中俄同时为敌？为何俄罗斯东西两条漫长边界线的“宿命”完全不同？

① Robert Sutter, “Confronting Growing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Options for Congress”, Brief for Congressional Outreach, November 1,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confronting-growing-china-russia-cooperation-options-for-congress>

② 关于对特朗普一任期间“联俄制华”政策的分析，参见于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3-41 页。

③ David Ignatius, “The long odds for Trump’s ‘Reverse Kissinger’ gambl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5/04/03/trump-foreign-policy-reverse-kissinger-china-russia-gamble/>

④ 在亨廷顿笔下，包括冷战在内的“西方内战”是可以了结的，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无解的。See 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

⑤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6.

⑥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7.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即苏联解体）^①之后的俄罗斯，其漫长的东西边境都处于极为不确定的状态。30 年后，俄罗斯的西部边界烽火连天，已经持续 4 年之久的这场 2.0 版的“西方内战”^②仍难以收场，战事扩大、升级的可能依旧。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中亚各国却“东线无战事”，成为经济、人员交流的纽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苏联最后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首任民选总统叶利钦，到接班人普京，他们上任后均选择倒向西方。戈尔巴乔夫不仅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巴热”（Gorbamania）还风靡欧陆。^③叶利钦对内施行“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即休克疗法），对外则全面倒向西方，宣称俄罗斯与西方“不仅仅是伙伴，更是盟友。”^④普京上任伊始也曾极力修补叶利钦离任前与西方的裂痕，高频率地走访欧洲列国，甚至他在东德德累斯顿市克格勃机构五年的任职经历（1985—1990 年）也被德方认可，德国学界居然有人称普京为“在克里姆林宫的德国人”。^⑤曾几何时，北约不间断的东扩使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沮丧以至愤恨，最终导致了 2022 年的“特别军事行动”。

反观东方，中国及中亚各国一直与俄方合作：确认边境走向，实现非军事化，建立信任/核查措施等。从上海五国到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双方和中亚各方逐步扩大合作领域，强化磋商机制，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稳步崛起，俄罗斯历史性衰落；中方并未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如北约东扩那样）。相反，中俄之间的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的外延

① Пути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распад СССР стал трагедией для миллионов. 5 мая 2005 г. <https://ria.ru/20050505/39937603.html>

② 亨廷顿在 1993 年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将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建立以后的国际关系定义为西方内战，其中包括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冷战结束标志着“西方内战”的终止，也开启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See 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23;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笔者首次提出此轮俄乌冲突是 2.0 版“西方内战”。See B. Yu, “China-Russia Relations: ‘Western Civil War’ Déjà Vu?”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2014, Vol.16, No.1, pp.141-152.

③ See J. Hoag, “Needling Gorbachev”,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1989.

④ “Boris Yeltsin’s Speech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ith UN-Summit”, January 31, 1992, <https://www.c-span.org/video/?24101-1/security-council-summit-meeting>

⑤ A.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1.

与内涵不断扩展、深化。与此同时，中俄双方均保持了各自的战略自主性，完全超越了西式结盟体制，成为国际大变局时代少有的稳定、正常的大国关系典范。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论”也许可以解释西方“文明”中暴力传统的延续（北约东扩和俄罗斯的绝地反击），但却完全忽视了中俄两大文明之间超越历史恩怨和集团政治的“正常”关系。^①

冷战结束前后中苏/俄关系正常化的历程表明，中美俄三边关系早已远离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中定义的超越时空的相互猜疑、时刻竞争的“等边”三角状态。这也进一步表明，大国关系在国力、国情巨变之际并非会像米尔斯海默想象的那样滑入竞争甚至战争的恶性循环，否则将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在俄罗斯历史性衰落期间未像美西方那样落井下石。如前所述，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三代政治领袖的“脱俄入欧”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中俄关系正常化的大势。^②可以说，即便没有北约东扩，中俄关系正常化的趋势也不会逆转。影响国与国关系的变量，尤其是大国关系，实力消长仅仅是众多变量之一，就中俄关系而言，甚至不是主要变量。^③

事实上，中俄关系在世界秩序和中苏/俄关系剧变过程中逐步正常化，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也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包括“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处事哲理。在西方殖民/帝国的触角伸入东亚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不是以纯粹的实力或实力平衡为游戏规则的丛林秩序，而是一个以公正但不平等关系为前提的超稳定建构。^④按照白鲁恂（Lucian Pye）的说法，中国“更像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⑤这

① 笔者于 20 年前首次提出关于中俄“正常”关系的概念，参见于滨：“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116-136 页；Bin Yu, “In Search for A Normal Relationship: China and Russian In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7, Vol.5, No.4, Stockholm, Sweden, pp.47-81; Bin Yu, “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Asia Policy*, 2018, Vol.13, No.1, pp.12-18; 于滨：“中俄正常关系的再思考：理论、历史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23-55 页。

② 于滨：“中俄正常关系的再思考：理论、历史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41-49 页。

③ 参见同上。

④ See H.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Press, 2011, p.16.

⑤ See L. Pye,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No.132, p.1162.

也可以解释为何历史上的中国鲜有西式殖民扩张的动机和劣迹，为何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亚传统地区秩序超级稳定。相较于西方表面主权平等、而实际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传统的东亚秩序的表象是主次分明的“等级”制度，但其运行机制却是中央政权对周边国家的“公正”原则。^①反观欧洲各国之间、欧洲与近邻之间 600 余年无休止的征战，最终导致西方对广袤的非西方世界的殖民统治。而随着西人东进，中国实力弱化，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东亚战火不断，根本原因是中国作为地区稳定基石的弱化。此时处于中华文明圈边缘的日本“脱亚入欧”，全力拥抱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直至 1945 年。

数十年来，美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讨论传统和近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上述特性。早在 1968 年，哈佛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s）就曾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地区国际秩序远比欧洲秩序更为平和与稳定。^②2001 年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出版之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康灿雄（David Kang）就指出了东亚传统秩序的高度稳定：1200 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鲜有征服性战争，在中国邻国中没有一家消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东亚。^③2007 年，康灿雄与美国、英国的数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一道，对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迷恋的“实力平衡”（balancing, balance of power）概念的普适性提出质疑，认为欧洲历史上这一通行的概念和策略很难解释西方以外的文明行为，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外部制衡或其他旨在遏制中国的协调努力——无论是在中国强大时期还是衰弱时期。当时的普遍行为模式与制衡截然相反：各国正式承认中国在等级体系中的至高地位……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周边的次级国家之间，而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也不是中国为了维

① H.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Press, 2011, p.16.

② J.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0.

③ D.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3/2004, Vol.28, No.3, pp.57-85;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 Ikenberry, M.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63-189.

护体系秩序而进行的惩罚性远征所导致的。当中国政局稳定时，其他国家会避免相互攻击或攻击中国。当中国王朝内部开始衰落时，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会爆发，因为中国朝廷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事务。一旦中国恢复秩序，此类冲突就会停止，国际关系也会在几个世纪内保持相对和平。在这样一个稳定的体系中，国家的数量在几个世纪以来也基本保持不变”^①。

康灿雄陆续在主流国关期刊和学术出版社发表海量著述，不断充实和深化其论点，影响逐步扩散。^②美国《国际安全》在 2025 年春季号发表米尔斯海默的《战争与国际政治》后，又在夏季号发表了康灿雄等人的《中国到底要什么？》一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内政主导型国家，追求的是维持现状，而非对外扩张霸权，其战略意图自始至终都是清晰、连贯且有限的。文章批评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认知的严重偏差，导致中美合作空间被大大压缩。^③该文随后被美国《外交事务》全文转载，^④足见其在政策界的影响。令人不解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二十五年如一日，对美国国关学系统中

① W. Wohlforth, R. Little, S. Kaufman, D. Kang, C. Jones, V. Tin-bor Hui, A. Eckstein, D. Deudney, W. Brenner, “Testing Balance-of-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Vol.13, No.2, pp.155-185, p.172.

② See D. Ka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ome articles on major academic journals: D. Ka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0, Vol.76, No.1, pp.65-93; D. Kang, X. R. Ma, “Power Transitions: Thucydides Didn’t Live in Ea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8, Vol.40, No.1, pp.131-154; D. Kang, “Why was there no religious war in premod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14, Vol.20, No.4, pp.1-22; D.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010, Vol.19, No.4, pp.591-622; D.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9, Vol.9, No.1, pp.1-28; D. Kang,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1900”, *Asian Security*, 2005, Vol.1, No.1, pp.53-79; D. Kang, “Why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ptember 2005, Vol.3, No.3, pp.551-554; D. Kang,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tember 2004, Vol.58, No.3, pp.337-352; 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3, Vol.27, No.4, pp.57-85.

③ See D. Kang, Jackie Wong, Zenobia Chan, “What Does China Wa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50, No.1, pp.48-49.

④ D. Kang, J. Wong, Z. Chan. “What China Doesn’t Want: Beijing’s Core Aims Are Clear-and Limite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9, 2025.

如此众多与其观点相反的文献基本无感，^①这在以论争为常态的美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十分罕见。

七、象牙塔内外

学术圈以外，米尔斯海默在美国公共空间中非常活跃，他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互动尤其精彩。尽管二人在学理上分属现实派和自由派，但他们对众多国际问题的分析和评判高度一致：如北约东扩、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西方自由派无节制的干涉-扩张主义、特朗普治下门罗主义的回归，尤其是美国外交中穷兵黩武的历史轨迹等。身为犹太裔，二人均强烈抨击犹太院外集团操纵美国外交和内政，谴责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政策。^②

米尔斯海默与萨克斯唯一的分歧点是关于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萨克斯认同康灿雄的分析，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作为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他高度评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政府的务实政策和治理有效，赞扬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呼吁美国正视中国的成就，制定长期、有效的产业政策。^③米尔斯海默的对华观念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越成功，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美国必须设法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并从军事上做好准备，应对不可避免的对华战争。

在辩论中国问题时，萨克斯往往从政策、历史、文化角度切入。米尔斯海默总是从学究式的“现实主义入门”（Realism 101）开始推理，即从概念、

① 米尔斯海默在《战争与国际政治》中干脆不提康灿雄的主张。事实上二人多有各种形式的“交锋”。在笔者参加的有限的学术和政策会议中，二人同在的场合就有数次。鉴于他们的观点如此鲜明地针锋相对，美国昆西研究所还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专为二人开办了一次线上辩论会。See “Debate: Should the U.S. Seek to Contain China?” Quincy Institute, December 16, 2021, <https://quincyinst.org/events/debate-should-the-u-s-seek-to-contain-china>

② See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J. Mearsheimer, S.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Jimmy Quinn, “Jeffrey Sachs, the ‘Israel Lobby,’ and Iran”, *National Review*, June 21, 2024,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jeffrey-sachs-the-israel-lobby-and-iran>

③ Jeffrey Sachs, “China’s Bold Energy Vision”,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2, 2018, <https://www.jeffsachs.org/newspaper-articles/r5jzjgaxwtmexzanykpdhdyneer72>; J. Sachs,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理论，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零和式“安全困境”入手，进而得出结论，大国（包括崛起的中国）固有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致使其不可能善待邻国和其他大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理，世人必须接受。^①

人们面对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米尔斯海默：置身现实的米尔斯海默尊重客观现实，审时度势，为弱小国家（巴勒斯坦）仗义执言，为普京两肋插刀，反对美国的新门罗主义，批评特朗普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决策风格，尤其是“以色列第一”的外交取向。^②另一个米尔斯海默则陶醉于看来只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大国竞争/战争”的理论框架之中。米尔斯海默对此笃信不疑，数十年如一日，拒绝任何形式和程度的修正，这不仅在各类观点和理论激烈交锋为常态的美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非常罕见，也有悖于他“喜欢思想交锋”的自我定位。^③也许这两个米尔斯海默都是真实的。无论动机如何，米尔斯海默的“两面性”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其影响力。

作为现实派的领军学者，米尔斯海默在中国颇受欢迎。然而，米尔斯海默多次来华，与中国学界、媒体频繁互动，^④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却不见任何长进，从未公开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任何兴趣，在其著述和话语中一直贯穿着中美必将一战的言辞和信念。相比之下，同样不懂中文的基辛格在与中方各界人士交往的同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在其后期主要著述中对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阐述之深度、广度和精准度，甚至远在众多所谓“中国通”之上。

① 101 是美国大学本科的入门课、基础课的编号，米尔斯海默曾在与萨克斯的辩论中多次使用。See Glenn Desien, “Jeffrey Sachs & John Mearsheimer: Spheres of Security to Prevent World War III”, *Youtube*, October 16,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kc7AWujEU>

② See Judge Napolitano, “Prof. John Mearsheimer: An Incoherent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5,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7r7ZK1Pnro>; “Afshin Rattansi’s Going Underground, Prof. John Mearsheimer Reviews 2025 Trump’s Foreign Policy Failures, Ukraine Proxy War, Gaza”, December 29,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GzgWzBpUM>; 米尔斯海默的个人网站：<https://mearsheimer.substack.com>

③ 米尔斯海默曾表示，尽管他不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非常赞赏亨廷顿“与传统观念相悖的大胆立场。他喜欢激烈的思想交锋，而我也喜欢争论，我喜欢思想上的较量”。See Gavin Jacobson, “The tragedy of John Mearsheimer: How the American realist became the world’s most hated thinker”,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27, 2023,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2023/09/tragedy-john-mearsheimer?utm_source=chatgpt.com

④ 赵觉理、刘欣、杨升：“美国教授米尔斯海默谈‘大国冲突’：我希望美中用和谐相处证明我是错的”，2025 年 10 月 29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K22EJ8RAIA>

基辛格去世后，中国国关学界和媒体一时出现过“寻找”基辛格“替身”的冲动，^①也许不自觉地转移到米尔斯海默之类的美国“元老级”学者身上。这或许是米尔斯海默近来频繁出入中国高等学府的原因之一吧。然而米尔斯海默无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真正原因，是他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外的一切非实力因素的轻蔑和敌视。在他看来，一切无法以硬性标准测量的因素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说辞。基于这一观念，米尔斯海默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过于突出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因而有悖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定义。^②同理，对于基辛格的中国观，米尔斯海默指出，“中国使用儒家修辞，就像美国使用自由主义修辞一样。实际上，所有大国都冷酷无情：苏联如此，俄罗斯如此，中国亦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当然，这些大国都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它们都创造出一些意识形态，将自己描绘成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基辛格——愚蠢地——相信中国一旦成为大国，行为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就应该更清楚这一点。但他并非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者”^③。

米尔斯海默对其理论完整性和完美性的执着，也许在学界可以畅行，但如果对复杂的现实世界和人类行为采取一刀切的应对方式，不仅无以服人，更难有成效。20世纪上半叶冷战时期，美国将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苏共的傀儡和延伸，拒绝承认亚洲各国的特殊性，结果既“失去”了中国，又深陷东南亚战火。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也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释和改造世界，并在单极世界中追求绝对安全；北约不间断地东扩，最终导致俄乌开战，极大地损害了西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基辛格曾告诫说，对决策者来说，结束一场战争的难

① 朱郑勇：“‘基辛格’还会出现吗？中美间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2024年9月14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722988；朱锋：“寻找‘基辛格’ | 斯坦伯格：‘后基辛格时代’的现实主义者”，2024年9月2日，<https://ciss.tsinghua.edu.cn/info/mggc/7409>

② See Gavin Jacobson, “The tragedy of John Mearsheimer: How the American realist became the world’s most hated thinker”,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27, 2023,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2023/09/tragedy-john-mearsheimer?utm_source=chatgpt.com

③ “Prof. John Mearsheimer to Ivo Hristov: The world pays with blood and chaos for the unipolar order of the US”, *Interview transcript*, Epic Center, Bulgaria, June 13, 2025, https://eepicenter.bg/en/article/Prof--Dzhon-Miarshaymar-pred-Ivo-Hristov--Svetat-plashta-skrav-i-haos-za-ednopolysniya-red-na-SASht/389750/11/0?utm_source=chatgpt.com

度要远远大于决定开战。^①历史的惯性，现实的严酷，各类突发事件，人类的本能或一念之差，都会导致各种非和平、非理性的行为或战争。

这些都是常识，也是人类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智慧型积累，与西学中（包括西方国关学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以一个主要自变量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以人为核心的政治世界完全不同。同理，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拒绝对一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论解说和应对政策，在西方已被俄乌冲突极度困扰之际，还在侈谈围堵挫败比俄罗斯更为强大的中国；全然不顾东亚近半个世纪无战事的现实，拒绝正视强大的中国作为地区稳定基石的历史，以及支配中国行为的文化/文明成分，鼓动在中国周边打造遏制中国的大小联盟。米尔斯海默信奉的所谓现实主义，已充分展现出其非现实和反现实的极端性。

八、“大国竞争” vs. G2、唐罗主义？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理论即是上帝”，而上帝是不容怀疑的。“大国竞争论”问世一年之际，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开启了大国悲剧的序幕还有待观察。表面看来，特朗普团队踌躇满志，“美国第一”原则下贸易战轰轰烈烈，“和平”特使忙忙碌碌，战略收缩迹象明显，远交近攻呼之欲出，唯独对华政策引而不发。尽管如此，美国 2025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华定位却将中国从拜登政府的“步步紧逼的（战略）威胁”，变更为“近乎对等的（经济）关系”；对华的称呼也从相当政治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改为更具文化和地理色彩的“中国”（China）。2025 年 10 月 30 日中美领导人韩国釜山高峰会后，特朗普居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使用“两强”（G2）字眼形容他与中方的会晤。^②而 2026 年 1 月 23 日五角大楼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中，居然只字不提中美之间最为敏

^① 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② Didi Tang, “Trump’s seemingly offhand reference to a ‘G2’ hands status to China that it’s been seeking for years”, *Fortune*, November 4, 2025, <https://fortune.com/2025/11/04/what-is-g2-trump-china-us-trade>

感的台湾问题。^①同时，美国外交和智库圈呼吁稳定中美关系的声音也多有表露。^②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至少在探寻一条与其一任和前任颇为不同的对华战略。究竟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还是避实就虚（宁可不打、也绝不能被打败^③），其最终框架和内容还有待观察，但更少意识形态、更为灵活的双向互动/交易的前景似初见端倪，或至少是一种可能。^④

对于前景不明的中美关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在中美首脑会晤前提出，大国应当尊重彼此的“安全范围”，^⑤以保持距离，减少摩擦，避免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种“大国悲剧”的发生。然而，米尔斯海默却不以为然，他说：

应当着重指出，美国不信奉所谓的（安全）互惠原则。美国认为存在两套规则：一套规则适用于美国，另一套规则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其他国家不允许在西半球部署军力，因为那是我们美国的后院。但美国却可以在他们的后院部署军力。当然，北约东扩至乌克兰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在乌克兰部署军力，尽管乌克兰就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对此提出抗议，仿佛他们也有自己的‘门罗主义’。但我们对此置之不理。我们在东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在中国的眼皮底下（部署军力），而且我们无意离开。当然，我们也明确地告诉中国人，由于‘门罗主义’，我们不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后院。

^①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② Michael Mazarr, Amanda Kerrigan, Benjamin Lenain, “Stab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 *RAND*, November 2025,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956969914/RAND-RR4107-1>; Editorial Board, “Overmatch”,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5/12/08/opinion/us-china-taiwan-military.html>; Gabriel Honrada, Broken eagle: China ‘Overmatch’ warning tests US credibility, *Asia Times*, December 16, 2025, <https://asiatimes.com/2025/12/broken-eagle-china-overmatch-warning-tests-us-credibility>

^③ 高志凯：“同一天两个对话，显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结构已变”，2026年2月6日，https://www.guancha.cn/gaozhikai/2026_02_06_806319_s.shtml

^④ 2025年年底，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在《外交事务》上发文，提出中美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重塑两国关系，以“给和平一次机会”。See Xinbo Wu, “The Case for a Grand Bargai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How Trump and Xi Can Reset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1,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se-grand-bargain-between-america-and-china>

^⑤ Glenn Desien, “Jeffrey Sachs & John Mearsheimer: Spheres of Security to Prevent World War III”, October 16,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kc7AWujEU>

因此，就美国而言，互惠原则根本是无稽之谈。^①

米尔斯海默的这篇访谈至少有三个看点。第一，他在谈及中国时罕见地没有套用其“大国竞争论”。第二，在没有预设“进攻性现实主义”框架的前提下，米尔斯海默坦率地道出了大国间难以共处的根源，即美国拒绝任何对等安全的安排，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但他国必须远离美国的后院。第三，米尔斯海默在 2025 年年初发表的“大国竞争论”中，将美国自身的地区霸权主义，即门罗主义，上升为所有大国的普遍行为；而他现在却认定地区霸权是美国的“专利”；这在事实上否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

尽管如此，米尔斯海默对美国地区霸权主义的认知相当精准。2026 年 1 月 3 日，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并掳走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特朗普随后宣布美国将“接管”委内瑞拉，尤其是该国庞大的能源产业。^②至此，美国数月的“缉毒”行动，瞬间切换为典型的能源之战和政权更迭。^③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行动是在美国后院，矛头直指中国在拉美地区庞大的投资项目。^④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干涉拉美轻车熟路，操作便捷；拉美精英/军方亲美基因强大，便于里应外合；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门罗主义”并无恶感，且以缉毒名义的军事行动对美国人来说已司空见惯。美国以外，其盟友对美国的“斩首”行动大都态度暧昧，似已领会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动武的真实目的（针对中国）。

回头看，特朗普团队对美国外交/军事的这一重大调整早已昭示天下。2025 年 11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定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甚至提出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即

① “Prof. John Mearsheimer Reviews 2025 Trump’s Foreign Policy Failures, Ukraine Proxy War, Gaza”, December 29,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GzgWzBpUM>

② 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3000 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17%，远远高于美国的 800 亿桶。2007 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委内瑞拉提供了 500 亿美元~600 亿美元的各类贷款。

③ 例如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和 2011 年的利比亚“内战”。

④ 包括刚刚开始运行的秘鲁钱凯港，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巴西的锂矿，正在酝酿的巴西两洋铁路等。后者与钱凯港联通，将绕开日渐拥挤、费用高昂和受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大大便利日益增长的中国与拉美的经济互动。参见“中美关键矿产大战，这一地区缘何至关重要？”，2025 年 11 月 2 日，<https://news.ifeng.com/c/8nwqLAUnJMz>；“中国重启南美两洋铁路：解析绕开巴拿马运河的经济与地缘意义”，2025 年 4 月 21 日，<https://news.sina.cn/2025-04-21/detail-inetxfvz6338239.d.html?vt=4>

所谓“特朗普推论”，^①其战略目标和操作方式如下：“在多年忽视之后，美国将重新确立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保护我们的国土以及我们对该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控制权。我们将阻止非西半球国家在该地区部署军队或其他威胁性力量，或拥有或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产。这项对门罗主义的‘特朗普修正案’，是强力重申美国实力和优先事项的常识，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②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责成国安会“立即启动一项强有力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确定西半球的战略要点和资源”，“以削弱敌对外部势力”对该地区“军事设施、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和控制，包括“购买广义上的战略资产”。美国的目标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选择生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各国拥有主权且经济自由的世界”，而不是“选择生活在一个受世界另一端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为此，美国会“竭尽全力将那些在该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排除出去”。^③

在这份 29 页的 2025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涉及拉美的 5 页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但所谓的“外国势力”、“外国影响”的确剑指中国在拉美庞大且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相比之下，也是在这份报告中，关于中俄的部分排在靠后的位置。对此，中方有观点认为，这份报告是特朗普团队不同派别观点的杂烩，恐难以操作执行。^④然而特朗普本人个性多变，言辞夸张，看似颠三倒四，往往使其对手轻视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持久性。在这个背景下，特朗普对华政策隐而不发，对中国领导人“微词在口”，同时对美国后院的中资施以重手。我们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个更为稳定的中美关系，但也必须正视“特朗普推论”对中国在西半球的经济利益已构成重大的现实威胁。

相对于美国在其后院的种种便利，中国保护自己万里外的庞大经济利益

① 美国右翼媒体对此冠以“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的昵称。See Brian Stelter, “How right-wing media inspired Trump’s ‘Donroe Doctrine’” *CNN*, January 5, 2026, <https://www.cnn.com/2026/01/05/media/trump-donroe-doctrine-ny-post-fox-news>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③ *Ibid*, pp.15-19.

④ 沈逸：“用最强硬的方式，吹响战略撤退号角”，2025年12月10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887344341/707e96d502001p7uq>

的备案和手段尚不充足，中国历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也导致中国对拉美经济和政治影响极不对称。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二任安全战略的“地区化”并非心血来潮或新瓶旧酒；而是有的放矢，捏住了中国的软肋。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论”中对美国地区霸权主义的执着和弘扬，尽管难以机械地套用于其他大国的地区政策，应该是相当精准地描绘了特朗普的军事战略的底色。这里，笔者不能不引用米尔斯海默三年前的一句“肺腑之言”。针对澳大利亚既要当美国盟友、又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务实”政策选项，米尔斯海默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的残暴。”^①

九、21 世纪：两种思维与两条道路

米尔斯海默未明确点出美国“残暴”的具体手段。然而特朗普二任第一年强力推行“唐罗主义”，不仅在西半球以邻为壑（变“墨西哥湾”为“美国湾”，加拿大为美国“第 51 州”等），巧取豪夺（着手吞并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的石油等）；还刻意损毁“自由国际秩序”，胁迫盟友，凌虐弱小。此种敌友“通吃”、“荤素不忌”的行为，受到攻/防守性现实主义论者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一致抨击，后者将其定义为“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认为这必将反噬美国自身利益。为此，美国必须与盟友一道，反击如此“黑帮式”的霸权，重建美国的“王道”（benevolent hegemon）。^②米尔斯海默对特朗普的霸凌主义也口诛笔伐，唯一不同的是他认定中国如他想象中的所有大国一样，必定会步美国后尘，寻求地区霸权，进而统治世界。

象牙塔内美国攻/防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论争还会继续下去，然后后冷战的历史轨迹已经清晰无误地刻画出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外交取向。根据美国军方公开的数据，从 2001 年到 2021 年的 20 年间，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投放了 32.6 万枚航空炸弹和火箭/导弹，平均每

① “U.S. Political Scientist: Do Not ‘Underestimate’ How ‘Nasty’ the US Can Be”, *Youtube*, March 14,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5MrqRqfHF4>

② S. Walt,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3,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predatory-hegemon-walt>

天 43 枚。“9·11”以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在大中东地区直接导致了 94 万人死亡，这还不包括 360 万~380 万的间接死亡人数，也不包括 2023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巴以战争中死亡的近 6 万巴勒斯坦人。美西方自损 3 万余人，付出约 8 万亿美元的天价。^①如今，这些地区仍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美国则撒手不管，一走了之。然而在当下西方国关界“大国竞争”论争中，美西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鼎盛时期的这些斑斑劣迹，似被系统性地规避和忘却。

不仅如此，2001 年首日出版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预测力也相当低下：大国间的“竞争悲剧”非但没有出现，美西方过度军事化的外交（即“一炸一路”）均属针对非西方弱小国家的单方面屠杀。对此，也是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基辛格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指出，由于后冷战时期（1989—2000 年）美国秉持“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在世界范围内穷兵黩武，美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而是以军事手段和资本势力整合世界；所谓“外交”即是“最后通牒”。^②美国在 21 世纪过度军事化的对外政策（不是基辛格所说的传统的外交），实际上是在摆脱了两极体制制约后，充分利用所谓“单极瞬间”，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放大版的美国地区霸权的行为。

与美国和西方的“一炸一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在世界各地修路架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那个令进攻性现实主义论者寝食难安、被认为与美西“必有一战”的中国，不仅“不务”整军备战的“正业”，^③反而致力于摆脱贫困等国内民生的改善、全球发展、共同安全、不同文明间对话。“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之后的

① See Marium Ali, Hanna Duggal, “How much have US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ghanistan cost? More than 20 years of US wars have directly killed an estimated 940,000 people and cost the US \$5.8 trillion”, *Aljazeera*, June 24,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6/24/how-much-have-us-wars-in-the-middle-east-and-afghanistan-cost>

②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Easton Press, 2001, pp.17-31.

③ 多年来（截至 2025—2026 财政年度），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 1.5% 以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参见“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华网，2025 年 3 月 4 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304/6430583786a347ce9ccl01ea0d87388/c.html>

十余年间，中国对相关国家的累计合同和投资总额已达到 1.4 万亿美元。^① 这个宏大的数字背后，是数以千计的具体项目，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和相关国家的发展格局。进入第二个十年，“一带一路”已迈入“共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致力于推动更为亲民、实惠的中小项目，“还要从传统的基础设施、传统的产业链转向新质生产力引导的数智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和科技丝绸之路”^②。

与美西方在后冷战时期对非西方世界穷兵黩武的行为完全相反，中国从未对外投掷过一枚航弹，从未颠覆过任何一个外国政权，从未对他国输出中国模式。并且在过去数年间，即俄乌冲突和巴以战争前后，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全球倡议，^③进一步规范了中国与各国正常交往的理念和方式，这与米尔斯海默军事挂帅的“至高无上”的“大国竞争论”构想毫无共同之处。而这位频频来华讲学、自称喜欢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西式理论大咖，对他所认定的对手/敌手的治国理念和处世之道却不感兴趣，也不求甚解。^④米尔斯海默“以不变应万变”的执着（或僵化），与美国政治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苏联的好奇与迷恋情结反差极为强烈。其中是否有种族因素，只能见仁见智了。

大江东去，浩浩荡荡。25 年前基辛格与米尔斯海默所憧憬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前途已殊途同归：“一炸一路”祸害世界后的美国又开始折腾自家后院，“一带一路”却继续造福中国、惠及世界。与米尔斯海默的大国行为趋同（即“国大必霸、霸则必战”）的预测和那些对中美博弈“各打五十大板”的论点相反，中美两国外交的理念、方式和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这里，笔者不能不引用冯绍雷教授高屋建瓴的洞察：“处于全球转型的关键

① 王恺雯：“英媒：2025 年‘一带一路’项目金额达 2135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更信任中国了”，2026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6_01_19_804298.shtml

② “‘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 2024 ‘看中国听世界’论坛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言”，复旦发展研究院，2024 年 11 月 19 日，<https://fdi.fudan.edu.cn/bb/18/c21257a703256/page.htm>

③ 即 2021 年 9 月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 4 月的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 3 月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及 2025 年 9 月的全球治理倡议。参见白乐：“四大全球倡议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网，2025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10/t20251017_5919108.shtml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Unreal Threat from Venezuela”, November 22, 2025, <https://mearsheimer.substack.com/p/the-unreal-threat-from-venezuela>

时刻，中国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应该可以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继往开来作出贡献。要以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关怀天下的传统为底蕴，以自我革命、开拓创新精神为指引，以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勇气与实践，去担当起人类共同使命的召唤。”^①

十、结束语：西式现实主义：警示与限度

在资讯传播极为快捷的 21 世纪，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论”及其政策版的特朗普主义，在中国学界和公共空间的地位也颇为显赫。然而，对任何西方理论的考量必须是整体的、客观的。至少，西论中的大国竞争问题，无论作为一个学理问题，还是一个历史痕迹或现实挑战，或是外交策略/手段，即便在西方学界，仍是一个开放性议题；中国学界应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更应警惕有意无意地“食洋不化”现象。

具体到米尔斯海默的近似军国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特朗普执意“联俄制华”的举措，一些人也许确实相信“狼来了”，中美俄关系似乎又回到冷战“大三角”近乎零和式的博弈状态。不能说此类担忧是杞人忧天，中俄两国毕竟是独立大国，双边关系既非板上钉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后冷战时期中俄之间高水平的正常关系，已经为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相对于西式的理念平等而现实残酷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这无疑是一条全然不同的路径。^②中国学者完全不必担忧美方的橄榄枝是否意味着俄美旧情重续。诸如此类的“担忧”是对中俄关系的内生性和自定力缺乏或失去信心的表现，客观上陷入了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论”的陷阱之中，也给中俄关系增添了不必要的累赘。

除了对特朗普“联俄制华”恐惧症以外，西论中“大国竞争/冲突论”在中国学界最具“拿来主义”特征的，无疑是近期将中美俄三边关系再次提升至国际秩序高度的论点。此论的硬伤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将中美俄三边关系

① 冯绍雷：“全球转型行稳致远需要共同价值目标引领”，2025年8月26日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958448>

② 参见于滨：“中俄正常关系的再思考：理论、历史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4期，第23-58页。

机械地均等划分，无视中苏/俄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特有的“正常”状态。2026 年 2 月 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后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无论从外交礼仪还是沟通内容来看，中俄战略互信/沟通的深度与力度，与各自对美关系的定位差异一目了然。^①相比之下，中美、俄美关系远未达到类似中俄关系的“正常”状态。^②所谓三边对等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的陷阱。

二是将中国外交的宏大叙事和愿景，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下放”至特定的、相对狭窄的新三国演义的游戏之中，客观上抹杀了中国外交特有的价值取向和操作方式。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非西方的超大型文明体和地区稳定的支柱，中国可以在西式适者生存的丛林“秩序”（或无序）中存活甚至发展；但不会无视西式体制的种种弊端，从一而终；而是要立足现实而又不失远大目标。这不是简单的大三角模式可以说明的。

三是观察和参与任何国际秩序层面的“游戏”，都不应忽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这一根本属性。1982 年确立的这一原则，是中国告别冷战期间美苏划线并以全新的、公正的姿态直面世界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无论怎么评估都不过分。^③无独有偶，俄罗斯在经历了与西方浪漫但代价高昂的“单相思”后，也致力于确立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中俄外交理念的变迁和双边关系的重大发展，与特朗普式的雕虫小技和随心所欲的“赢学”之道有天壤之别。近年来，中国原则坚定，不卑不亢，有理有利，以一己之力，抗击并挫败了美方全方位的关税战和科技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以其特有的方式，顶住了美西方数十国的军事高压，并逐步夺回了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而这一切，并不是所谓“新大三角关系”就可以解释得了的。中俄

①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 年 2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602/t20260204_11851123.shtml；“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 年 2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602/t20260205_11851255.shtml

② 关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参考：Da Wei, “America and China Can Have a Normal Relationship: How to Move Past Strategic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30,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and-china-can-have-normal-relationship>

③ 关于“独立自主”外交的构想和制定可参考于滨：“老一辈国际关系学者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澎湃新闻，2020 年 7 月 9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80450

各自的战略举措，不仅维护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和公正性。

行文至此，笔者在探寻西方理论中各式现实主义之余，不能不表达对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尤其是其人格的“偏爱”。这不仅由于摩根索反对美国学界一味追求理论“纯洁性”的执着与偏颇，也因为他抨击美国学界表面“中立”、实则忽视或掩盖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风气，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尚武风气（越南战争）。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现实中的摩根索相当一致，文如其人，其古典现实主义也更具常识性，更少极端性。相比之下，象牙塔内外的米尔斯海默则判若两人，其“大国竞争”的推断貌似严谨、合理，但既不见前人，亦无益于来者。

如今中国学界正致力于发展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应避免摩根索以后一味追求所谓理论“纯洁度”的取向（如以一个或尽量少的变量，解释国家行为，或战与和问题）。当然，在象牙塔中求学修业无可非议，但切忌有意无意地陷入西学中特有的逻辑漩涡而失去自我，尤其是不应忽略或轻视常识，失去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感知和认知。习近平主席在 2025 年 8 月与普京总统通话中就指出，“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①。50 年来，中国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中，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有效排除了西方各类理念的极端成分。

相比之下，西学不仅在人类的认知层面追求单一、线性的理论解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也要求整齐划一。冷战期间，尽管面对一个拥有各种色彩且层次的“混沌”世界，代表主要意识形态的美苏两国所开出的药方极为相似，即把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并按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改造和征服对方。后冷战时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悲剧/冲突论”均属此类。西学在方法论上一叶障目，在意识形态上以“我”划线，在外交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关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品性，与宗教激进主义强烈的排他性极为相似。如此西式国关学大师/理论，个体上似有条理，整体上则

^①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8 月 8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8/t20250808_11687143.shtml

谬误千里，且害人害己，中国学界更要引以为戒。

中国学界对西方现实主义的“偏爱”可以理解，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西式现实主义范式“光环”下其实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既有相对理性、朴素的古典现实主义，刻意远离现实的结构主义，以及近乎军国主义的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政策层面，“现实主义”在特朗普团队发布的主要外交、军事战略的文件和政策表述中被广泛使用，其主要目的除了刻意与民主党的“价值观外交”和“全球主义”划清界限以外，实际上是在为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扩张主义、干涉主义和沃尔特所称“掠夺性行为”（predatory action）提供合法合理的屏障。而日本保守派和美国的亲日派也一直用“现实主义”概念对冲左翼的和平主义和反修宪、反重新武装立场，为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即可以对外使用武力，铺平道路。^①

相比上述西方现实主义的种种变异，摩根索在其《美国政治的目标》一书中指出，美国滥用国家利益观念，在海外穷兵黩武，这是美国国内民主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会进一步侵蚀美国的民主建构，“它会导致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为那些迎合民众情绪和偏见的煽动家铺平道路，这些人将操纵舆论，支持某种很可能是不合理且危险的政策”^②。

60 余年后，摩根索对 21 世纪美国的政治走向一语中的，古典现实主义的智慧与远见，与美国学界泛滥成灾的各类“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适量的“返璞”和“博古”，方能“归真”和“通今”。

（责任编辑 杨 辉）

① See Michael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② Hans Morgenthau,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p.264.

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庞 珣 曲明珠**

【内容提要】在俄乌冲突中，参战各方都在大规模、多样性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情报收集、无人机作战、网络战和智能化舆论战，把作战范围从海、陆、空、天等物理空间扩展至难以察觉的数字和信息战场。作为首场参战各方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军事技术的国际冲突，俄乌冲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一次地区战争，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地缘政治冲突未来情景的预演，显示出新兴科技对权力关系的深刻重塑，增加了大国博弈的维度和复杂性。其中，人工智能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在俄乌冲突中突出表现为创新周期缩短、多维度权力较量和“力量同步难题”，警示大国必须致力于耦合多元权力要素。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也将战场从军事作战延伸至技术主权、军事赋能、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竞逐，展现出人工智能时代大国博弈的复杂和绵延空间。有的大国通过观察和介入俄乌冲突，对智能时代的权力博弈进行战略规划，为竞争范式的转变预做准备，并测试和评估不同新型权力关系的多重风险，采取了具有深意的行动。这些行动正在导致传统战略威慑的失效、由技术民族主义引发的阵营化和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

【关键词】人工智能 俄乌冲突 大国关系 权力 全球风险政治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1-0065(26)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项目批准号：25JJD810002）的阶段成果。

** 庞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曲明珠，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是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大事件，在诸多层面对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产生了深远影响。俄乌冲突具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特点，即参战各方均大规模、多样性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情报收集、无人机作战、网络战和智能化舆论战，把作战范围从海、陆、空、天等的物理空间扩展到了难以察觉的数字和信息战场。^①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大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方式和动机也颇具深意，不仅密切关注战争本身的态势和胜负，更将其作为智能技术军事实战应用的“试验场”，进行密切观察、分析和干预，持续对安全、风险和军事战略进行复盘和再评估。^②俄乌冲突的意义已超出冲突本身，它彰显出新兴科技对全球权力格局可能产生的深刻冲击，也促使国家行为体对权力本身进行重新审视，开启了大国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③

本文拟从全球风险政治的视角，分析俄乌冲突是如何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地缘政治的一次真实风险测评，并引发大国对权力格局的认知转变和政策调整的。人工智能的军事介入正加速大国竞争，改变战争形态，模糊主权边界，使得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紧张。^④俄乌冲突清晰地显示，在军事和国防领域，人工智能无疑是一项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人工智能既可以为防御方提供助力，也能为攻击方提供新的武器，在攻防之间自如切换，显著提高了战术水平。^⑤然而，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和启示，远不限于军事和国防。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是技术、数据与应用场景深度耦合的复杂系统，涉及技术、伦理、法律和战略安全等多维度风险，如系统失控、模糊

① V. Goncharu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efense of Ukraine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ICDS), September 27, 2024, <https://icds.e/en/russias-war-in-ukraine-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efence-of-ukraine>

② M. Erendor et al., “From Operator’s to AI’s Control”, *Insight Turkey*, 2025, Vol.27, No.2, pp.389-412.

③ See A. Vijayakumar, “Potential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F1000Research 11, Article1186, 2023; L. Hunter et al., “The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ecurit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3, Vol.39, No.2, pp.207-232.

④ R. Csernatononi et al., “Myth, Power, and Agency: Rethin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opolitics and War”, *Minds and Machines*, 2025, Vol.35, No.3, p.37.

⑤ I. Prezelj,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nabled Systems by Modern Armed Forces and Some Related Concerns”, *Studies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Professors’ Network*, Miskolc-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ing, 2024, pp.357-394.

战争边界、军备竞赛。^①上述风险不仅会诱发冲突升级，而且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可以渗透至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破坏各国之间的信任，增加外交协调难度，挑战国际社会既定做法和既有规范。^②

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标志着大国间的博弈维度大幅提升，竞争领域延伸至技术主权争夺、军事力量赋能、意识形态较量、产业链重组和全球治理模式重构。人工智能自身的速度优势和不透明性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重塑了大国权力关系，加剧了安全困境。^③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刺激俄罗斯加速军事人工智能研发，导致军备竞赛升级。^④俄乌冲突推动欧盟国家支持共同防御政策，以自助逻辑强化军事人工智能发展。^⑤更重要的是，拥有巨大科技潜力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也不得不开展技术军备竞赛，这有可能颠覆传统的战略稳定和威慑理论，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焦虑。^⑥这些事实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关系需要更为审慎而全面的风险管理。

一、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权力不对称与多维战场

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当下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军事领域

① H. Belfield, "Nathan Sears: '...in the Midst of Catastrophe.'" *Global Policy*, 2023, Vol.14, No.4, pp.625-627; 朱启超：“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展趋势及治理策略”，《人民论坛》，2025年第2期，第46-51页。

② V. Sticher, "War and Peace in the Age of AI",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5, Vol.27, No.2, pp.542-550.

③ See J. Johnson, "AI-Security Dilemma: Insecurity, Mistrust, and Misperception under the Nuclear Shadow", in *AI and the Bom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154-192; H. Hiim,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Intensifying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in B. Steen, *Not Just Another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175-192.

④ 武琼：“俄罗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进展、动因及安全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1期，第81-98页。

⑤ H. Riaz, "Role of AI in Russia Ukraine War and Its Impacts on Europe", *Social Science Review Archives*, 2025, Vol.3, No.1, pp.924-931.

⑥ See A. Rauf et al.,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ms Race, Diplomac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Global Foreign Policies Review*, 2023, Vol.6, No.3, pp.44-63; C. Katzke et al., "The Manhattan Trap: Why a Race to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Is Self-Defeating", December 22, 2024, arXiv: 2501.14749; N. Shahrukh, "Militarisation of AI and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Future Frontlines", *Strategic Studies*, 2025, Vol.45, No.1, pp.43-67; R. Khan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Matrix", *Research Journal for Social Affairs*, 2025, Vol.3, No.4, pp.139-145.

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攸关国家安全根基，大量研究资源已投入到理解和测试人工智能的实战价值和战略影响工作当中，其中包括测评智能武器系统、自主决策算法、情报监控等技术在实战中的应用方式、作战效果及作战效率。^①

（一）人工智能的高风险应用：测试与评估问题

目前人工智能已深度介入现代战争的多域运行。人工智能为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作战提升整体效能，还在情报获取和通信保障等关键环节发挥倍增器作用，使打击行动更精准，资源分配更精细，生成的作战方案亦呈现出较高的协同性与可行性。^②在动能作战中，自动化和联网平台可快速协调部队机动，推动原本依赖分散指挥的火力和行动链条再组织，从而对敌方阵地形成持续压制。在非动能领域，人工智能贯穿情报、后勤、战备管理及兵力部署等多个环节，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强化均势维持和支撑系统。^③在作战效率层面，人机协同实时分析战场数据，比传统方法下达指令更快更准确；预测性维护可以减少装备故障并减轻行政保障负担；使用拥有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和无人系统执行危险或重复任务，可以减少人员伤亡和训练成本。^④

与此同时，风险也是人工智能在高风险领域创新性应用的重要考量方

① 肖洋：“北约人工智能新战略：目标设置与地缘影响”，《当代世界》，2025 年第 6 期，第 57-63 页；陈静然：“从美国实践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与发展隐忧”，《科技中国》，2025 年第 5 期，第 5-9 页；刘胜湘、李志豪：“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趋势及其影响”，《国际展望》，2024 年第 3 期，第 51-73 页；张煌、杜雁芸：“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态势及其安全影响”，《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99-130 页；A. King, “Digital Targe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24, Vol.9, No.2; D. Hagos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actical Autonomy: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Sensors*, 2022, Vol.22, No.24; V. Litvin, et al., “Directions of using technologies of machine training in the military sp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2, Vol.27, pp.161-164.

② 杨辰：“论国家安全视阈下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与治理——以俄乌冲突为例”，《国际论坛》，2023 年第 2 期，第 61-82 页；赵国柱、陈玮璠：“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典型场景研究”，《战术导弹技术》，2022 年第 6 期，第 111-115 页。

③ M. Horowitz et al., “AI,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I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914-936.

④ P. Tortoric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Examining US and Chinese Policy Mechanisms for Strategic Advantage in Emerging Technology”, *AF Fellows Paper*,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2020; R. Thiele, “Nineteen Technologies in Focus”, *Hybrid Warfare: Future and Technologie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1, pp.71-124.

面。政府、军方和学界亟须对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进行风险观测评估，如自主式人工智能武器、AI增强型传统武器、人机协同指挥控制决策系统等。^①人工智能系统本身能够进行高精度的风险模拟，对效率和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但对于国家的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高风险领域而言，仅靠模拟评估远远不够，需要在实战中得到观测、验证和反思。然而，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科技，不但在高风险领域的应用无先例可以分析，而且出于对风险和伦理的考虑，国家无法进行大规模实战测试。

俄乌冲突作为二战后爆发在欧洲大陆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国家间战争，为观察和分析人工智能军事实战价值和风险测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战争一方的俄罗斯素有网络强国之称，而另一方的乌克兰则得到西方的战争技术支持和援助，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人工智能应用于大规模实战的“前沿试验场”。各大国抓住机会进行密切观察，一些国家还根据测评需求进行有目的、有设计的干预，以此获得人工智能对未来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竞合的宝贵信息及态势感知能力。

人工智能作为风险不明的新兴科技，在俄乌冲突所制造的“非常规”情形下，突破了对技术应用风险评估的常规限制，得以大规模、快速、多样地应用到实战当中。在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的介入包括人机借助视觉计算达成目标识别攻击、直接投入军事行动，以及采用深度学习、生成对抗网络、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战争信息传播、舆论制造和战争记忆塑造。^②借助加速创新的“六周创新周期”和对数字信息战场的赋能，乌克兰有了与作为工业强国和素有网络强国之称的俄罗斯进行对抗的不对称优势。此外，网络能力和动能作战之间的“力量同步难题”也在战争中显现出来。

（二）“六周创新周期”

俄乌冲突让人工智能充分展现了短周期内快速创新的力量。军事技术发

^① O. Kostenko et al., “Problems of U.S. in Autonomous Military AI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Baltic Journal of Legal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No.4, pp.131-145; M. Favaro et al., “False Sense of Supremacy: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Risk of Nuclear Escalation”,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2023, Vol.6, No.1, pp.28-46.

^② M. Makhortyk et al., “4 AI Visions: Representing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for Humans and Machines”, in Nadia Zasanska et al., *Digital Warfare Media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Russo-Ukrainian War*,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5, pp.107-122.

展与实战部署之间的时间大幅缩短，这促进了战场态势的迅速演变。在俄乌冲突中测试出，一项新的技术、战术或武器系统（尤其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从部署到被对手找出有效应对办法所需的时长，已缩短到六周左右，被称为“六周创新周期”。^①这意味着，战场的态势高度取决于创新迭代的速度，哪一方的创新速度更快，就更能战场上掌握主动和赢得胜利。装载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拥有自主目标识别、数据快速处理和决策能力，加快了作战响应速度，提升了打击精准度，并降低了人员风险。^②这有别于传统战争中以物理力量压倒对手的基本逻辑，意味着基于国家硬实力的权力概念需要得到彻底的重新审视。传统的军备竞赛以武器库的规模作为基本评测，而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迭代意味着全新的“军备竞赛”逻辑，^③这不仅改变了战场的面貌和节奏，更动摇了传统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

同时，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对战场的适应能力和作战战术的灵活性成为核心。这与传统战争中依赖长期战略规划形成鲜明对比。技术的快速迭代，促进了人工智能系统在战场环境中进行实战部署和应用的速度。乌克兰实施了简化采购、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审批流程等措施，并搭建公私伙伴关系的政策框架，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创新创造了快速通道，从对产品进行测试、评估，到选好产品签协议，可在一周内完成。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正式军队来说，这都是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过去，国家的国防采购缓慢而烦琐，从概念构思到正式部署大约需要数年时间。俄乌冲突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乌克兰依靠私营企业达成商用转化为军用的灵活而迅速的创新模式；俄罗斯主要利用其国家军事工业综合体，由国家和军事需求主导，在优势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护卫技术主权。^④然而在人工智能时

① S. Young, “UK firm supports Ukrainian armed forces in drone tech race”, March 2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uk-firmsuports-ukrainian-armed-forces-drone-tech-race-2024-03-27/>

② C. Salac, “Dro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The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 War in Ukraine Are Redefining Modern Warfare”, *Strategies XXI: Technologies – Military Applications, Simulation and Resources*, Roma: Carol 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25, pp.43-49.

③ T. Kao, “Drones and AI in Modern Warfare: A Securit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2024. <https://digitalcollections.sit.edu/szg2/4>

④ 张建：“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布局特点及国际影响分析”，《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24-50 页。

代，后者曾经所具有的优势有可能转变为劣势。

灵活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虽能聚集多样化的供应商资源，也带来了系统集成和操作性兼容方面的挑战。这促使乌克兰打造专门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推动了一种新型共生关系的诞生：技术对接和共享研发管线正逐渐成为军事同盟的关键支柱。乌克兰成为外国无人机公司扎堆的市集和西方国防技术的关键试验场。西方军队的目标是，通过在俄乌战场上的测试，得到与等量级战争对手作战的实际经验，并在战场上检验军事产品和作战想法，得到独一无二的反馈回路。乌克兰作为交战一方，通过为西方国家提供这样的技术实验，得到了即使是极为重要的西方盟国都难以企及的大规模和长期作战支持。乌克兰和西方的新型同盟关系建立在技术共生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家间关系新的可能性。

（三）信息战场的全线开辟

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使战争进入“全景式战场”时代，并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中同时展开。人工智能已成为情报收集、影响力行动和战略决策的核心工具，其军事应用凭借自主系统、预测分析和决策支持等技术，重新构建了作战方式和场域，权力较量从物理战场全面延伸至数字及信息维度。

俄乌冲突期间，交战双方均把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到新型无人机上，支撑 GPS 失效环境下的导航、图像识别等半自主作战任务，两国还发展了云基础的指挥控制平台，如乌克兰的 Delta 系统、Kropyva 国防测绘软件和俄罗斯的“俄罗斯数字天空”一体化系统等。这些架构可打通空、海、陆和网络多环节的数据，实现卫星与无人机影像分析流程的加速，优化无人机的自主识别及协同配合能力，推动决策过程的加快和突破电子战干扰。^①乌克兰借助人工智能处理来自开源情报、社交媒体、地面传感和无人机拍摄影像的海量信息，^②辨认并追踪俄罗斯军队，比人类分析师单独完成得更快，提供的战场图像更准确。这使得乌克兰在地缘空间智能领域获得显著优势。

^① K. Stepanenko, “The Battle field AI Revolution Is Not Here yet: The Status of Current Russian and Ukrainian AI Drone Effort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June 2, 2025. <https://understandingwar.org/research/russia-ukraine/the-battlefield-ai-revolution-is-not-here-yet-the-status-of-current-russian-and-ukrainian-ai-drone-efforts/>

^② W. Wells, “Battle field Evid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nabled Warfare”,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25, Vol.26, No.1, pp.218-248.

交战双方在网络空间的攻防也异常激烈。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就对乌克兰政府、电信、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发动了网络攻击。俄乌冲突爆发当天，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卫星供应商 Viasat 的网络攻击，导致超过四万台调制解调器无法使用。乌克兰请求私营科技公司提供网络安全服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启动了星链（Starlink）卫星服务，迅速取代了受损的通信网络。亚马逊也协助乌克兰政府、银行和学校将关键数据迁移到云端，避免物理攻击导致的数据毁灭。微软每天分析上万亿条信息检测威胁，提前预警攻击，还积极干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如 2022 年 4 月接管俄罗斯黑客控制的 7 个域名进行攻击反制。谷歌的人工智能驱动过的滤系统阻止了绝大多数网络钓鱼尝试，并保护了 200 多个乌克兰机构网站免受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①私营科技公司为乌克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国家情报机构的能力。

此外，俄乌冲突的战场还借助人工智能延伸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场，形成作用于心理和信息的认知战战场，通过操作心理、情感和决策过程影响目标群体。^②西方国家凭借平台优势与数字媒体霸权，对俄罗斯展开了全维全域全时的认知打压，使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受损，还塑造了西方国家援乌行动的“正义性”。^③社交媒体操纵、虚假信息 and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广泛传播，混淆公众视听，影响了叙事传播与公众认知，使外交努力复杂化。^④交战双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其信息战力量的倍增器，推动信息战呈现信息环境复杂化、跨境危机升级路径及决策时间压缩等新特点。^⑤

① L. Bassett, “Silicon Shadow: The Influence of Big Tech in Russo-Ukrainian Cyber Warfare”, *Cambridge Journal of Political Affairs*, 2025, pp.70-104.

② A. Paziuk et al., “Decoding Manipulative Narratives in Cognitive Warfare: A Case Stud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ptember 11, 2025, Vol.8; 钟祥铭、方兴东：“算法认知战背后的战争规则之变与 AI 军备竞赛的警示”，《全球传媒学刊》，2022 年第 5 期，第 101-116 页。

③ 储召锋、朱鹏锦：“俄乌冲突中的认知域对抗：手段、影响与启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90-116 页。

④ 熊光清、陈飞：“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国际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23-42 页。

⑤ J. Johnson, “The AI Commander Problem: Ethic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lemmas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 in AI-Enabled Warfare”,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2022, Vol.21, No.3-4, pp.246-271.

在历史上还从未有一场战争得到如此广泛的密切注视和实时追踪，也没有一场战争产生出如此复杂的众说纷纭。物理战场和舆论战场交织在一起，全球似乎都与物理战场近在咫尺。俄乌冲突在人工智能时代舆论空间中的展开，解释了未来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具有严格的地区性，也不再具有物理战场的绝对真实性。即使在战争这种物理对抗的极端状态下，战争也不再具有物理的真实性。这意味着，国家间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在网络世界中被大规模重构，互动方式及其结果将更难以控制和预测。

（四）“力量同步难题”：网络-动能作战的脱节

俄乌冲突还衍生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网络作战与动能作战之间始终存在脱节现象，该现象被称为“力量同步难题”。网络作战本应该通过打击或扰乱敌方军事系统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与传统军事打击手段形成合力，进而左右战争的走向。然而，俄乌战场的实践表明，在网络能力与更广泛的军事行动之间实现精准、实时的协调远非易事。尽管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素有网络强国之名，却也未能如许多观察家预期的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

“力量同步难题”首先体现为网络作战与动能作战的统筹规划难。实施网络行动往往需要大量的准备、侦查、预先部署，时间掐算、目标选取、效果评估与传统动能打击方式差异明显。俄罗斯在技术上拥有发动大规模、破坏性网络攻击的能力，曾成功袭击乌克兰电网。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针对 Viasat 卫星通信等目标的网络攻击，仅造成短时有效干扰，却未造成乌军指挥系统瘫痪。^①俄罗斯部署了人工智能目标识别系统，但其数据链路易受电子战干扰，且集中式指挥使前线部队无法将情报数据直接转化为打击指令，从而拖慢了其与动能作战的协同效率。^②

其次，网络作战效果难以持续转化。即便网络攻击在战术范畴取得了成功，也需应对融入作战流程“瞬息万变”的挑战。网络攻击的效果往往是短

^① J. Sherman, “Confronting Russia’s Cyber Power: Reassessing Assumptions, Sizing Up the Threat, and Building a Proactive Response”, *Russia Tomorrow: Navigating a New Paradigm*, Atlantic Council Eurasia Center, May 2025, pp.1-16.

^② D. Kunertova et al., “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ransform, but Do Not Lift, the Fog of War-Evidence from Russia’s War on Ukraine”, in P. Forsström,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Complexity of Contemporary Clausewitzian War*, 2024, pp.146-161.

暂的、可修复的，且难以像动能打击一样对目标造成永久性物理破坏。乌克兰跟微软等科技企业协作，把政府数据迁移到云端，依赖 AI 技术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安全防护等级，这样可以迅速抵挡攻击并从部分网络攻击中恢复。^①采用人工智能可提升单次网络攻击或情报分析的功效，但其效果受限于组织、技术以及功能整合等多重阻碍，造成俄罗斯的网络能力在常规冲突中难以转化为战略成功。

网络作战的另一个核心挑战是缺少可预测性。网络攻击呈现的效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攻击者在进行攻击时或许会碰到不可预测的技术麻烦，或因目标采用的防御与冗余机制而很快失效。人工智能可自动发现漏洞并生成恶意代码；而依靠人工智能提升的防御机制，可实时管控异常流量、抵御网络侵扰。^②在该过程中，攻防双方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态变迁，攻击者借助学习漏洞达成反超，构成持续的技术比拼。^③此种高动态、低透明度的特性，导致网络作战效果难以精准、实时地开展评估与预测，故而难以跟讲求精确协同的动能作战实现速度搭配和同步。

俄乌冲突的相关实践表明，人工智能为“军事行动”带来了兵贵神速的优势；但人工智能的变革是渐进式的，而非颠覆式的；它的应用会因持续技术迭代所需的大量资源、长期研发投入以及国家整体创新生态而受限。战争可以迅速推动特定军事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但这种短期的技术更新和进步或许离天花板更近。

这场欧洲战场的冲突因多方势力入局，使双方作战模式更具韧性，网络作战往往在混合战争时代打头阵。但即便国家拥有强大的网络实力，也不必然导致常规冲突里的战略成功。这一经验教训依旧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这让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既有力量和优势，增加了对权力重构的紧迫性。

① M. Voicu et al., “The Impact of AI Systems in the Ukraine Conflict: Lessons for Air Force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Strategies XXI “Technologies-Military Applications, Simulation and Resources”*, Roma: Carol 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25, p.349-356.

② T. Modupe Kolade et al., “AI-Drive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in Cyber Defense: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sia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omputer Science*, 2025, Vol.18, No.1, pp.133-153.

③ O. Vdovichena et al.,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Rebuilding the Post-War Economy and Ensuring Cyber Security: An Example from Ukraine”, *Salud, Cienciay Tecnología-Seriede Conferencias*, 2025, Vol.4. p.642.

二、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重估权力关系

俄乌冲突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这一极端的国家间互动模式中的“实测”，让人们认识到，对大国关系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这些国家对它们之间权力关系进行的重新评估，包括如何定义、获取和增加权力，以及相应的战略、策略开发和实施，并探索如何进行有效的权力互动。^①

（一）权力的再定义

在国际关系中，权力是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资源、关系、规则和空间进行控制的能力。尽管汉斯·摩根索等理论家都认为权力涉及他人意志和行为的改变，但对“权力”的实际测量，却通常主要着眼于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力、战备、人口等要素。^②肯尼思·华尔兹用实力概念代替权力，更看重物质性有形权力的来源。^③但是，实力不等于控制能力，更不等于权力。实施权力需要细化为采取某种行为改变他者行为方式，如利用军事力量的威慑与强制，^④软实力的吸引和说服，以及发挥相互依存的关系性作用。^⑤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结构性权力，即决定事情应该如何运作的权力，将其具化为知识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及安全结构四个核心维度彼此交织，强调“凌驾于结构之上的权力”比“源自资源的权力”更重要。^⑥这种权力的实质是决定“游戏规则”的能力，预先控制了玩家、条件、排序，甚至输赢。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跨国网络也日益复杂。技术发展

① G. Gogua, “A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Modern Armamen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of 2022-2023”, *Future Human Image*, 2023, Vol.20, pp.35-45.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简明版）》，徐昕、郝望、李保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第171-221页。

③ K.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④ [美]托马斯·谢林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9-40页。

⑤ R. Keohane et al.,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1973, pp.158-165; R. Keohane et al.,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1998, Vol.77, No.5, pp.81-95.

⑥ S.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6-30; [美]苏珊·斯特兰奇著：《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34页。

在形成以网络连接、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既是载体，也是媒介。^①技术权力是技术要素与政治结构相互影响的产物，也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作用于经济生产力、安全强制力和国际制度权力，并由此影响国际权力结构。因此，技术权力也逐步被纳入对国际秩序、安全与权力的核心分析当中。^②而在国际层面，新技术作为权力的明确来源扰乱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游戏规则。^③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技术，使国家之间既有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要调整，改变了权力的形态，影响了国家的权力及其控制形式。由科技潜力、知识资源和信息构成的知识资本成为人工智能控制权力的关键属性。^④这使得传统上缺乏权力的行为体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使其可以与传统权力也无法对抗的行为体进行对抗。这种技术转向与“空间转向”相对应，涵盖海、陆、空、外太空甚至无物理边界的虚拟空间。^⑤

人工智能已不再停留在单一维度，而是成为地缘实力中新的组成要素。人工智能技术为权力概念引入了新的、更具无形性和战略性的指标，包括一个国家的算力、数据、高技能人才，以及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生态系统、价值链整合及数据资产。^⑥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关键的权力要素，不仅体现在数据

① T. Stępień, “Technological Turn and the New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ew Technologies as a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2-19.

② J. Eriksson et al., “Theorizing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vailing Perspectives and New Horizons”, in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eltenham, UK·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p.3-17; M. Leese et al., “How (not) to talk abou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agency”, *Technology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ingdon: Routledge, 2019, p.1-23; 李应博、林子秋：“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政治学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26-142 页；倪桂桦：“技术与国际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分析”，《学术界》，2023 年第 6 期，第 199-209 页。

③ D. Hernández Martínez et 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4.0: World Order, Power and New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2024, p.3.

④ 孙志伟、殷浩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42-164 页。

⑤ M. Szkarlat et al., *New Technologies as a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xi-34.

⑥ 余南平、栾心蔚：“论人工智能监管——国家-市场关系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 年第 6 期，第 31-59 页。

规模、算力、算法能力等可量化的资源上，也作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控制，例如用算法塑造行为预期、进行信息操控或军事威慑。^①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进化，加速了知识权力垄断，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逻辑，推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其技术复杂性、强制性、高壁垒加剧了国际权力的不对称、不平等发展。^②人工智能还改变了既有权力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灵活有效的耦合，促进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工具等不同权力工具得到整合，提升了整体使用的效果和协同性。这与以往仅依赖单一维度的传统军事实力和武器库形成鲜明对比。

人工智能发挥了重塑产业链、信息传播和重构国际规范等作用，成为改变框架条件与结果的“新结构性权力”。在信息领域，人工智能凭借增强信息战和影响力行动（IWIO），推动了军事武器、智能制造等生产模式的变革，使虚拟空间认知控制、安全威胁、心理战等非传统手段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要素。^③权力不再单纯依靠传统军事及经济实力，而愈发依靠掌握和操纵信息流的本领。^④掌握信息流的国家有机会在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这种转变正在重新支配权力的归属和分配，并生产了新的磁力效应。一国的技术吸引力不仅源自对前沿技术的掌握所带来的权力；那些通过测试新兴技术获取有效结果反馈的国家同样可以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盟国。

（二）新的权力竞逐

在对权力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大国在保持权力、获取新的权力和防止对手的权力增长等方面，已经展开、并将继续进行新的竞逐。技术军备竞赛、供应链重组及其所带来的技术阵营分化和对抗正在加速，人工智能竞赛

① 陈强：“权力形态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博弈”，《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7期，第50-58页。

② 余南平：“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第41-59页；部彦君、许开轶：“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1期，第86-110页。

③ 叶成城：“从信息地缘政治学到数字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第五阶段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第214-231页。

④ L. Hunter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in Major Power States: How the US, China, and Russia A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ir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4, Vol.40, No.2, pp.235-269.

的赢家将在未来几十年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一场新型的大国竞争正蓄势待发，包括在技术投资、军事力量建设、正式联盟、经济治国方略等方面，将影响力嵌入规则和制度、法律、情报和秘密活动中。^①

俄乌冲突驱动和加剧了大国对人工智能领导权的地缘竞争。这场竞争成为权力竞争的新前沿和新关键，不仅是科技研发及其军事应用的竞争，更是包括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关键构成的全面竞争。俄乌冲突让各大国看到，在技术高速迭代更新中，权力的优势是短暂的，优势的失去和均衡的打破是常态，要建立相对稳定的权力根基，需要系统地而非单方面地扩大优势，军事领域的先手往往来自非军事领域的领先，而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往往来源于对全球体系的影响和操控。

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引发的深转变甚至堪比当年的核武器，它不但指数级增加威慑，还因其不可控和难以预测而令人担忧。人工智能“全局视角”的战势感知，通过对海量战场数据的高效处理，实现对全局的精准把控。人工智能在融入 OODA 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等传统决策框架后，自动化数据分析能显著提升实时情报能力和指挥控制效率。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及“无人化”趋势降低了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重新定义了军事实力的衡量标准。^②军事冲突的节奏将呈几何式加快，变得更加高效，也伴有极高的风险。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不可解读性以及快速反应的能力，可能导致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冲突升级。

在战略层面，人工智能军事技术的领先国家形成了新的技术权力格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凭借在智能感知、自主武器等领域的进展，推动军事能力、网络防御及战略预见能力的革新，并通过灵活的军事人工智能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优势，例如美国主导的“国防人工智能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Defense）和“奥库斯”（AUKUS）安全协议等。^③俄乌冲突甚至成了大国

① K. Didzis, "Diplom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lob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D. Russ et al., *Competition in World Politics: Knowledge,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1, pp.213-232.

② R. Simmons-Edler et al., "AI-Powered Autonomous Weapons Risk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reaten AI Research", May 3, 2024, arXiv: 2405.01859

③ L. Trabucco et al., "Technology Ties: The Rise and Roles of Military AI Strategic Partnership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23.

观察对手人工智能水平的一个窗口。然而，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各国对彼此技术水平的误判有可能触发预防性军备竞赛。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即使各方都希望保持克制，也可能出于对最坏情况的假设而陷入过度武装并带来的困境。

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战略资源，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从经济到信息控制的多领域权力表现，国家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竞争实质上是对权力要素合法性的争夺。全球主要网络平台依赖人工智能实现增长，并因网络效应趋向集中化，这种集中化赋予运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影响力。^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创造某种形式的“技术治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或中央集权，但通过技术标准、平台规则和算法规范等，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要素。

人工智能驱动的军备创新带动了全球军事工业链的竞争与升级，军事工业链的核心要素从传统的原料、武器与装备转变为数据、算法、芯片与系统等战略资源。^②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由底层资源到顶层规范的关键环节构成，构建了生产性链权与制度性链权，大国正围绕这些战略稀缺资源在技术创新与权力分配方面同步展开竞争。^③而全球供应链的流转依赖人工智能驱动的云端物流系统和数字孪生技术。这些系统被少数科技巨头垄断，并被赋予了制定技术标准和接口规范的权力，把控着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命脉。^④因此，各国对技术依赖的风险感知空前提高，国家本土人工智能水平在全球产业链中被精准定位，这种由数据要素驱动的技术红利与竞争不对称性已然形成，并正在持续加剧。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技术竞争转化为阵营对抗。人工智能军民两用技术的外溢效应促成了安全链、同盟链，科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强势挤压民用供应链，这进

^① E. Schmidt, “AI,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 National Security”, *Daedalus*, 2022, Vol.151, No.2, pp.288-298.

^② M. Shulga et al.,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5, Vol.103, No.6, pp.2243-2253.

^③ 余南平、栾心蔚：“构建链权：人工智能价值链与大国战略竞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78-103页。

^④ D. Poku, “Developing Resilient, Technology-Enabled Supply Chain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Ensure Critical Goods Avail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odern Technology*, Prasu Publications, 2025, Vol.4, No.9, pp.86-97.

一步强化了产业链阵营化的趋势。^①

人工智能对价值观和观念的广泛渗透，既催生“原产国效应”，也凸显了人工智能“对齐”问题。技术始终是大国竞争的工具和对象。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人工智能对齐国家自身的目标、利益、价值和原则，具有优先性和可行性，导致全球利益和目标的分割。^②“原产国效应”，在这里是指人工智能模型能巧妙地叙述世界事件，以符合其祖国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现象。而人工智能内嵌的偏见（如种族、民族、性别），不仅反映、更可能放大群体的歧视与不公，引发民族情绪和反感。在日常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智能语音助手、社交媒体和物联网设备采集个体的日常行为数据，将民族认同的日常表现转化为可用算法识别和管理的“数据化”社会实践。

算法偏见放大与数据化趋势的长期延续，会增加国家认同的同质化倾向，使用外国人工智能平台亦可能导致本国文化特色被稀释。^③“技术原产国效应”推动国际关系从传统的“以人中心”范式进入到“以技术为中心”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在塑造国家行为、价值观竞争以及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不容小觑。^④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政策文件、白皮书、立法文本及官方声明中，已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力和彰显价值的叙事框架，推行人工智能民族主义。^⑤

全球治理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中美欧正竞相主导人工智能治理。^⑥欧

① 参见崔建树：“美国‘科工复合体’权力运作机制与战略影响”，《人民论坛》，2025 年第 11 期，第 74-79 页；孙成昊、黄佳丽：“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影响与前景”，《美国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19-47 页。

② 庞珣：“全球秩序与人工智能对齐——超越技术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 年第 9 期，第 74-84 页。

③ J. Goo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21, Vol.27, No.2, pp.363-376.

④ V. Kardumyan,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Current Paradigms Still Relevant?” *YS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 Vol.1, No.1, pp.116-135.

⑤ M. Riedho, “AI Nationalism in 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 *Social Issues by Academic Researchers*, 2025, Vol.5, No.2, pp.186-217.

⑥ 王冬、高飞：“人工智能治理的多元路径与中国方案”，《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5 期，第 1-24 页；宋国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路径之争及其超越”，《探索》，2025 年第 5 期，第 26-41 页；蔡翠红：“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当代世界》，2024 年第 5 期，第 19-24 页。

盟实施的人工智能治理路线，依靠全面又带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优先顾及基本权利、道德和信任。^①美国正在从对技术出口的被动立场迈向主动战略，将自己的人工智能“堆栈”（政府推动的人工智能技术套件）作为交易外交的工具，^②目的在于把盟友拉进“美国人工智能联盟”当中，同时调整相应的政策以抗衡美国对手。目前阶段，美国战略的一个关键且引发争议的部分，是其“反觉醒”议程。该议程的宗旨是，打击人工智能模型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从联邦人工智能风险框架中去掉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气候变化与错误信息的提及。^③中国采用开源的人工智能模型作为软实力工具，进而扩大其全球影响力。^④各国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差异引发了“迷你多边主义”和双速治理格局的出现。^⑤技术优势跟监管权力相结合，正逐步成为重塑全球权力分配的核心要素，进而引发安全困境和不平等风险。^⑥

三、人工智能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全球风险

人工智能对权力关系的重塑，将引发多维度的系统性风险，诸如急剧压缩决策时间、破坏战略威慑有效性、扩散全球范围的技术民族主义、人为割裂全球供应链、污染信息生态系统，以及无节制开发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整

① M. Gille et al., “Balancing Public Interest, Fundamental Rights, and Innovation: The EU’s Governance Model for Non-High-Risk AI Systems”,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24, Vol.13, No.3; 高再红、张心志：“欧盟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政策工具、路径特征及影响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25年第5期，第150-160页。

②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the American AI Technology Stack*, The White House, July 2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promoting-the-export-of-the-american-ai-technology-stack>

③ 刘妍、冉从敬：“中美欧‘泛数据主权’竞争格局及中国应对——基于数字堆栈模型”，《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12期，第2108-2119页。

④ G. Yang, “The Openness Paradox: Open-Source AI and China’s Quest for Cyber Sovereignty”, in *Dialogues on Digital Society*, 2025.

⑤ M. Kuruc, “Geopoli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 Regulation in the Age of AI Rac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4, Vol.44, No.2, pp.47-55.

⑥ Z. Tsotniashvili, “Silicon Tactics: Unravelling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of the Ukraine Conflict”, *Asian Journal of Research*, 2024, No.1-3, pp.54-65; 梅阳、曾靖、湛泳：“美欧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分歧及中国战略突围的‘机会窗口’”，《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4期，第715-724页。

体带来的生存威胁。上述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为因果，共同编织了一张脆弱的风险网，迫切需要大国之间开展合作和协调。技术引发的权力竞逐，必须在技术引发的整体性、共同性风险面前得到审慎克制，实现理性妥协。这一命题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既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困境。

（一）对战略威慑的深度破坏

由于人工智能呈现军民两用和开源技术的特性，国家之间难以辨别彼此的意图，^①这就可能加剧误判风险，进而危害战略的稳定性。人工智能正在导致核指挥控制系统的脆弱性进一步升级，甚至很有可能打破各国长期以来精心维持的、但又非常脆弱的核威慑平衡。^②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不仅能够穿透关键决策节点，制造虚假预警，其训练阶段的数据投毒还会导致算法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系统性误判；加上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特性，使得决策逻辑难以厘清，^③因而在极端情境下也许会给出灾难性的建议，增强了系统的不可控情形。这些互相牵扯的脆弱方面从根源上侵蚀了战略威慑的可靠基础。

人工智能介入战争行动，正在削弱战略威慑的稳定性与可信度。其主要风险并非单纯源自战场层面的那些直接冲突升级，而是源于决策时间的压缩与先发制人的激励机制。这种压力会扭曲决策者的成本收益评估，被迫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进而诱发矛盾和冲突。^④在核威慑与常规军事能力交互影响的背景下，这一效应会明显加大战略的不稳定程度。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系统及数据分析融合，可能会让决策者产生“精准掌握信息”的错觉，而忽略了其中潜在的系统性偏差，诱发先发制人的冲

① A. Hickey, “The GPT Dilemma: Foundation Models and the Shadow of Dual-Use”, July 29, 2024, arXiv: 2407.20442

② 张煌、杜雁芸：“军事智能化与人工智能威慑的生成路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92-122 页。

③ M. Horowitz et al., “AI,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J. Bullock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I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914-936.

④ M. Favaro et al., “False Sense of Supremacy: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Risk of Nuclear Escalation”,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2023, Vol.6, No.1, pp.28-46.

动。人工智能大幅缩短了威胁检测与反击执行的时间差，迫使核力量进入高度紧张的“警告即发射”状态，危机期间的外交斡旋窗口被急剧收窄，战略误判的风险呈指数级上升。^①

人工智能介入军事领域，对核威慑体系产生动摇。人工智能推动核战略发生微妙转向，从突出二次打击的防御性威慑转向强调首次打击的先发制人。当二次打击能力面临生存性威胁时，那些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准则的国家有可能被迫采取更积极的核态势，如提升核战备等级。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进一步推高了全球核风险水平。^②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不对称，在战略评估中直接催生了新的力量失衡，加大了对对手之间彼此猜疑与误判的风险。^③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一旦启动，便可在无需人类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识别并打击目标，由此引发的意外升级风险与伦理困境难以估量。俄乌战场已然展现出人工智能、网络工具与动能作战深度交织的复杂图景，这种融合式发展提高了冲突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网络行动具有跨国传导效应，波及周边邻国，持续对区域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而各国军事自治、道德及治理的差异，使国际合作与互信形势错综复杂，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

（二）科技巨头权力的失控：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脱钩的交织

科技巨头，即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处理领域具有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如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云服务提供商和 AI 模型开发者），曾是开放协作和全球供应链模式的坚定拥护者。而今它们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前线和各国技术主权的关键载体，转变为“国家冠军企业”。技术民族主义正在驱动人工智能发展模式的转变，即从开放协作转向地缘政治竞争，并将国家安全和保护主义目标置于互利共赢的合作之上。技术民族主义的强化，正在催

① A. Wilner et al., “New Technologies and Deterr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dversarial Behaviour”, in F. Osinga et al., *NLARMS Netherlands Annual Review of Military Studies 2020*,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21, pp.401-417.

② K. Roy, “AI-cybernexus: Impact on deterrence and stabili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Global Perspectives*, New Delhi: Routledge India, 2024, pp.108-123.

③ A. Nadibaidze et al., “The Impact of AI on Strategic Stabilit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Comparing US and Russian Discourses”,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2023, Vol.6, No.1, pp.47-67.

生以主要技术大国为中心的科技集团，基于共同的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规则和价值观，形成相对封闭的技术生态系统，导致技术脱钩。

为争夺技术主权与战略自主空间，各国纷纷以安全和技术主权为名，采用了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呼应的政策工具。一类是防御措施，意在限制关键技术要素外流或受外部力量把控；限制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人工智能行业，禁止境外风险投资渗透敏感领域，要求外国技术供应商披露源代码，实行出口管制。这些手段直接制约了被限制国家人工智能模型的演进路径，也限制了其获取数据、专业知识和高性能计算资源的渠道。^①另一类是扶持措施，致力于培育本土产业发展并形成排他性优势。通过对本土企业的财政补贴，制定严苛的数据本地化条例，以及排他性地开放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这类政策在强化本土人工智能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实际上将外国竞争者拒之门外。^②各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国家引导型项目，将计算能力、数据资源和人才储备纳入安全可控范围，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模型提升至主权工具的战略高度，修筑起排他性的技术壁垒。^③

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脱钩对全球创新体系造成了深层分裂。开放式创新模式首当其冲，跨国创新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创新动能受到抑制，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国际信任的根基遭到侵蚀，人工智能的优先发展方向转向国家战略，半导体和数据供应链被重新塑造成服务地缘政治的工具。科技巨头在国家之间进行的白热化的技术军备竞赛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倾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技术监管和约束，获得了近乎无节制开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合法性。这些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科技巨头，其实际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超出了很多主权国家。在数字世界中的绝对主导权，让科技巨头可能成为实际操控地缘政治的力量。

科技巨头所掌握的技术、数据与计算资源，将其权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

① S. Aaronson, "The Dangers of AI Nationalism and Beggar-Thy-Neighbour Polici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25, Vol.59, No.3, pp.397-430.

② S. Aaronson, "The Age of AI Nationalism and Its Effect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September 30, 2024,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the-age-of-ai-nationalism-and-its-effects/>

③ M. Yan, "How Techno-Nationalism Affect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Case Study of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2023, Vol.10, No.3, pp.10-13.

高度。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到应用商店、云计算，无所不在。他们成了线上生活中基础设施、服务和规范等的主要塑造者。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部署和更新迭代方面，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垄断地位，其价值链、数据链与供应链早已突破了传统的主权边界。在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脱钩日趋强化的当下，科技巨头看似归入了国家阵营，实则仍牢牢掌握着对跨国技术路线、生态体系和价值网络的平台主导权。这种平台主导权的扩张，一方面加速了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碎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将数据霸权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对隐私权、非歧视原则、言论自由以及信息获取等基本权利构成了严重威胁。^①2025年9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的安全路由器事件表明，科技巨头在监管宽松地带肆意扩张权力版图，自由操控国际数据流动的合规边界，而算法安全、偏差与解释性标准完全由企业自行裁定。更具警示意义的是，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曾单方面限制乌军在克里米亚地区使用星链进行无人机攻击。事实证明，科技巨头在缺乏主权约束和国际监管的真空地带，竟能单方面决定一个主权国家在战时关键基础设施的地理覆盖范围和功能边界。

（三）系统性风险：全球供应链、信息生态系统和技术自主性

全球供应链的加速碎片化推高了运营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率，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和先进设备制造等战略技术领域埋下了系统性风险隐患。人工智能之于供应链韧性的价值，远不止提供算力支撑下的决策辅助——人工智能实际上承担着更为深层的协调与规范功能。^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范围渗透，新兴的专业化产业集群悄然成型。这些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与数据资源禀赋、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备度以及高端人才的储备厚度有着深刻的关联，因此，这些集群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态势。各国在人才、算力与数据等关键要素方面的禀赋差异，势必加剧地缘政治阵营间的能力分化趋势。^③纷繁复

① E. Zaidan et al., “AI Governance in a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Regulatory Landscape: A Global Perspectiv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Vol.11, No.1121.

② 宋华、韩梦玮、沈凌云：“人工智能在供应链韧性塑造中的作用——基于迈创全球售后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5期，第174-189页。

③ J. Lee et al., “Techno-Nationalism to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Sovereignt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24, Vol.51, No.6, pp.1185-1190.

杂的出口管制措施迫使企业不得不构筑分叉式供应链来应对各地殊异的法规环境，这无疑阻滞了下游人工智能开发者获取关键投入品与市场准入的通道。严苛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则使依赖全球数据流动的云端人工智能服务模式陷入碎片化的困境，而以限制跨境技术流动为核心的投资审查机制更使其处境雪上加霜。

技术标准的区域分化，构成了另一重要驱动力。硬件层面，相异的技术标准制约着纵向技术适配能力，削弱了全球供应链设备的互通性与流动性。软件维度上，算法架构与平台生态的差异给数据共享和系统集成设置了重重障碍，致使全球供应链的信息传递难以畅通无阻。治理层面的分歧同样不容忽视，纷繁复杂的监管要求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合规成本与协调难度。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促使全球供应链在标准差异显著的区域间形成相对独立的子体系，碎片化格局由此固化。^①主要大国正着力构建具有排他性的技术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意图将合作伙伴预先纳入可信供应体系，同时对竞争对手获取核心资源设置壁垒。

从全球供应链体系到全球信息生态，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系统性风险已渗透至更深层次。人工智能堪称信息战的武器，也是信息战的效果扩大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维度扩散信息污染：在内容生成层面，人工智能生成的音频、视频和图像能够达到近乎逼真的质量水准；大型语言和多模态模型可大规模合成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证据，快速生成许多量身定制的虚假信息，^②并根据个人偏好精准推送。在内容传播层面，自动化分发网络，如机器人网络配合人工账户，放大虚假叙述的影响，并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实施部署，以实现分裂式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在算法推荐层面，平台推荐系统优先展示极具吸引力的内容；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会创建信息孤岛，间接导致人的主体性危机以及资源获取不平等，进而强化了回声室效应。^③这些技

① P. Milutinović et al., “Can China Challenge the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Standpoint and Perspective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74, No.1187, pp.87-106.

② M. Shoaib et al., “Deepfak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Frontier AI, Generative AI, and Large AI Models”, November 29, 2023, arXiv: 2311.17394

③ 蔡翠红、管航：“算法权力影响人的安全机制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 年第 8 期，第 38-68 页。

术环环相扣，不仅降低了制造虚假信息的成本，也削弱了公众对消息来源、主流媒体和官方信息的信任。^①信任降级、认知危机以及信息操控等系统性后果随之而来。国际互信遭受侵袭、敌意被放大、真实信号被扭曲等，都会对大国关系和全球政治造成严重影响。

从更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来自其带来的文明级和生存性风险。首先，人工智能可能进行目标错位与意图不符的自主行为。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GI）自主性的提高，自主系统可能在追求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人类意图不符的目标。^②在缺乏严格的价值对齐和约束的情况下，这种目标上的微小偏差可能在自主系统的强大能力下被指数级放大，导致人工智能采取非预期的、对人类福祉具有破坏性的举动。其次，失控的能力增长和递归式的自我完善可能以超人类预期的速度和方式进行。一旦人工智能进入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其决策过程将变得隐晦不明且难以说明，从而使遏制和纠正干预变得困难。^③最终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是，这些能力强大且目标错位的系统借助其在数字和物理世界中的广泛部署，获取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④无论是电力系统、金融网络、军事防御还是供应链，一旦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掌握了这些系统的主宰权，它就有能力以人类不可逆转的方式重塑世界，也可能为了完成自身目标而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全球性的后果，全面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和长期发展潜力。

四、结语：通往稳定的大国关系之路

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重塑，叠加人工智能技术应

① A. Sanchez-Acedo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y: Deepfakes and Mi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4, Vol.37, No.4, pp.223-239.

② R. Young, “Who’s Driving? Game Theoretic Path Risk of AGI Development”, January 25, 2025, arXiv: 2501.15280

③ B. Bucknall et al., “Current and Near-Term AI as a Potential Existential Risk Factor”,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AAI/ACM Conference on AI, Ethics,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2, pp.119-129.

④ R. Yampolskiy, “On the Controll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nalysis of Limitations”, *Journal of Cyber Security and Mobility*, 2022, Vol.11, No.3, pp.321-404.

用的全球性扩散，共同催生了构建包容性、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紧迫需求，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权力关系嬗变所潜藏的系统性威胁。稳定大国关系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管控全球风险的基石所在。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尤为关键：

第一，构建多层次、有韧性的治理体系是应对人工智能深远挑战的关键举措，该体系需要涵盖国际、国家、行业和组织等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①权利与义务通常相辅相成，人工智能系统的责任理应由开发者、部署者、使用者、监管者等多方主体共同承担，形成职责明晰、可追溯的“分布式责任”体系。^②通过多边论坛、双边及区域合作强化数字互联互通，可有效促进跨部门、跨国界的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进而推动人工智能负责任、包容性发展，带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逐步成型。^③

当前，联合国已设立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问题政府专家组、“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全球峰会等国际治理尝试，表明外交在协调国家间人工智能国际监管、防止技术滥用与军备竞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④就人工智能治理中无法立即解决或争议大的问题，不妨采取搁置、试点或逐步讨论的灵活策略，降低国际冲突的概率。学者们为此提出了多样化的治理框架与构想，包括有明确使用规范的国家执行非扩散体制（NPT+）、入侵式监测方案、审查国际垄断及事实霸权等。^⑤通过设立联合研究机构、跨国伦理委员会或国际人工智能科研平台，汇聚全球资源开展安全研究，降低单一利益集团主导可能产生的风险。最终目标在

① P. Robles et al., “Catching up with AI: Pushing toward a Cohe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Politics & Policy*, 2023, Vol.51, No.3, pp.355-372.

② Z. Slimi et al., “Navigating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Seven Global AI Ethics Policies”, *TEM Journal*, 2023, Vol.12, pp.590-602; 桂畅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构建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66-86 页。

③ L. Moskalyk et al., “The dual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igital diplomacy and tech diplomacy: Global implications”, *Green, Blue and Digital Economy Journal*, 2025, Vol.6, No.2, pp.32-44.

④ 龙坤、文力浩：“算法战的兴起与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构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 年第 2 期，第 61-91 页。

⑤ N. Emery-Xu et al.,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Advanc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Society*, 2025, Vol.40, No.4, pp.3019-3044.

于推动全球、区域与国家层面的规范协调，在关键原则上凝聚人工智能治理共识。

第二，强化大国协调机制。大国协调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俄乌冲突表明，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诸多风险。大国之间亟需就相关风险管控机制展开协调，通过外交磋商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边界达成共识，建立危机沟通渠道，防止战略误判与意外升级。^①尽管彼此间存在竞争，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合作需求同样迫切。人工智能所衍生的安全风险、伦理困境及治理挑战，明显具有全球溢出效应，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当前主要掣肘在于大国间缺乏战略互信，破题之道应从信任重建起步，渐次拓展合作领域，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提升政策透明度，促进人员往来，共同推进合作项目。大国间协调对话有助于和平化解潜在冲突，避免技术对抗局面失控，为达成各方认可的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奠定政治基础。^②

第三，推进伦理治理实践转化。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正经历从“原则宣示”向“实践落地”转型的关键时刻。人工智能伦理具有双重审视维度，“人工智能的伦理”（Ethics of AI）与“伦理的人工智能”（Ethical AI），前者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伦理难题及规范构建，后者则聚焦于如何将伦理准则嵌入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与运行全过程。^③这一双重视角，有助于双向把握人工智能伦理调控的外部规范与内部嵌入，从而将抽象原则有效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与实施细则。

构建人机共存的伦理国际秩序并非易事，需明确主体责任，使不同治理主体在责任划分中各司其职。在这一前提下，人工智能伦理暗含“全球伦理”的属性，既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差异，又要在多元文明之间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④在此基础上，推动伦理嵌入其中的技术研发与应用范式，将伦理

① J. Johnson,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machines: A new model for nuclear risk in the digital a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1, Vol.7, No.3, pp.337-359.

② 高奇琦：“从大国协调到全球性机制：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路径探析”，《当代世界》，2024年第5期，第12-18页。

③ K. Siau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Ethics of AI and Ethical AI”, *Journal of Database Management*, 2020, Vol.31, No.2, pp.74-87.

④ L. Floridi,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57-66.

考量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通过情境评估和伦理研判，尽量降低误判概率，并在持续的技术迭代中形成透明、可信乃至自我校正的数字生态系统，为全球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提供实质性的操作基础。^①人工智能治理亦需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伦理规约和社会价值相契合，兼顾技术动态演进与多元文化价值平衡，推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

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的现实，为大国关系敲响了警钟，警示了竞争加剧转向战略冲突的潜在风险。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既离不开技术层面的风险管控，更有赖于政治层面的战略智慧与互信修复。人工智能的终极价值应指向全人类福祉，而非成为撕裂全球秩序的推手。国际社会亟需回归“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合力塑造一种既能充分释放技术潜力、又能有效管控风险的人机共存的国际秩序。

（责任编辑 崔 珩）

^① M. Pasupuleti, “AI’s Role in Global Stability, Diplomacy, and Peac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novations*, 2025, Vol.5, No.2, pp.1-11.

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秩序重建的挑战与未来*

孙超**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不仅深刻暴露了欧盟“规范性力量”身份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加速了其向“军事行为体”和“地缘政治欧洲”的转型。在美欧关系因美国战略收缩而趋于疏离、跨大西洋联盟凝聚力下降的背景下，欧盟虽然致力于推进战略自主，却受制于内部分歧、制度缺陷与能力赤字；对外更是深陷对俄罗斯制裁效能受限、对乌克兰援助乏力，以及在美国同盟体系中边缘化加剧的三重困境。展望“后和平时代”，欧洲安全秩序可能呈现三种演进模式，即“对抗性冷和平”、“混合性共存”与“去俄化泛欧安全架构”。无论冲突最终以何种方式落幕，欧俄关系已经难以回归合作轨道。构建一个排除俄罗斯主导权、但保留最低限度危机管控机制的新安全架构，正在从欧盟的“艰难抉择”转变为一种“历史必然”，这标志着欧洲安全秩序正式进入以多极博弈、身份重构与硬实力回归为特征的新阶段。

【关键词】俄乌冲突 欧洲安全秩序 跨大西洋联盟 欧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1-0091(35)

俄乌冲突延宕不决，欧洲各国普遍产生“乌克兰疲劳症”。俄乌在战事中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韧性，双方互不相让，错失了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项目批准号：25JJD81000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的良机。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加速崛起，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再次走低。2025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经济、安全层面对欧洲强硬施压，不仅指责欧洲在俄乌冲突中“违背和平意愿”，还要求欧洲与俄罗斯和解，北约停止扩张。^①欧盟与北约的政治影响力持续衰减，欧洲自主防务进程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欧洲地缘安全局势也更加复杂。^②在经济方面，西方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轮制裁，但迄今未能达成重创俄罗斯经济基本面的预期目标。面对制裁的压力，俄罗斯不仅在规避制裁、保障关键领域经济运转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更大力践行“东转南进”的对外战略，持续深化与金砖国家及“全球南方”的合作，逐步构建并巩固起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络。^③在军事方面，根据美国著名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的最新观察，俄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波克罗夫斯克（Покровск）及周边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突破该城。^④在外交方面，欧洲大国同乌克兰协调行动，但各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未纳入美俄谈判的总体框架中。特朗普团队频繁绕开欧洲盟友与乌克兰，直接同俄罗斯官方会谈，推进俄乌“和平计划”。“乌克兰必胜论”匆忙退场，欧盟要忍受美俄越过欧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② 参见卓华、王明进：“特朗普冲击下的欧盟对美战略调试”，《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10 期，第 28-51 页；严少华、吴虚怀：“特朗普回归下的欧洲防务自主走向及对美欧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64-90 页。

③ 关于俄罗斯应对经济制裁的最新情况可以参考下列文献：Michael Funke, Adrian Wende,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s on Russia: Modeling loopholes and workarounds”, 2025, Vol.4,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318192/1/1926240634.pdf>; Owais Arshad, “Russian sanction evas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Compliance*, 2025, Vol.8, No.3, pp.271-284; P. Zhou, D. Guo, “Sanctions, Co-sanctions and Counter-Sanctions: A Multilateral, Evolutionary Game Among Three Global Power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25, Vol.36, No.1, pp.60-85.

④ 乌克兰城市波克罗夫斯克是顿涅茨克西部的一个定居点和铁路枢纽，是俄罗斯在占领阿夫迪伊夫卡（Avdiivka）之后突破乌克兰守军防线的核心目标。俄罗斯自 2024 年 3 月起尝试发起多次攻击，但最终都未能占领该城。根据乌克兰指挥官的统计，2025 年年底，约有 11 万俄军集结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See Shaun Pinner, “Pokrovsk: Where Putin Shattered His Teeth”, *Europe's Edge*, November 6, 2025, <https://cepa.org/article/pokrovsk-where-re-putin-shattered-his-teeth>; “Russian Partial 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 Enabled Recent Russian Advances in Pokrovsk”, November 14, 2025, <https://understandingwar.org/research/russia-ukraine/russian-partial-battlefield-air-interdiction-enabled-recent-russian-advances-in-pokrovsk>

洲直接会谈的压力。^①这不仅让美欧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剧烈挑战，欧洲在自身安全议题上也被边缘化，其长期倡导的战略自主沦为“笑谈”。尽管如此，欧盟与多数北约国家依旧向乌克兰提供大量资源，维系这场规模庞大却收效甚微的对乌援助行动。

从全球层面来看，随着国际权力结构“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加速，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彻底动摇了欧盟对自身塑造力的认知。首先，在欧俄对抗大背景下，欧盟地缘经济实力下滑加快。^②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布加强经济安全联合通报，希望重塑欧盟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③这种努力显然正视了当前欧盟经济竞争力相对下滑的现实，但其成效如何不得而知。其次，欧洲内部麻烦不断。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怀旧情绪与民粹主义、保守主义联合起来，形成反击自由国际主义的“巨浪”，旨在重塑欧洲核心价值观。最后，全球多数地区，对欧盟所倡导并践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质疑声也日渐高涨。俄欧亚地区、拉美左翼政权、东南亚国家及多数非洲国家强调主权和发展权优先，拒绝欧洲的“普世价值”叙事，加剧了欧盟的战略焦虑。^④

当前，欧洲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面临边缘化风险。随着美国将精力持续转向西半球和印太地区，中东动荡久拖不决，欧洲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承诺与全球地缘政治议程产生严重错位。欧洲在百年变局中的战略定位模糊不清，内部资源分配存在矛盾，地缘政治挑战难以解决。问题是，欧洲政治精英在

① 2025年，民调机构 Cluster 17 为《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对欧盟九个成员国的 9500 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其中 69% 的受访者对自己国家保卫领土免受“俄罗斯侵略”没有信心。“Over two-thirds of Europeans say their country cannot take Russia on militarily, new poll finds”, December 4,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12/04/over-two-thirds-of-europeans-say-their-country-cannot-take-russia-on-militarily-new-poll-f>

②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4,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Geopolitics%20and%20Economic%20Statecraft%20in%20the%20European%20Union-2.pdf>

③ “Commission announc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strengthen Europe’s economic security”, Brussels, December 3, 202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5_2889/IP_25_2889_EN.pdf

④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Vladimir Mashin, “Europe is suffering a serious civilisational crisis”, May 26, 2025, <https://journal-neo.su/2025/05/26/europe-is-suffering-a-serious-civilisational-crisis>

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了自身的负面处境，并针对当前困境开出药方。近期的事态发展表明，现有的欧洲安全架构已经开始突破欧洲的权力格局，甚至分化出多种区域化构建模式。这些模式正在分别通过创新式的制度安排，竞相塑造新欧洲安全秩序。第一种模式聚焦欧洲内部维度，希望通过呼吁构建内部凝聚力，改进欧洲共同体的防务政策，推动欧洲战略自主。^①第二种主要关注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塑造，通过研究欧盟与北约机制化互动及制度性协作，并研究欧、美双方在援乌抗俄政策上的相互协调，驱动欧洲防御能力建设。^②第三种模式呼吁欧洲安全秩序应覆盖更广泛的欧亚地区，联合摩尔多瓦、乌克兰以及南高加索国家甚至连接中亚国家来制衡俄罗斯的地区主导权，提升欧亚地区的“欧洲硬实力”。^③

欧洲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不仅与欧洲在塑造区域安全架构过程中的地缘权力投射密切相关，也受制于历史制度与既有安全机制的路径依赖效应。本文认为，正是由于欧洲安全架构的先天缺陷和路径依赖，欧盟缺乏塑造周边安全格局、化解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而欧俄关系也因受制于美俄博弈与美欧同盟的双重约束而难以走向和平共处。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塑进程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本文分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一是探究欧洲安全秩序的历史脉络，厘清旧欧洲安全秩序是如何逐步瓦解的；二是分析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的“自救”尝试，以及如何由此而深陷安全、经济、身份及文明等多重危机；三是讨论欧洲安全秩序的未来演进路径；最后对上

① 关于欧洲非正式组织的研究可参考下列文献：Maria Giulia Amadio Vicere, Monika Sus, “Organizing European security through informal groups: insigh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s responses to the Russian war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5, Vol.62, pp.931-946; N. Helwig, “Germany in European Diplomacy: Minilateralism as a Tool for Leadership”, *German Politics*, 2020, Vol.29, No.1, pp.25-41; Marianna Lovato, “How Informality Keeps Multilateralism Going: The Role of Informal Groupings in EU Foreign Policy Negoti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4, Vol.30, No.4, pp.972-996.

② Jolyon Howorth, “The Ukraine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Security”, *European View*, 2023, Vol.22 No.2, pp.1-14; Stephanie C. Hofmann, “The Politics of Overlapping Organizations: Hostage-Taking, Forum-Shopping and Brokering”,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9, Vol.26, No.6, pp.883-905; Leonard August Schuette, “Shaping Institutional Overlap: NATO’s Responses to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Initiatives Since 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3, Vol.25, No.3, pp.423-443.

③ John Helferich, “Trapped in the grey zone: NATO-CSDP relations in a new era of European securit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5, Vol.62, pp.1071-1072.

述讨论进行简要分析与归纳，并得出结论。

一、若即若离：后冷战时代欧俄关系与欧洲安全秩序

后冷战时期形成的欧洲安全秩序，本质上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势力加速向东欧扩张的结果。^①这一秩序从属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在欧洲方向的拓展，并由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欧安会）等机构加以维持巩固。

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不仅形成了欧洲安全共识，同时将欧洲35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国联合起来，打破了冷战时期欧洲安全“阵营对立”的零和思维。^②这一新型制度架构和其他地区安全秩序相比，更加错落有序，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原则在该框架内得以凸显。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并不固定。但是，俄罗斯一直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安全秩序视为美欧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М. Горбачёв）甚至提出“欧洲共同家园”的口号，强调通过相互承诺与一体化进程交织而成的网络，实现美国、西方与苏联、东欧的和平共处。^③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俄罗斯对融入美西方主导的欧洲安全框架充满期待，欧洲也向俄罗斯敞开大门，促成了多个合作框架，俄罗斯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安全秩序的设计者之一。1994年俄罗斯加入北约主导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支持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NATO-Russia Founding Act*），并且建立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而欧洲对美俄之间的积极战略互动持谨慎乐观态度。然而，美国与北约领导人却持续推动北约东扩，

^① 也有一种说法称，东欧“回归欧洲”，指的是中东欧国家通过民主转型逐渐融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参见[英]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著：《东欧史：“中间地带”的困境》，韩炯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922-987页。

^② See Michael Cotey Morgan, *The Final Act: The Helsinki Acco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Martin Sletzinger,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Helsinki Process”, Foreign Policy Program,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014, pp.1-4.

^③ Marie-Pierre Rey, “‘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 A study of Gorbachev’s Diplomatic Concept”, *Cold War History*, 2004, Vol.4, No.2, pp.33-65.

甚至设计出双轨战略 (Twin-track Strategy), 旨在通过“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加强正式的纽带与增进协商以强化信任合作”, 进而为北约吸纳中东欧国家赢得时间。^①

直到 1999 年北约干预科索沃战争, 欧洲才真正意识到俄与美及北约关系的紧张, 也由此认清了自己受制于美国的现实。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欧洲与俄罗斯的合作。在 1999 年的欧盟科隆峰会上, 欧盟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共同战略”, 强调双方要共同应对欧洲的安全挑战, 一起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②随后的欧俄赫尔辛基峰会正式标志着俄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2000 年欧俄在巴黎峰会上发表的《关于加强欧洲政治与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联合声明》(*EU/Russia Summit Joint Declaration on strengthen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matters in Europe*) 更是确立了俄罗斯为平等合作伙伴的“欧洲和平秩序”。^③俄罗斯对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坚定回应, 使欧洲认识到, 俄罗斯同美国、西方的积极合作, 对于欧盟周边地区和平稳定而言至关重要。^④在 2003 年的《欧洲安全战略》中, 俄罗斯甚至同美、日等国并列为欧洲的战略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此期间展现出务实合作的态度, 将欧盟列为重要合作伙伴, 并对欧盟提出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表示欢迎。俄罗斯一贯认为, 美欧战略利益并不一致, 欧洲对俄罗斯所追求的多极化体系持支持态度。但随着北约与欧盟持续东扩, 俄罗斯的战略焦虑日益凸显。欧盟在 2004 年东扩之际, 曾邀请俄罗斯加入其新推出的欧洲邻国政策, 但这一倡议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不过, 在同年举行的欧盟-俄罗斯峰会上, 俄罗斯却接受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提出的建议, 即由欧盟支持车臣共和国等俄联邦主体开展重建工作。2005 年, 俄欧在莫斯科峰会上敲定的统一空间

① 吴文成: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第 5-7 页。

② 相兰欣、薛凤伟、成键: “欧洲联盟: 对中国的共同战略”, 《俄罗斯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第 17-20 页。

③ See “EU/Russia Summit Joint Declaration”, October 30, 200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00_1239

④ Clelia Rontoyanni, “So Far, so good? Russia and the ESDP”,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Vol.78, No.2, pp.817-818.

“路线图”，不仅正式宣告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启动的《欧盟-俄罗斯伙伴和合作协定》的进程已经完成使命，更首次为双方在经济、安全、司法、人文等领域的一体化合作明确了具体路径，这是俄欧政治关系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尽管该路线图并未在冲突解决和危机管理方面作出明确承诺，但俄方仍然接受欧盟于 2005 年 9 月为重建特别计划拨付的 2500 万欧元，这笔资金用于重建车臣共和国以及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相关学校和医院。^①

欧俄双方尽管存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但双方的合作态势总体是积极向前的。欧盟长期面临一项两难抉择：究竟应当侧重规范与价值观导向，并将双边关系的发展与俄罗斯在人权、法治和民主化方面的改善进程挂钩，还是应秉持务实态度，基于现实利益推进对俄关系。^②欧俄的关键分歧在于，欧盟认为自由民主规范是推动欧洲走向安全与繁荣的根本保障，是实现欧洲安全的关键所在，俄罗斯对此则并不完全认同。

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 Караганов）指出，与欧盟开展安全合作不仅是应对现实安全挑战的客观需要，更有助于防止俄罗斯在俄美对话中的地位弱化。^③随着北约众多欧洲成员国愈发公开地抱怨美国在相关事务上不愿与盟国磋商，俄罗斯官员认为，俄罗斯存在与欧盟联手就立场趋同的议题向美国施压的空间。通过与欧盟开展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俄罗斯不仅能巩固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又可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

而俄欧的合作关系，已经引发了美国战略界的普遍焦虑。有美国学者早有论断，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因为自己的国力非常虚弱，对自身本土安全异常敏感，所以将周边邻近地区视为维护本土安全的核心屏障。亨廷顿（Samuel

① Thomas Frellesen, Clelia Rontoyanni, “EU-Russia Political Relations: Negotiating The Common Spaces”, in Jackie Gower ed., *Russia and Europe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p.242.

② Katinka Barysch, “The EU and Russia: All smiles and no action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11,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pb_russia_april11-157.pdf

③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рбатова Н. ред.,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есть ли в ней мес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я в объединённой Европе», 2002. С.22.

Huntington) 曾直言, 乌克兰可能成为基督教西方文明与东正教的俄罗斯文明的冲突地带, 并很容易引发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①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认为, 莫斯科更倾向于以敌对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恐惧是俄罗斯“永恒的地缘政治”。^②俄罗斯帝国野心从未消弭, 对地区和领土等“势力范围”的划分非常敏感, 乌克兰正是俄罗斯本土安全最为脆弱的地方。^③美国学界主流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持续对抗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相对遥远的历史发展和历史事件。但这种观点既缺乏说服力, 也可能产生反效果, 毕竟它无益于双方开展建设性安全合作。^④

然而, 美国政界接受这一论调。俄罗斯的战略焦虑遭到美国的刻意忽视, 也未能获得欧洲方面的积极回应。在 NATO 持续东扩、美国加快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等推动欧洲安全形势“美国化”的过程中, 俄罗斯目睹了欧洲内部因对俄合作立场分歧而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为此, 俄罗斯为了加快同欧洲合作进程, 转而重点推进同法、德两国的双边合作, 这一做法却引发了其他欧洲国家对自身边缘化乃至利益受损的担忧。中东欧国家认为, 相比身处“后现代”治理模式下的欧盟, 俄罗斯通过在车臣、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行动表明, 它很难融入欧洲共同价值观和准则体系。^⑤换句话说, 俄罗斯一直是欧洲安全架构的“局外人”。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 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既耗尽了俄罗斯同西方合作的耐心, 也恶化了美俄关系。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普京随即宣告与跨大西洋安全秩序决裂, 提出“安全不可分割”理念, 并重申任何无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79-181页。

② Stephen Kotkin,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 Putin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n”, *Foreign Affairs*, 2016, Vol.95, No.3, pp.2-9.

③ 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分析,“帝国论”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加上它没有天然边界的地理特性,导致其始终存在安全焦虑,往往通过对外扩张获得新边界,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延续。持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学者是英国的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See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ee Tuomas Antero Forsberg,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revisited: from the congress of Vienna to the Post-Cold war”,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9, Vol.20, No.2.

⑤ Margriet Drent,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Revisited: EU-Russia Relations”, *Studia Diplomatica*, 2012, Vol.65, No.1, p.6.

视俄罗斯利益的安全架构注定不稳定且难以存续。^①在 2008 年的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宣布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列为北约候选国，这一举措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不久后，俄格冲突爆发。在此背景下，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随即提出缔结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并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发布《欧洲安全条约（草案）》（*The draf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Treaty*），旨在建立“开放、持续、广泛、包容的欧洲安全对话”，以此替代北约的封闭式、对抗性的安全架构。至此，俄罗斯已完全脱离了旧欧洲安全秩序的轨道，开始自主搭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

欧盟将 2008 年的俄格冲突视为俄欧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认为俄罗斯借此冲突刻意加剧欧洲“两极化”的对抗态势，意在瓦解欧洲多年苦心经营的“欧洲安全架构”。在欧盟看来，俄罗斯所倡导的大陆协调机制，难以与北约及欧盟的安全架构实现制度化共存，二者在欧洲安全格局中势必只能有一方居于主导地位。为了缓解日趋紧张的欧俄关系，德国于 2010 年提出“梅泽贝格倡议”（the Meseberg Initiative），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支持建立欧盟-俄罗斯外交与安全委员会。^②美国亦曾试图与俄罗斯重启双边关系，但随后转而策动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政变”在乌克兰同样上演，不仅恶化了本就紧张的美俄关系，也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提供了契机。

2014 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和顿巴斯地区“分离冲突”的爆发，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显现，标志着欧洲安全共同体建构的重大破裂。这场持续八年的混合冲突，使俄罗斯彻底沦为西方安全叙事中的“秩序破坏者”，甚至获得了一个“新冷战发起者”的身份。^③但在俄罗斯看

① “Speech an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at the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February 10, 200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② “Joint Statement on the EU-Russia Summit in Deauville and the Meseberg Declaration”, European Council, June 18, 201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15141.pdf

③ See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 93, No. 5, pp.77-89; Robert Legvold, *Return to Cold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Thomas Ambrosio, “The Rhetoric of a ‘New Cold Wa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S.-Russian Rela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8, Vol.51, No. 2, pp.125-137; Dmitri Trenin, *Should We Fear Russ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杨雷：“乌克兰危机与美俄新冷战”，《和平与发展》，2015 年第 1 期，第 85-89 页。

来，自己正在加速从欧洲联盟的“一个外省”变成欧亚地区的中心；正在逐渐地摆脱一个“后现代的欧洲”，大幅向亚洲靠拢，并吸取历史教训，在不过多作出全球承诺的前提下，富有前瞻性地成为一个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① 欧俄双方在欧洲安全认知方面的鸿沟，注定了乌克兰问题的长期化趋势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尽管俄罗斯凭借混合战争手段在乌克兰东部占据局部优势，但北约与欧盟的持续支持，形成了对俄罗斯“有限制衡”的态势，最终致使俄罗斯难以完全实现自己在乌克兰的预设战略目标。

欧盟对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应对举措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升级”特征。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公投危机爆发初期，欧盟理事会的反应仅停留在外交象征层面——暂停俄欧签证谈判，中止俄罗斯八国集团（G8）成员资格，取消原定 6 月在索契举行的 G8 峰会，坚持以谈判为解决冲突的核心路径。这一做法延续了其“规范性”定位，试图通过规范传导而非强制手段来重塑局势。在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之后，欧盟于 2014 年 3 月下旬升级制裁：将 12 名相关个人纳入签证禁令与资产冻结名单，叠加此前已制裁的 21 名俄罗斯公民，同时取消俄欧峰会并启动更广泛制裁的筹备工作。在施压之余，欧盟通过签署《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的政治条款，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释放制度性融合信号。三国亦积极参与“东部伙伴关系”（*Eastern Partnership*）计划。

2014 年以后，顿巴斯地区“分离冲突”升级与马航 MH17 航班被击落事件相继出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持续加码。2019 年，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宣言将“韧性”确立为合作指导原则，并且重申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重要性。^② 而 2014—2021 年，欧盟应对的核心在于制裁措施的延长与范围扩张。这种“增量式回应”被视为与冲突烈度相匹配的动态对称手段。

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欧盟 2014 年的应对存在“规范赤字”与“威慑不足”的双重结构性缺陷。首先，作为二战之后对欧洲领土主权秩序破坏最严

① 参见冯绍雷：“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进展与问题”，《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5-7 页。

② 王志、刘紫文：“规范性力量与正常力量：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演变”，《德国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39-41 页。

重的事件，克里米亚问题本应该触发欧盟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但欧盟采取的温和回应，既未能向俄罗斯清晰传递欧盟所秉持的“主权不可侵犯”价值观红线，也未能形成有效的预防性威慑，为俄方后续在顿巴斯的扩张留下了空间。^①2014年上半年，欧盟理事会仍明确彰显其在冲突中的主动介入角色，试图以规范性力量主导局势走向。但此后欧盟立场却逐渐退缩至“辅助性角色”，转而强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政府的主体责任。这一转变在欧盟委员会历任主席的公开表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将俄乌冲突定义为“对欧洲价值观与规范的根本性威胁”，强调欧盟必须捍卫国家自主选择的核心自由。而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表述则明显趋于克制，在重申对乌克兰支持的同时，既强调乌克兰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又在2016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呼吁俄罗斯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的身份参与欧洲安全秩序构建，甚至倡议俄罗斯接纳自由进步价值观。

欧盟对俄罗斯行为的应对策略，深陷“规范性诉求”与“地缘政治现实”的双重困境。^②作为以规范性力量为核心身份认同的国际行为体，欧盟内部始终未能就俄罗斯的定位达成共识：俄罗斯究竟是需惩罚遏制的“威胁源头”，还是解决地区危机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方”？这种争论的核心，其深层根源在于成员国多元且差异显著的安全文化——西欧国家侧重价值观认同，中东欧国家则更关注地缘安全威胁。这也反映了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倾向：欧盟作为超国家机构，地缘政治议程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欧委会主席个人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从而导致对俄政策缺乏连续性。2016年欧盟围绕对俄接触政策的争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双重困境的张力。对此，学术界形成的两种解读视角，可以对应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范式分歧。从自由主义视角看，与公然践踏民主、人权及领土主权规范的国家开展实质性合作，将严重侵蚀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公信力，使其陷入“虚伪规范”

^① Pernille Rieker, “The EU’s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Crisis: A Test Case for th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Concept”,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16, Vol.21, No.3, pp.335-338; Jolyon Howor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Russia’s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Vol.92, No.1, pp.108-110; Thomas Renard, “Deterrence by Denial or Deterrence by Punishment? The EU’s Incoherent Approach to Russia”, in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78*, Brussels: Egmont Institute, 2015, pp.4-6.

^② 门镜：“欧盟与俄乌冲突：困境与出路”，《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6期，第89-93页。

的悖论。^①若欧盟在俄罗斯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欧安组织原则背景下，仍寻求推动对俄关系“正常化接触”，此举势必向全球传递“国际规范可以交易”的错误信号，进而严重侵蚀欧盟自身的软实力。但在现实主义框架下审视，俄罗斯作为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与核心地缘利益相关方，欧盟通过对话维系双边沟通渠道，实则是在为构建欧洲持久和平、践行进步价值观创造必要条件。这种“务实妥协”恰恰是地缘政治理性的具象化表达。^②正如特列宁（Dmitri Trenin）所说，无论欧俄价值观分歧多深，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的核大国和能源供应方，其地缘权重不可忽视；欧盟若彻底切断对话，将丧失影响俄政策走向的杠杆，反而不利于长期和平与规范扩散。^③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并非孤立的战略冒险，而是 2014 年以来俄乌混合冲突僵局的必然逻辑延伸，其根植于俄罗斯在安全困境中的“胁迫性谈判”战略逻辑。2014 年后，俄罗斯在混合冲突中虽占据局部主动权，但北约与欧盟对乌的持续性、体系化的支持，使得其无法达成既定战略目标。这种“胜利不可期、僵局难持续”的两难处境，不断加剧俄罗斯的战略焦虑。2021 年 4 月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展开的军事集结向西方释放战略威慑信号；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俄方加快在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兵力部署，将对乌施压升级到全面性、高强度态势，意在迫使西方重回谈判桌，回应俄罗斯的安全诉求。2022 年年初，俄罗斯联合白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这一行动已凸显了“穷尽手段后的无奈之举”的特征——当所有胁迫性外交与军事手段无法打破僵局时，军事行动升级成为俄罗斯的最后选项。普京于 2021 年 12 月提出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和《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① Karen E. Smith, “The European Union’s Practice of Normative Power: The Case of Relations with Russ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32, No.5, pp.622-625; Pernille Rieker, “The EU’s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Crisis: A Test Case for th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Concept”,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16, Vol.21, No.3, pp.338-340.

② Richard G. Whitman, “The EU’s Geopolitical Turn: What It Means for Europe’s Global Rol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021, Vol.56, No.3, pp.15-17; Bastian Giegerich, “Europe’s Strategic Awakening? The EU as a Geopolitical Actor after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2022, *Survival* 64, No.4, pp.18-20.

③ Dmitri Trenin, *Should We Fear Russ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pp.112-135.

织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的协议》两个草案，堪称是谋求欧洲安全架构的“和平最后通牒”。其核心诉求是重建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欧洲安全合作机制：俄罗斯力图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遏制北约与欧盟的持续东扩进程，恢复自身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但这一诉求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结构性困境。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特征，在于北约与欧盟依托制度性扩张所推动的“规范扩散”进程。这种扩张既契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地区层面的自我复制逻辑，也满足了中东欧国家的现实安全诉求，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惯性。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所主张的“大国协调”模式与西方所秉持的“规则主导”秩序观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前者强调大国对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与利益均势，后者则突出主权平等、集体安全等普适性国际规范。正是这种秩序观的根本对立，使得俄罗斯抛出的“最后通牒”从一开始就缺乏落地的现实根基。最终，2022年2月24日的特别军事行动成为俄罗斯在安全困境中“破局”的终极尝试。俄罗斯的意图在于凭借军事胁迫手段，强行改写欧洲安全秩序的底层逻辑，迫使西方承认其核心安全关切。这一战略选择恰恰印证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悲剧性命题：当两种截然对立的秩序观无法通过谈判磋商达成调和，军事冲突便成为秩序之争的终极表现形态，而欧洲也由此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之中。

二、俄乌冲突：欧洲的战略失误与危机走向

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欧盟联手美国对俄罗斯祭出多轮极限经济制裁，从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重维度加紧援助乌克兰，同时通过出台相应的周边政策，同俄罗斯争夺欧亚地区相关国家。此举不仅清晰地袒露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鲜明立场，更凸显其号称“战略自主”的实际运作能力存在显著短板。长期以来，欧盟将自身定位为“规范性力量”，在对外战略中优先强调法律、多边主义和市场一体化理念，而轻视硬实力的建构与运用。这种理念深刻主导了其俄乌冲突的整体策略框架。然而，欧盟围绕这场冲突所采取的多维度举措，其固有局限性日益凸显。

（一）极限制裁未达预期

欧盟对俄制裁的本质，是其“规范性力量”的自我定位与地缘政治现实碰撞的集中体现。这种以法治化、多边化制裁为核心的应对策略，暗藏三重预设目标：通过制裁彰显联盟内部团结，进而强化自身行动的外部合法性，削弱俄罗斯持续军事作战能力，重创其能源主导型经济根基，最终达成迫使俄罗斯“战略屈服”的核心政治诉求。^①但随着乌克兰战事陷入长期延宕，“制裁很难削弱俄罗斯国力”，而“制裁可作为达成和平协议的筹码”正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②为强化制裁效力，欧盟进一步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裁强制执行体系，涵盖法律框架、监管机构、技术手段和国际协作等关键领域，惩罚俄罗斯已经成为当前欧盟推进对俄政策的首要目标，甚至构成了其相关行动的合法性根基。

截至 2025 年 12 月，欧盟已单独发起 19 轮制裁，新增 69 项单独制裁，涵盖个人、实体和运输工具。但欧委会官员就“对俄制裁已达天花板”的内部表态揭示出其战略工具的边际效用已经耗尽。^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俄罗斯经济萎缩 2.2%；2023 年实现 3.6% 的增长；2024 年增长 4.3%，2025 年预计增长 0.6%，2026 年为 1%。^④美国财政部援引的事实证实，尽管西方对俄制裁确实压低了 5% 的经济增速，但显然制裁并未达到预期目标。^⑤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直言，欧盟对俄制裁“用了 19 次，就是失败”。

① C. Portela, J. Kluge, “Slow-acting tools. Evaluating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after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rief 11, October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cmsdata/259033/Portela%20and%20Kluge%202022%20Brief_11_Sanctions%20\(002\).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cmsdata/259033/Portela%20and%20Kluge%202022%20Brief_11_Sanctions%20(002).pdf)

② “A Frozen Conflict: The Dilemmas of Seizing Russia’s Money for Ukrain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June 17, 2025,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aucasus/russia-internal-ukraine/frozen-conflict-dilemmas-seizing-russias-money-ukraine>

③ “EU reaches ceiling in issu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December 23, 2022, <https://report.az/en/other-countries/eu-reaches-ceiling-in-issue-of-sanctions-against-russia>

④ See “Global Economy in Flux: Prospects Remain Dim”, IMF, October 2025, p.13,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5/october/english/text.pdf>; “A Critical Juncture amid Policy Shifts”, IMF, April 2025, p.13,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5/april/english/text.pdf>; “Steady but Slow: Resilience amid Divergence”, IMF, April 2024, p.10,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english/text.pdf>

⑤ “Smart Take: Will the New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Make a Difference?” March 1, 202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microsite/3/node/118361>

西方对俄制裁之所以失效，具体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制裁逻辑与经济结构的错配。欧盟对俄制裁的核心矛盾在于，其试图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产业，恰是自身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所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前，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工业国家对俄天然气的依赖度超 60%。这种深度能源结构性依赖，使欧洲对俄能源“脱钩转型”陷入“成本-安全”悖论。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紧急寻找替代能源却引发天然气价格飙升，进而导致制造业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生产活动难以为继。^①尽管欧洲大幅削减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煤炭和石油，但欧洲在能源刚性需求下，仍然在 2024 年从俄罗斯购买了创纪录的 1780 万吨液化天然气。^②能源价格高企和供应不确定性，倒逼欧洲化工、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加速外移，钢铁与有色金属行业产能持续萎缩。这一趋势不仅削弱了欧洲本土的产业竞争力，更加剧了欧盟对相关产品的进口依赖，反而推高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风险。

相比之下，俄罗斯则通过三大反制机制消解能源制裁：一是打造由 650 艘老旧油轮组成的“影子船队”。该船队一度承担了俄罗斯对外原油出口 65% 的运输任务，通过“方便旗注册+船对船转运”的组合模式，规避国际监管。^③二是重构能源贸易版图，对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国实施折价销售以拓展市场。2024 年 12 月，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同印度信实工业签订史上最大能源贸易协议，约定未来 10 年向后者供应日均 50 万桶各类原油，年度交易规模约 130 亿美元。即便面临特朗普政府 50% 的惩罚性关税压力，印度 2025 年 11 月仍从俄罗斯进口 770 万吨石油，创下 2025 年 5 月以来的最高纪录。^④三是积极利用西方阵营内部监管漏洞。欧盟航运企业抛售的 230

① “What drives natural gas price volatility in Europe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uly 2025, <https://www.iea.org/commentaries/what-drives-natural-gas-price-volatility-in-europe-and-beyond>

② Ajit Niranjana, “European imports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from Russia at ‘record levels’” *the Guardian*, January 9,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5/jan/09/european-imports-of-liquefied-natural-gas-from-russia-at-record-levels>

③ Elisabeth Braw, “Russia’s shadow fleet is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Politico*, October 30,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ussia-shadow-fleet-oil-tankers-ships-accidents-ukraine-war-sanctions>

④ Piyush Aggarwai, “Despite US tariff threats, India’s Russian oil imports stayed high in 2025”, *India Today*, January 7, 2026, <https://www.indiatoday.in/diu/story/despite-us-tariff-threats-indias-russian-oil-imports-stayed-high-in-2025-2848265-2026-01-07>

艘旧船成为俄“影子船队”的核心运力，德国相关企业甚至借此获利约 2 亿欧元。^①正是这种“制裁者与被制裁者的利益共生格局”大幅消解了能源制裁的政策效用。

第二，欧盟对俄制裁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对俄制裁的正当性建立在“欧洲团结”这一价值共识之上，但制裁成本不均衡分摊的格局直接在成员国之间诱发了严重的分歧。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依赖与俄罗斯的能源与农产品贸易，意大利则因制造业对俄出口下滑承受了显著的经济冲击。上述国家均公开反对扩大制裁范围，这直接导致部分对俄制裁措施的效力被削弱。

而更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现有制裁框架缺乏“成本补偿”与“利益协调”等机制。能源转型成本主要由工业国承担，而中东欧国家则需直面地缘安全压力，这种“责任-权益”严重错配，催生了制裁执行过程中的“选择性遵守”现象。部分欧盟成员国通过简化海关查验流程、默许转口贸易等方式规避制裁约束，一些第三方中转国沦为西方商品流入俄罗斯的“灰色通道”，大量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通过多层贸易链条的伪装，持续输送至俄国防工业各领域。^②

第三，俄罗斯加速搭建“制裁免疫型”经济体系。面临美国和西方的多轮制裁，俄罗斯并未陷入被动承受困境，而是通过“制度-技术-外交”三位一体的反制与适配体系，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免疫”的战略转型。在制度层面，俄罗斯央行迅速出台资本管制、将关键利率临时上调至 20% 等紧急措施，稳定卢布汇率走势，并连续降息，确保俄罗斯经济在制裁环境下保持韧性与活力。^③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2023 年俄罗斯经常账户

① Jasper Steinlein, “European shipowners helped build Russia’s shadow fleet, investigation says”,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euractiv.com/news/european-shipowners-helped-build-russias-shadow-fleet-investigation-says>

② *Report on Product Compliance Controls in the EU Customs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p.12, <http://www.shturl.cc/d2b8048f43f12998d7a3ff1e00d45aacc>; “U.S. Continues to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Industrial Base and Target Third-Country Support with Nearly 300 New Sanctions”,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y 1, 202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318>

③ 朱海华、高思宇：“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博弈：策略、效果与启示”，《欧亚经济》，2024 年第 1 期，第 66-67 页。

盈余达 501 亿美元，2024 年经常账户盈余为 538 亿美元，2025 年前三季度为 323 亿美元，这为经济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①

在技术层面，俄罗斯加大了军工领域的技术投入，同时通过对外合作，从伊朗、土耳其等国获取无人机等装备，补齐部分装备短板。俄罗斯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的 2025 年至 2027 年预算文件显示，2025 年俄罗斯国防开支预计为 13.5 万亿卢布（约合 1450 亿美元），较 2024 年大幅提升 30%，占 GDP 的 6.3%。^②这笔预算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持续推进新型武器装备列装，提升俄罗斯国防技术领域的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生产。

在外交层面，俄罗斯依托“全球南方”构建反制裁协作网络，深化与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2024 年俄罗斯自欧盟的进口占比降至 33%，而同期自亚太地区的进口份额则上升至 43.6%，同金砖国家本币结算占比超 90%。^③俄罗斯借助欧亚经济联盟、金砖等机制，构建多元化的贸易与结算渠道，有效规避了制裁限制。这种适应性调整使得美西方对俄制裁的预期遏制效果与实际实施影响出现显著背离，制裁的威慑力与长期有效性被大幅削弱。

欧盟对俄制裁的系统性失效，反映的是单边制裁工具在多极化格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结构性失灵，折射出地缘经济与政治新趋势。第一，全球供应链的韧性诉求超越效率优先导向，对于具备多元供应来源的关键物资（如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单一国家或集团已难以彻底切断关键物资的多元供应链路。第二，欧盟所标榜的“规范性力量”显示出了局限性。欧盟试图以法治与多边主义为名推行地缘政治博弈之实，却因漠视各国发展权与安全关切而丧失正当性基础。第三，制裁的“双刃剑效应”持续凸显。欧盟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自身战略自主能力亦受到侵蚀——对美能源替代的依赖，军工生产能力的不足，最终使其在俄乌冲突进程中逐渐沦为被裹挟的参与者。

① Платежный балан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позиция и внешний долг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ата обновления данных: 30 декабря 2025 г. https://www.cbr.ru/statistics/macro_itm/external_sector/pb/p_balance

②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я тратит на военные расходы. 27 июня 2025 г. <https://tass.ru/politika/24376679>

③ Алина Наговицына. Нов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кспортно-импортных операций: масштаб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а рынках Востока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12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roscongress.org/materials/novaya-geografiya-rossiyskikh-eksportno-i-mportnykh-operatsiy-masshtaby-ekonomicheskogo-prisutstviya-/?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2F

值得关注的是，制裁的系统性失效非但没有推动欧盟转向务实理性的政策轨道，反而使其陷入“制裁内卷”的困局。欧盟对俄罗斯的第 19 轮制裁草案试图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更多第三国企业列入清单。这种加码式的制裁非但难以达到预期威慑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南方国家与西方阵营的对立分裂，加速推进全球多极化进程。从长远看，若欧盟无法突破“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桎梏，其所标榜的“战略自主力量”定位，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而俄罗斯所构建的“制裁免疫型”经贸体系，或将为其他遭受单边制裁的国家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范式。

（二）欧盟在美国联盟体系的边缘化

特朗普的连任及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构，构成了对后冷战时代跨大西洋联盟内在逻辑的根本性冲击，标志着以价值观共识与安全深度互嵌为基石的跨大西洋秩序进入解构期。^①特朗普新任期的对外政策转向，实质是美国“霸权护持”与“区域自主”两大战略诉求的内在碰撞，契合全球权力结构转型与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时代背景，而俄乌冲突则成为这场战略博弈的集中爆发点，将欧盟的政治脆弱性与深层次的战略困境推向了历史前台。

从 2025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议程始终贯穿着“战略收缩-重心转移”的核心逻辑。其核心要义在于摆脱欧洲、中东“非核心战略困境”的牵绊，将战略资源与政策注意力向西太平洋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场域倾斜。^②这种战略转向并非即兴之举，而是对全球权力分配格局深刻改变的系统性回应。随着多极化趋势的持续深化，美国已难以维系在全球所有关键区域的同等强度投入，不得不对自身战略的优先级进行重新梳理和排序。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北约峰会等多边场合，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明确释放信号：“乌克兰入约非优先事项”^③，“收复

① Rym Momtaz, “Five Pillars of Europe in the Second Trump Era”, October 15,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5/10/five-pillars-for-europe-in-the-second-trump-era?lang=en>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25, pp.1-4,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③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As Delivered)” February 12, 2025,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064113/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ukraine-defense-contact>

失地非美国要务”。^①这些言论绝非单纯的“甩锅抛责”，而是霸权国战略意图的清晰宣示。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已从冷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定位，实质性降格为服务于美国利益优先的“选择性合作框架”，欧洲必须尽快适应这一变化。^②

美国以 2025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顶层纲领，特朗普政府持续强化对西方盟友的战略捆绑。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施压等手段，从日本、韩国等亚太盟友处攫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以“责任分担”为名，倒逼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以此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进而构建起服务自身“霸权护持”目标的、更具依附性的同盟网络。在此过程中，欧盟的核心战略诉求被系统性忽视，最终沦为跨大西洋秩序转型中的“被动旁观者”，这种边缘化进程在俄乌冲突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隐性蛰伏到显性化的关键性转变。^③除此之外，欧洲还需应对特朗普版本的“美帝国主义”，并积极推进内部整合，凝聚战略共识，通过经济、外交甚至武力手段回应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觊觎。^④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推行的“最小化安全介入框架”实质上是一种“成本控制型”地缘战略模式，旨在通过管控冲突升级态势、推动区域性有限停火进程，将美国从欧洲安全事务的深度介入者转变为远程操控者，进而为聚焦对华战略竞争主战场腾挪资源。这一战略取向不仅直接撕裂了美欧长期以来的安全共识，更引发了西方联盟体系的结构性的裂痕。

欧盟虽以“战略自主”为旗帜，推出 8400 亿欧元的防务发展计划，力图彰显联盟层面的协同行动能力，然而这一举措未能突破其固有的制度性困

① Frank Gardner, “JD Vance’s blast at Europe ignores Ukraine and defence agenda”, February 15,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4g9nmeyzkjo>; Kathryn Armstrong, “‘No going into Nato by Ukraine,’ says Trump as Zelensky prepares for White House talks”, August 18, 2025,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m21j1ve817o>

② Giuseppe Spatafora, Steven Everts, Alice Ekman eds., “Low Trust: Navigating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under Trump 2.0”,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October 2025, pp.14-18,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2025-10/CP_18_7_0.pdf

③ Viktor Jakupec, “Marginalising the EU: Trump’s Diplomacy and the EU’s Strategic Failure”, in *The EU’s 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Ukraine War*, Springer Cham, 2025, pp.57-76.

④ Alexander Hurst, “Europe Must now Tell Trump that enough is enough – and cut all ties with the US”,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6/jan/14/europe-trump-democracy-violent-conquest-federalism>

境。^①一方面，欧盟的防务一体化长期受制于“主权让渡不足”与“成员国利益分化”的悖论，而东西欧之间、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又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统一行动的能力。^②在援乌实践中，欧洲各国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凸显。美军主战坦克系统仅有一种主力型号，而欧盟各国列装的主战坦克型号则有 17 种。美国援乌现役武器约有 30 多种，欧盟方面同类装备则达 178 种，欧盟种类数量约为美国的 5 倍。^③欧盟援乌装备体系的碎片化直接制约了援助效率，加上乌克兰近三分之二军事采购依赖美国的现实，使欧洲难以形成足以影响战局走向的军事投射能力。

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战争目标、和平条款、安全责任边界等核心议题上分歧越来越尖锐，这一裂痕深刻暴露了欧盟作为“战略行为体”的身份赤字。欧盟内部尚未就“胜利的定义”与“和平的形态”达成共识。东欧国家力主支持乌克兰收复全部领土的“全面胜利”方案，法德等西欧大国则倾向于以“阻止俄罗斯获胜”为核心的优先目标，而南欧国家更关切和平谈判的启动时机。这种认知和诉求的撕裂，直接导致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陷入“被动应对”的权宜困境，缺乏统一的长远战略规划作为支撑。^④特朗普抛出的停火草案，恰恰凸显欧盟战略凝聚力的缺失。这一草案的本质绝非单纯的冲突解决方案，更是对欧盟“集体意志”虚幻性的深刻揭示。

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绝非仅限于安全领域，而是呈现出多维扩散的态势。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俄直接谈判，将欧盟彻底排除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核心决策圈之外，这种典型的“越顶外交”深刻印证了欧盟在关键外交议程中缺席的政治现实。为彰显自身存在感和战略价值，欧盟选择以持续加码对俄制裁作为应对手段，但制裁政策引发的反噬效应使其陷入三重孤立的被动

① Agnia Grigas, “Europe has the resources to defend itself and back Ukraine against Russia”, the Atlantic Council, March 4,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europe-has-the-resources-to-defend-itself-and-back-ukraine-against-russia>

② Stephen Holmes, Ivan Krastev, *The light that failed: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Penguin Books, 2019, p.192.

③ John Detrixhe, “Europe dreams of a common military but has too many types of tanks”, July 21, 2022, <https://qz.com/1004687/eu-army-europe-dreams-of-a-common-military-but-has-too-many-types-of-tanks>

④ “EU Shifts Tone on Ukraine from ‘Winning the War’ to ‘Preventing Russia’s Victory’” December 20, 2024, <https://europe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news/eu-shifts-tone-on-ukraine-from-winning-the-war-to-preventing-russias-victory>

局面。

在政治上，欧盟与美国战略方向背离，跨大西洋联盟的共识基础进一步瓦解。在经济上，欧盟一方面因推行对华“去风险化”政策，被迫刻意与自己的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脱钩；另一方面，受对俄能源制裁的反噬，又承受了工业外迁与通胀压力加剧等多重冲击。在外交上，欧盟陷入与俄罗斯长期对峙僵局，却缺乏足以打破僵局的军事威慑力与独立外交杠杆。更严峻的是，欧盟的制裁体系已出现结构性漏洞。部分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允许第三方“灰色通道”的存在，放任商品经中转贸易流入俄罗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欧盟制裁一致性和可持续性的广泛质疑，进一步侵蚀了其对外政策的公信力。^①

特朗普政府的双边主义偏好体现在与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欧洲前沿国家单独构建的双边安全协议上，这更是对欧盟集体安全权威的直接冲击。美国刻意分化欧盟内部的团结与共识，精准利用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焦虑与利益分歧，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持续放大了欧盟内部既有的“新老欧洲”裂痕，以及东西欧国家在安全认知层面的根本性差异。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对俄罗斯持缓和立场的欧洲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曾经在美俄博弈背景下扮演缓冲地带的重要国家瑞典、芬兰等也加入了北约，这直接加剧了欧洲安全格局的失衡态势。^②与此同时，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带来的关税冲击，与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形成的双重压力，令欧盟深陷“军事投入与经济安全”的两难困境。多重危机的交织叠加，正持续侵蚀欧盟的内部凝聚力，使其一体化进程面临严峻的挑战。^③

欧盟当下的战略自主诉求属于“危机驱动型”的被动反应，而不是基于长远布局的主动战略谋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① Maria Demertzis. “The Limit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U sanctions on Russia”, November 14, 2023, <https://www.bruegel.org/comment/limits-effectiveness-eu-sanctions-russia>

^② 钟振明：“美俄战略稳定与欧洲安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43页。

^③ See Rosa Balfour, Sinan Ülgen,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24,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Geopolitics%20and%20Economic%20Statecraft%20in%20the%20European%20Union-2.pdf>

提出的防务重整计划、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推动的外交协同倡议，其核心动因都不是着眼于欧洲未来地缘地位的前瞻性建构，反而植根于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抛弃”的深层恐惧。这种被动性的特质使得欧盟的战略自主进程充满内在矛盾：一方面，欧盟试图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缺乏统一高效的防务指挥体系，也没有充足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欧盟渴望彰显自身独立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却在诸多国际关键议题的谈判中被边缘化，甚至面临内部成员国被迫“选边站”的潜在风险。

欧盟的战略自主推进，还受西方文明分裂的制约。美国将欧洲视为西方世界面临“文明衰退”风险的前沿地带，当跨大西洋联盟赖以维系的价值共识被“美国优先”的功利主义逻辑所侵蚀甚至取代时，欧盟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规范与领土完整”便失去了最核心的外部支撑，其自身的政治认同由此出现松动，最终陷入碎片化困境。^①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后最为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本有望成为凝聚西方阵营力量的契机，却最终沦为加速跨大西洋联盟瓦解的催化剂。这一进程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权力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那些依赖单一霸权国提供安全庇护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存续与发展必然遭遇根本性的结构性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时代走向终结的显性确认。而欧盟在全球地缘博弈中日趋边缘化，标志着战后大西洋秩序的历史拐点已然来临。当前，欧洲内部政治辩论的焦点已经从“是否需要战略自主”转向“能否真正实现战略自主”。这一议题转向的背后，是欧洲对自身综合实力与国际格局变化的清醒认知。欧盟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其能否弥合内部分歧、构建统一高效的防务与外交协同体系，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多极化世界中重新锚定自身角色——从霸权体系的依附者，转变为具有独立影响力的地缘政治一极。

（三）救援乌克兰的欧洲方案走向衰颓

俄乌冲突引发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标志着欧盟各成员国外交

^① Martin Zubko, “Selective adherence to EU values and the quest for external coherence: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Czechia, Hungary, and Norway Amid Russia’s war in Ukrai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5, Vol.33, No.1, pp.294-308.

政策的深刻变革。^①多数成员国之间已形成共识：对乌克兰政策的统一性，是衡量欧盟内部凝聚力与地缘政治分量的核心标尺。然而，欧盟碎片化的应对姿态不仅折射出欧洲安全秩序的历史性拐点，更暴露了一体化进程中“主权国家利益”与“超国家集体行动”的深层张力。这种张力在防务开支、援助共识、战略目标等关键领域集中凸显，最终致使欧盟对乌救援方案陷入系统性困境。

1. 欧盟内部分裂的制度化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欧盟成员国在对乌克兰政策上的分歧，从以往的隐性博弈彻底演变为显性的、公开的对抗。匈牙利、斯洛伐克、意大利、荷兰形成的“异议联盟”是相关成员国利用“主权否决权”这一制度工具，对欧盟超国家治理实施的反向制衡，深刻折射出欧洲一体化在安全领域存在的制度性短板。这类分裂绝非偶然的政策分歧，而是成员国层面的“经济实用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崛起”、“财政保守主义”倾向，与欧盟层面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多重碰撞。其背后潜藏着欧洲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核心悖论：一旦集体行动与成员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产生根本性冲突时，各国主权让渡的意愿将急剧消退。^②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反援助”立场颇具代表性。作为欧洲政坛唯一同时与普京和特朗普建立稳定外交联系的政要，其政策逻辑始终围绕经济安全优先的原则展开。在他看来，俄乌冲突的延宕将摧毁欧洲经济稳定。基于此，他两度试图否决欧盟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方案，并持续阻止乌克兰与欧盟的深度融合进程。^③这种姿态是对欧盟“价值观至上”外

①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曾用“时代转折”（Zeitenwende）一词来描述他对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全面改革。这一概念后被引申为欧洲各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理念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See Heidi Maurer, Kolja Raube, Richard G. Whitman, “Zeitenwende as coming of age? EU Foreign & Security policy through war & peace”, 2024, Vol.33, No.3, pp.345-363; Tobias Bunde, “Zeitenwende as a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Crisis: Germany and the travails of adaptation after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5, Vol.27, No.4, pp.1223-1246.

② Maarten Rothman, Lonkeke Peperkamp, Sebastiaan Rietjens, *Reflections on the Russia-Ukraine War*,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351-364.

③ Nicholas Vinocur, “Hungary plans new anti-Ukraine bloc with Czechia, Slovakia”, *Politico*, October 28,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hungary-anti-ukraine-bloc-czechia-slovakia-viktor-orban-andrej-babis-robot-fico>

交导向的实用主义反叛。

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Robert Fico）的政策转向，则进一步将这种反叛推向区域联动层面。菲佐不仅叫停了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明确反对在对俄制裁事项上加码，甚至将俄乌冲突定位为“斯拉夫人的自相残杀”。^①其主张的背后，是中欧地区民粹主义势力对民众普遍存在的“战争疲劳感”与“经济焦虑”的精准政治动员。^②这种以“国家主权”和“民生利益”为旗帜的对抗性姿态，既击中了欧盟对俄制裁政策引发的反噬效应，更深刻暴露了欧盟在协调成员国多元利益诉求时的制度性短板与执行力困境。

意大利与荷兰的异议，则展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复杂维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的核心困境在于执政联盟内在立场的撕裂。梅洛尼本人坚持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但联盟内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领导的联盟党等右翼力量素来秉持亲俄倾向。加上意大利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长期对乌克兰的援助缺乏相应的国内民意支撑。这些因素叠加，最终导致意大利拒绝加入对乌武器援助的“意愿联盟”，转而主张通过联合国和北约框架协调乌克兰事务。

荷兰反对态度的核心，在于对财政主权的维护。荷兰议会通过非约束性动议，明确否决欧盟放宽财政规则以扩充防务开支的提案，凸显财政保守主义对“集中化军事开支”模式的坚决抵制。正如荷兰政府高官所警示，荷兰政府 2026 年财政支出将再次“触及法定上限”。^③在各国普遍面临能源、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经济压力的背景下，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外部冲突，显然与成员国以国内经济复苏、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短期优先事项形成冲突。

匈牙利、斯洛伐克、意大利与荷兰这四个国家的联合抵制，暴露了欧盟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致命缺陷。该机制长期沿用的“全体一致原则”，赋

① “Fico’s warning to Brussels prompts warm praise from Lavrov”, *The Slovak Spectator*, October 11, 2024, <https://spectator.sme.sk/politics-and-society/c/ficos-warning-to-brussels-prompts-warm-praise-from-lavrov>

② Sonya Bandouil, “Slovak PM Fico calls for end to Ukraine war and ‘Slavs killing each other,’ rejects focus on defeating Russia”, October 6, 2025, <https://kyivindependent.com/slovak-pm-fico-calls-for-end-to-ukraine-war-and-slavs-killing-each-other-rejects-focus-on-defeating-russia>

③ “Dutch government commits 700m Euros to Ukraine from unspent budgets”,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dutchnews.nl/2025/12/dutch-government-commits-e700m-to-ukraine-from-unspent-budgets>

予成员国强大的否决杠杆，使其得以将本国利益凌驾于欧盟超国家战略之上。尽管法、德与中东欧多数国家仍坚守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但异议联盟的存在，已经让欧盟对乌援助、对俄制裁的决策流程持续陷入阻滞和内耗，政策落地效率大打折扣。更深远影响是，这种制度化分裂正在悄然重构欧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在这种态势下，当部分成员国意识到公开反对欧盟政策既能收割国内民意支持、又能获取外部战略博弈筹码时，大概率会引发示范效应，推动更多国家加入异议阵营，或导致欧盟对俄统一战线的彻底崩塌。

2. 援乌“意愿联盟”幻象的破灭

面对欧盟内部的立场分歧，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可被视为欧盟对乌政策的一种“替代性方案”。这一游离于北约和欧盟框架之外的松散合作机制是欧盟核心成员国为绕开欧盟集体决策僵局、维持对乌影响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该联盟自诞生之初便缺乏三个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的实质性支持欠缺，成员国政治意愿不足，军事经济资源匮乏。这些硬伤注定其难以摆脱走向瓦解的命运。

“意愿联盟”面临的首个困境在于其合法性与凝聚力双重缺失。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这一倡议起初获得部分西方国家的响应，但意大利、波兰等国的相继退出，暴露了“意愿联盟”缺乏制度性约束，参与国家可以完全基于自身利益自由进退。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明确拒绝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波兰担忧在乌驻军会削弱本国防务力量，西班牙、德国等国则始终持观望态度，这种基于本国利益诉求的差异化立场，使得联盟从始至终无法形成协同一致的行动能力。此外，美国的冷淡立场削弱了该联盟的战略基础。没有美国的军事庇护与财政支持，欧盟成员国既缺乏有效抵御俄罗斯军事反制的硬实力，也没有充足的资源维系对乌长期援助。这一联盟最终只能沦为了一场缺乏实质性意义的象征性政治姿态。

“意愿联盟”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目标定位模糊与风险管控失控的双重悖论。从最初聚焦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到提出“空中保护计划”，再到更名为“安抚部队”、“重振信心部队”——英法两国的核心构想几经调整，折射出他们在“援助乌克兰”与“规避直接卷入冲突”之间的持续权衡困境。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境部署部队，以提供“长期支持”，并声称若俄方发起攻击，“意愿联盟”可实施“协同回应”。^①这一表述暴露了联盟的致命风险：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都可能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可能，进而将欧盟成员国直接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态，将任何进入乌克兰的西方驻军视为“敌对力量”。^②而欧盟成员国既缺乏协同作战的军事准备，也未形成应对冲突升级的政治共识。这种既要彰显对乌支持姿态、又要规避直接卷入风险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联盟提出的各项提案均沦为缺乏可操作性的空想。

“意愿联盟”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手段工具单一化。受制于军事投射能力与财政支撑力度的匮乏，对俄制裁成为该联盟为数不多的政策工具，但欧盟既有制裁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已经导致了制裁效果的大打折扣。“意愿联盟”的问题实际上是欧盟战略自主抱负遭遇的困境。这证明在缺乏美国实质性支持、内部难以凝聚共识的情况下，欧盟既无力主导地区危机解决进程的能力，也无法搭建起一套切实有效的替代性安全架构。

3. 欧盟对乌援助方案走向衰颓

欧盟对乌援助方案的颓势在乌克兰的外交战略转向中暴露无遗。泽连斯基政府的外交运筹，始终以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牺牲品为核心导向，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初期，乌克兰政府通过对比欧美对乌援助的节奏与力度，明确将美国界定为对乌援助的“主要响应方”，既向欧盟施压以凸显其内部分歧，又强化与美国的绑定，避免欧盟以“援助者”身份主导乌克兰的未来。^③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泽连斯基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弄

① “What guarantees has Macron’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promised Ukraine?”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9/5/what-guarantees-has-macrons-coalition-of-the-willing-promised-ukraine>

②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 В. Захаровой в связи с планами ряда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й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ы. 8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71702; “Russia says foreign troops in Ukraine would be targets after UK and France pledge post-ceasefire deployment”, *Reuters*, January 8,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russia-says-foreign-troops-ukraine-would-be-targets-after-uk-france-pledge-post-2026-01-08>

③ Mykola Bieliesskov, “What is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ctually willing to do in Ukraine?” the Atlantic Council, September 9,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what-is-the-coalition-of-the-willing-actually-willing-to-do-in-ukraine>

清楚如何降低美俄直接接触中自己被出卖的风险，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达成有利于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和平方案的可能性。^①这不仅关乎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乌克兰战后重建。尽管泽连斯基政府并不信任特朗普及其团队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但乌克兰对欧盟的多番互动，目的在于推动乌克兰进入特朗普政府的视野，提升乌克兰在特朗普政府“俄乌和谈”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虽然泽连斯基政府被迫将更多的求援重心转向欧盟，但乌克兰始终对欧盟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关注其承诺的可靠性、兑现的时效与援助力度。

泽连斯基强调，欧洲的援乌承诺无法替代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将这两者区分为“不同性质的事务”。^②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或将进一步侵蚀乌克兰民众对欧盟及其机构治理效能的信任。^③乌克兰政府的外交策略从客观上质疑了欧盟“规范性力量”在援乌事务上的效能。欧盟虽以捍卫领土完整、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己任，然而在硬实力主导的地缘政治现实面前，其宣扬的规范理念与作出的援助承诺，终究难以转化为协助乌克兰抵御危机的有效战略资产。

另外，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与英国的重新定位，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边缘化。特朗普政府持续呼吁欧洲承担更多的北约防务责任。2025年北约海牙峰会正式通过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5%的新基准，成员国对此达成了共识并承诺落实。这一战略导向促使各国政府在财政分配上向防务领域倾斜，进而在对外援助等其他领域节省开支。2025年，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计划到2027年将英国的发展援助支出从占GDP比重的0.5%削减至0.3%，相关资金将优先保障国防开支提升的需求。^④德国是乌

① See Doug Klain, “Is Trump’s Ukraine Peace Doomed to Fail”, in George Spencer Terry ed., *Strategic Pathways to Ending the Russo-Ukrainian War*, Tartu: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25, pp.106-119.

② Sasha Vakulina, “Ukraine does not believe Europe ‘should replace the US’ in security guarantees, Zelenskyy says”, December 18,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2025/12/18/ukraine-does-not-believe-europe-should-replace-the-us-in-security-guarantees-zelenskyy-sai>

③ Olga Onuch, “Ukrainians’ Unwavering Path Toward the EU”, June 13, 2024, <https://carnegie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6/ukrainians-unwavering-path-toward-the-eu?lang=en>

④ “英国首相宣布将提升国防开支占比”，新华网，2025年2月25日，<https://www.news.cn/20250225/d1ca3b867bbe4329bcefb5590761af7c/c.html>

乌克兰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捐助国之一，2025 年将削减其整体援助预算近 10%。^①美国试图重新校准对乌克兰的承诺，调整战略投入。英国则在美欧关系之间保持摇摆姿态。这些外部环境变化，迫使欧盟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在全球权力结构深度转型的背景下，欧盟若无法解决内部制度裂痕、弥补战略能力赤字，不仅将丧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影响力，更可能动摇战后欧洲政治秩序的根基。乌克兰的自主外交选择是对欧盟战略效能不足的直接回应。而欧盟在援乌体系效能衰减的过程中暴露的内部分裂与政策犹豫，表明以当前形态存在的欧洲，尚不具备单独化解地缘政治复杂危机的能力。

欧盟对乌援助体系的衰颓并非偶然，而是制度缺陷、战略失焦与西方地缘政治身份边缘化共振下的必然结果。当成员国普遍将个体国家利益置于联盟集体行动逻辑之上，当所谓的替代合作机制沦为缺乏约束力的象征性姿态，当乌克兰被迫绕开欧盟转向美国寻求安全兜底，欧盟很难在乌克兰事务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其标榜的战略自主能力大打折扣。俄乌战事的长期延宕不仅将深刻重塑东欧地区的战后政治秩序，更将逼迫欧盟重新审视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定位：是继续沉溺于“规范性力量”的宏大叙事，还是直面现实、推动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这已经成为决定欧盟未来的选择题。

三、后和平时代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困境与前景

俄乌冲突的持续演进，正式宣告冷战后欧洲“冷和平时代”的终结，同时开启了全新的“后和平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特征并非战争的永续存在，而是“和平作为国际秩序默认状态”这一前提的彻底崩塌。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历史终结论”为意识形态支撑，形成了一种未经充分地地缘博弈的和平状态。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得欧洲安全秩序沦为北约与欧盟东扩的单向进程。俄罗斯虽被边缘化，却未被彻底排除在该秩序框架之外。这种和平形态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俄罗斯与美国、西方仅达成了停火层面的利益妥协，并未形成学界所称的“关系型和平”

^① Elizabeth Piper, Vitalii Hnidiy, “As US and European aid cuts deepen, Ukraine’s humanitarian lifelines fray”, July 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ukrainian-aid-projects-wither-western-funding-drops-2025-07-02>

(relational peace)，即缺乏基于互信的共同行为准则与身份认同。^①

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到2022年俄乌冲突的全面升级，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冷战后欧洲非关系型和平的破产。俄罗斯始终将后苏联空间界定为自身的“近外地区”，而欧盟与北约东扩则将该区域定义为西方阵营的“东部邻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叙事的激烈碰撞使东欧地区从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的缓冲地带转变为地缘博弈与文明对抗的“断层线”。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安全危机，既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与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结构性碰撞，又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的合法性危机。

俄罗斯以“反霸权”为旗帜挑战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而西方则以“主权平等”为原则捍卫既存秩序，双方差异极大的价值主张最终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陷入难以落实的困局。无论冲突最终走向何种结局，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抗都将持续数十年之久，这意味着“后和平时代”的欧洲安全博弈，其核心是一场关于秩序主导权与合法性的文明之争。^②“后和平时代”的欧洲安全命题是重构和平。它要求欧洲摒弃“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幻想，正视文明差异与权力博弈的现实逻辑。欧洲不应再追求“包容性秩序”的乌托邦，而是构建“排他性与稳定性相平衡”的务实性秩序架构。当前，美俄就乌克兰问题推进和谈的进程将不断缩小欧、乌双方的战略博弈空间。这一态势将为未来的欧洲安全秩序重建提供下列三种可能性。

（一）对抗性冷和平：“冻结冲突”的秩序陷阱

如果俄乌冲突最终以“冻结”状态收场，欧洲将陷入对抗性冷和平。这是一种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不稳定停火，绝非冲突的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境下，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去俄化”进程视为关乎自身生存的核心威胁，而西方则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界定为对现行秩序的根本性挑战，双方的威慑

^① 索德斯特伦 (Johanna Söderström) 对关系型和平的定义是：“关系型和平包含行为互动，其特征是互动双方之间的深思熟虑、非支配和合作；互动双方彼此认可和信任，并相信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合法伙伴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See Johanna Söderström, Malin Åkebo, Anna K Jarstad, “Friends, Fellows, and Foes: A New Framework for Studying Relational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1, Vol.23, No.3, pp.484-508.

^② Bryan Frederick et al., “Consequence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flict”, *RAND*, May 22,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3141-1.html

与反威慑行动将陷入螺旋式升级的恶性循环。这一情境的核心困局源自三个方面：第一，俄罗斯已经通过宪法程序将克里米亚和所占领的乌东四州纳入自己的领土范畴，完成占领领土的“合法化”建构。第二，乌克兰宪法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领土妥协，国内政治生态形成的刚性约束使任何包含领土让步的和平协议都丧失了现实可行性。第三，俄罗斯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有着“无缔约能力”（недоговороспособность）的认知定位，认定其不具备履行国际协议的完整资质。^①正如《明斯克协议》的实践所印证的，这种和平实质上是俄罗斯以和平谈判为幌子实施的战略拖延，旨在通过时间换空间，渐进式地瓦解乌克兰主权完整性与西方阵营的内部团结，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

欧盟已经充分意识到，后和平时期的安全不能仅依赖“惩罚性威慑”，而更强调“抵抗性韧性”。^②这种韧性建设要求欧盟通过系统性能力建设与全社会动员来降低冲突带来的冲击，并维持秩序的存续。当前，欧盟在推进防卫自主进程中做了不少努力。在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下，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将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 3% 以上，将资源重点投向无人机、网络安全、导弹防御等前沿防务领域，加速推进“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旨在达成军事力量的快速部署与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在经济上，欧盟着力构建“欧洲自主供应链体系”，通过产业布局调整与替代资源开发，逐步降低对俄罗斯能源与关键资源的直接依赖，强化经济领域的抗冲击韧性。在意识形态与认知领域，欧盟更加重视通过教育、媒体等多元渠道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集体认同，系统性应对俄罗斯发起的信息战与意识形态渗透。

欧洲“意愿联盟”针对美国 28 点对乌方案提出反提案，这是为设计俄乌冷和平框架而量身打造的，旨在将乌克兰转变为一个由类似北约的机构支

^① недоговор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是俄语中的法律术语，直译为“无缔约能力”，指主体因法律规定或事实状态无法独立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普京否定泽连斯基政府签署和平条约能力，并非单纯的法律争议，而是基于政治合法性质疑（泽连斯基任期已满）、法律障碍指认（乌克兰签署法令反对俄乌谈判）、外部操控指控（泽连斯基被俄罗斯视为“西方代理人”）和宪法限制论（乌克兰宪法禁止任何领土割让，泽连斯基政府难以确保俄乌协议生效）的综合战略立场。

^② Łukasz Maślanka, Piotr Szymański, “The Resili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in an era of multiple crises”, February 28, 2025, pp.1-11, 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OSW_Commentary_646_0.pdf

持的、长期对抗俄罗斯的武装前哨。^①欧盟依旧幻想通过武装乌克兰将其打造成欧洲东部边境对抗俄罗斯的一支强大力量，从而稳固战线，在保持对立同存的前提下维持欧洲的和平与安全。^②

这种对抗性冷和平的危险性远超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以相互确保摧毁为战略逻辑底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威慑平衡，冲突升级的可控性较强。而在对抗性冷和平的格局下，俄罗斯与西方的身份对立已经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竞争演变为文明维度的对抗。俄罗斯将自身定位为“欧亚文明”的守护者，以反西方霸权为旗帜，积极联合部分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反西方霸权联盟，冲突的不可控性和长期化特征更加明显。

（二）“边打边谈”的混合和平架构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格局长期依托北约与欧盟构建的双轨架构。但这种架构存在内生性缺陷。以军事同盟属性的北约，与以经济治理和政治整合为导向的欧盟，始终未能建立起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尤其在应对混合战争等新型安全威胁时，其治理效能明显存在短板。

若冲突长期以混合战争的形态演进，欧洲或将进入“混合性共存”的特殊状态。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战争的清晰界限将彻底模糊。在此框架下，俄罗斯将通过混合战争的模式，使用信息战、能源战、代理人冲突等非传统手段持续向西方阵营施压；而西方则以制裁、援助、军事威慑等方式予以回应；双方由此形成“非热战但非和平”的持续性对抗格局。^③而传统国际安全秩序中战争与和平的二元划分范式也将随之失效，和战并存的状态会推动欧洲安全秩序重构。

混合和平架构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现有国际秩序规则的适配性困境。传统国际法以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二元划分为基础，而混合战争的未公开

^① Jarold McWilliams, “Europe’s 19-Point Plan Is a Fantasy. Trump’s 28-Point Deal Is Only Half a Solution”, November 26, 2025,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peace-proposals-mcwilliams>

^② “How Europe hopes to turn Ukraine into a ‘steel porcupine’” April 7, 2025,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5/04/06/how-europe-hopes-to-turn-ukraine-into-a-steel-porcupine>

^③ Andriy Tyushka, “Weaponizing narrative: Russia contesting Europe’s liberal identity, power and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2, Vol.30, No.1, pp.115-135.

宣战、行动隐蔽的核心特征，会直接导致现有规则体系难以对冲突的性质作出清晰的界定。俄罗斯否认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将其界定为“特别军事行动”，这使得西方难以将对俄制裁升级至与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层级。乌克兰陷入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交织的困境，既需要抵御常规军事进攻，又不得不对网络攻击、能源封锁、信息渗透等混合手段的冲击。这种规则真空会使欧洲安全落入失序的困境。欧盟的经济制裁、能源管控等非军事对抗与北约的集体防御军事工具，缺乏制度化协同机制，又难以形成应对合力。同时，欧洲成员国因自身利益诉求差异而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分化（如匈牙利对俄妥协、波兰强硬反俄），使西方始终无法形成统一、持续的反制战略。

后和平时代的欧洲安全秩序重构，需要构建多层次的网络型协调架构。从当前实践来看，这一架构正在逐步成型。第一，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崛起正在逐步凸显自身作为全欧洲政治协调平台的功能价值，甚至有取代欧安组织核心协调功能的趋势。^①第二，欧安组织虽然影响力有所弱化，但仍作为欧俄之间的跨阵营对话渠道，在危机管控、信任构建等低敏感领域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②第三，欧盟内部双边与小多边合作持续深化。英、法、德等核心国家防卫合作加强，东欧双多边合作机制深化，各国整合区域资源共同应对危机。而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签订的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将对相关国家的援助从短期应急性支持转向制度化、长期性的安全保障承诺。^③最后，欧盟正在积极推动北约战略转型，促使其从传统集体防御向集体威慑导向转

① 参见赵晨：“地缘政治变局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缘起、功能与困境”，《当代世界》，2025 年第 9 期，第 52-58 页。

② Maria Branea, “Workshop report: The OSCE and its role in strengthening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July 2024, pp.2-17, <https://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4/08/ELN-OSCE-workshop-report-July-2024-2.pdf>

③ 除了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外，欧洲核心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激活并推动东欧次地区机制发展，如魏玛三角（法国、德国、波兰）、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卢布林三角（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东欧国家次区域机制活跃，如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北极理事会、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等。2025 年 5 月，法国与波兰签署了《法波友好条约》，条约包含共同防御条款，旨在加强两国在防务、能源方面的合作；2025 年 7 月上旬，英法签署了《诺斯伍德宣言》（*The Northwood Declaration*），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的核威慑力量展开协调。2025 年 7 月 17 日，英法签署了《肯辛顿条约》（*Kensington Treaty*），承诺在遭受武装攻击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联合研发射程 2000 公里的远程导弹。

变，强化对混合战争手段的预判、应对与反制能力。^①这种混合型和平仅能降低冲突升级风险，并不能彻底化解欧俄之间的结构性分歧。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的国内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叠加“去西方化”社会动员与舆论引导，国内社会已经形成了关于战争常态化的集体认知。这种集体心理将进一步固化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姿态。短期内，欧俄混合性共存的对抗性底色将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变。

（三）“去俄化”泛欧安全架构：秩序重构的激进路径

若乌克兰在冲突中实现战略目标，欧洲或将迎来“去俄化安全共同体”的系统性重构。这并非单纯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安全框架之外，而是将其角色从“秩序参与者”转变为需严加防范的最大“外部威胁”，进而重塑欧洲安全架构。

“去俄化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逻辑，源于俄罗斯自身对既有欧洲安全秩序的系统性背离。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条约》《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等核心军控协议，脱离了欧洲人权法院、欧安组织议会大会等重要国际多边机构，这一系列举措已经违背赫尔辛基十项原则等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准则，作为欧洲秩序参与者的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动摇。与此同时，后苏联空间的“去俄化”趋势持续演进：亚美尼亚向西方靠拢，中亚国家深化与其他大国合作，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则坚定推进入欧进程，俄罗斯传统地缘势力范围不断萎缩。这一系列态势为“去俄化”安全秩序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

不过，这一激进的秩序重构路径也面临双重严峻挑战。一是安全困境的反向激化风险。若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的长期威胁，极易刺激其采取更为激进的反制措施，甚至可能引发核威慑姿态的升级、强化地缘政治同盟联动等连锁反应。二是欧洲内部的战略整合难题。德国、法国等西欧核心国家，历来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包容态度和对话策略，避免被外部势力裹挟而陷入阵营对抗。而中东欧国家则基于自身地缘安全考量，坚持强硬反俄。这种深层战略分歧，极有可能导致秩序重构进程陷入内部分裂。由此可见，“去俄化安

^①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January 10, 2023, <https://www.nato.int/en/about-us/official-texts-and-resources/official-texts/2023/01/10/joint-declaration-on-eu-nato-cooperation>

全共同体”的构建并非绝对排斥欧洲安全秩序的俄罗斯因素，而是在不断弱化并消解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秩序影响力的同时，建立最低限度的危机管控与沟通机制，防止地缘对抗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

四、结 论

过去三十年欧洲安全秩序的演进，实质是欧洲对俄罗斯问题的认知迭代与战略调适过程，其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为三个递进式阶段：第一阶段是植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逻辑的乐观预期。欧洲安全秩序的设计者试图将俄罗斯纳入基于以西方规则为内核的多边框架，却忽视了双方在权力结构格局与安全认知范式上的深层分歧。这一阶段的理论症结在于自由主义对“共有规范”的过度迷信，而严重低估了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权力竞争本质。随后的第二阶段，欧洲进入对俄罗斯进行再认识与战略调试阶段。欧洲逐渐承认俄罗斯作为“特殊安全行为体”的地缘存在，却始终未能挣脱“安全困境”的桎梏。欧盟与北约的制度性东扩进程与俄罗斯对地缘战略缓冲带的核心安全诉求形成尖锐的结构性对立。这一阶段的战略调试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与持续升级而走向终结。

当前，欧洲正步入直面俄罗斯问题的战略抉择阶段，而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已经成为推动欧洲安全架构加速向“无俄化”转变的催化剂。这一转变并非欧洲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安全环境演变的必然产物。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安全秩序赖以存续的“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等核心规范，使得建构包含俄罗斯在内的地区安全架构丧失了规范基础与现实可行性。在此背景下，欧盟与北约的合作也从功能性协作迈向深度协同。而欧盟自身“硬实力”的提升与防务一体化的推进，则标志着欧洲正从传统的“规范性力量”向兼具规范影响力与安全行动力的“安全治理者”的身份转型，并尝试通过践行“战略自主”破解对外部安全保障的路径依赖。

乌克兰、摩尔多瓦及部分南高加索国家渴求入欧的战略实践正深刻改变欧洲安全的地理边界与身份认同体系。这些国家正在脱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地缘体系，重构新的“安全身份”。对欧盟而言，承接这一进程的安全保障

责任，不仅需要修改甚至重构欧盟集体安全保障承诺，更需要以军事与物质能力为支撑，以应对战后可能出现的战略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源于权力真空、身份焦虑与潜在冲突后续衍生影响等多重叠加效应。在欧盟看来，唯有通过制度化保障与实质性支持，才能避免这些国家再度陷入灰色动荡地带，防止其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薄弱环节。

当前，乌克兰已与 30 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叠加 2024 年北约峰会通过的《乌克兰契约》（*Ukraine Compact*），共同构建起了一套多层次的威慑和保障体系。双边协议以一对一承诺形成了点式精准保障，多边契约则依托集体安全机制构建了面状协同支撑。乌克兰现已通过同欧盟成员国的制度性捆绑，有效锁定签署国的安全承诺，防范欧洲内部反对势力干扰引发的政策摇摆，为自己及相关国家的“入欧”进程筑牢安全缓冲。^①

展望未来，构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需要超越传统安全框架的固有局限。关于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构想，无论是基于俄乌双边协议的“最小化模式”，俄乌美“三方协调模式”，还是依托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体模式”，其核心诉求均指向安全议题的全面覆盖与安全主体的平等参与。这一架构必须同时容纳欧洲与俄罗斯两种不同范畴的安全秩序理念，方能为欧洲的“稳定和平”提供坚实保障。但从实践情况来看，欧盟当前将乌克兰及欧盟、北约东翼国家置于新安全架构的核心，并没有突破旧式欧洲安全架构。因此，新架构构建过程注定布满荆棘。它既要破解“无俄化”架构可能引发的俄罗斯更强硬反制，也要弥合欧洲内部在推进防务一体化、分担安全责任方面的深层分歧，更要平衡美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与欧洲战略自主的核心诉求。随着欧俄在安全秩序框架认知上的分歧持续深化，欧洲通过防务一体化与多层次安全协议磋商逐步积累起了足够的“安全自主能力”，加上边缘国家“脱俄入欧”的进程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惯性。构建一个不包含俄罗斯、但能有效对冲俄罗斯安全威胁的欧洲安全新秩序，已从欧盟的艰难选择转变为必然要求。21 世纪的欧洲安全秩序将陷入“难产”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宋羽竹）

^① See “Ukraine Compact”, July 12, 2024,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ukraine-compact-2024-07-12_en

国际组织

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 俄罗斯的立场选择逻辑*

李孝天 左凤荣**

【内容提要】深化经济合作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是最主要、最积极的引领者和贡献者。然而，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积极程度不如中国。对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如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支持力度还有明显的提升空间。俄罗斯的立场选择主要受其偏好和倾向的影响。其中，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框定了其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决定了其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中国倡议的具体立场。基于“安全优先、经济次之”的利益偏好，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不够积极，更倾向于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因为对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首要地位较为敏感，所以俄罗斯长期对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持有条件支持立场。对于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立场从有限支持逐渐转变为支持，但是实际支持力度还有待观察。中国需要正视这种情况并探索相应的调适路径，以便同俄罗斯进一步凝聚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共识，汇聚共建“繁荣发展的上合组织家园”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俄罗斯 立场选择 利益偏好 地位承认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1-0126(2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与‘上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2CGJ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李孝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成立以来，深化经济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议题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就务实合作而言，经济合作可与安全合作并重。2003年9月23日，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制定了经济合作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内，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定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必需的多边协议和各国的法律措施清单，建立和发展经贸投资信息空间，确定经贸合作优先领域和示范合作项目并付诸实施。中期内（即2010年之前），制定稳定、可预见且透明的规则和程序，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长期内（即2020年之前），最大效益地利用地区资源，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

2019年11月2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又通过了有效期为15年（2020年至2035年）的新版《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确定每5年为一个阶段，分近期、中期和远期实施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成员国间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

结合2003年版和2019年版《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内容来看，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深层次目标。2023年7月4日，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签署《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2025年9月1日，各成员国元首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重申，“支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深化合作，增进上合组织地区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继续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有关国家通过的《〈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行动计划》”。^①

在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果，法律基础与机制建设日益完善，成员国间相互贸易体量不断扩大，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稳中有进，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等新领域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国政府网，2025年9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8676.htm

合作方兴未艾，地方合作潜力越发凸显。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拓展和深化，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稳定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就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而言，中国是最积极的引领者和贡献者，提出了若干具体合作倡议，如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 and 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切实落地、走深走实，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大有裨益，但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实际支持。在“协商一致”决策程序下，每个成员国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实际立场都举足轻重，有时足以决定合作成败。

其中，俄罗斯所持的立场至关重要。作为引领上合组织发展的“两架马车”，中国和俄罗斯为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均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继续向好发展。不过，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积极程度明显不如中国，对中国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两大倡议的实际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立场选择逻辑，特别是对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两大倡议的立场选择。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俄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行为逻辑，期望能够为中国同俄罗斯进一步凝聚深化经济合作共识、汇聚共建“繁荣发展的上合组织家园”强大合力提供些许有益参考。

二、既有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大体而言，关于俄罗斯在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方面所持立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成果主要关注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有研究强调，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收益认知存在差异。由于中国未能准确认识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所预期的经济收益且它们对中国心存顾虑，故而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难以得到其他成员国（如俄罗斯）的实际支持。^①还有学者提出，虽然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

① 王维然、陈彤：“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回顾与反思：2003~2013”，《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6期，第49-54页。

体化已存在不少有利条件，但中国在该组织经贸合作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其他成员国同中国竞争的障碍。^①阻碍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俄罗斯同中国“争夺”合作主导权。^②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竞争”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形成严重掣肘。^③还有学者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因各国利益的差异加大了协调难度，制约了合作进程，多年来中方提出的建立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和开发银行等倡议一直未得到各方认可”。^④

另一类则侧重俄罗斯与中国对上合组织定位的差异。外界普遍认为，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发展方向上的主张有所不同。中国希望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可以走得更远；而俄罗斯更希望上合组织更多地发挥地缘政治和安全作用。根据这样的理解，有学者曾将上合组织的内部合作格局界定为“中国管经济、俄罗斯管安全”。^⑤而在这种定位不同的情况下，俄罗斯对中国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态度不够积极：一方面，俄罗斯更希望借助上合组织实现平衡美国的影响力、应对北约东扩、预防中亚地区出现“颜色革命”等地缘安全诉求，经济合作方面的诉求居于次位；另一方面，俄罗斯认为，中国主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会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并担心这不仅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构成挑战，还会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

① E. Sorhun, “The TTIP and the SCO in the Light of the Success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 Sorhun et al. ed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Hershey PA: IGI Global, 2014, p.287.

② 石杨：“上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浅析”，《商》，2016年第10期，第251页，第266页；A. E. Serikkaliyeva, N. A. Aldabek,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ASET*, 2012, Vol.6, No.11, pp.3187-3193.

③ E. Yildirimcakar, “The New Challenges of SCO and Turkey’s SCO Po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Local Studies*, 2019, Vol.2, No.2, pp.93-108.

④ 刘华芹：“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新征程”，《欧亚经济》，2025年第1期，第5-6页。

⑤ N. P. Contessi, “China, Russia,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SCO: A Tacit Deal Scenario”, *China and the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10, Vol.8, No.4, pp.101-123; Phunchok Stobdan, “India’s Accession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ugust 20, 2015,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indias-accession-to-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

冲击。^①

此外，围绕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倡议”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朱杰进和邹金水进行过专门研究。他们认为，美国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存在的威胁程度和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倡议”的网络效应，是影响俄罗斯制度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威胁程度增加的情况下，俄罗斯更倾向于以制度合作的心态对待“中国倡议”：针对网络效应低的银联体倡议和网络效应高的自贸区倡议，俄罗斯分别持“支持”和“有条件支持”态度。在美国威胁程度降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倾向于以制度竞争的思维对待“中国倡议”：针对网络效应低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网络效应高的开发银行倡议，俄罗斯分别持“有条件支持”和“不支持”态度。^②

客观而言，既有研究为理解俄罗斯为何对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持相对冷淡态度、为何对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中国倡议”持不同立场提供了有益参考，仅个别观点失之偏颇，如强调中俄两国“经济竞争”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形成严重掣肘。不过，既有研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学理化阐释不多。朱杰进、邹金水以美国霸权的威胁程度和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倡议”的网络效应来解释俄罗斯的制度行为选择，颇具学理性与启发性，但是其解释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关系大幅降温，美国霸权对俄罗斯的威胁明显加大。同时，已从阿富汗撤军的美国借助“C5+1”等机制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构成挑战。相比之下，中俄高水平伙伴关系继续向好发展。然而，俄罗斯始终没有实际支持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对于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立场从有限支持逐渐转变为支持。由此可见，美国霸权的威胁程度固然能对俄罗斯的相关

① 相关讨论可参考下列文献：A. Kazantsev,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6, pp.1079-1080; 须同凯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88页；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135-171页；曾向红、黄敬荣：“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俄在中亚地区互动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7-68页；吕萍：“俄罗斯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的看法与评价”，《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第55-63页。

② 朱杰进、邹金水：“对‘中国倡议’的不同反应——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国际制度行为选择”，《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3期，第54-79页。

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那只是间接的影响因素。“中国倡议”的网络效应同样如此。鉴于此，有必要从俄罗斯自身的偏好和倾向出发，发掘更直接相关的解释因素并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和俄罗斯对中国在该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作为解释因素，借此来分析俄罗斯在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上的立场选择，特别是俄罗斯对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 and 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两大倡议的立场选择。

三、利益偏好、地位承认与俄罗斯的立场选择：一个分析框架

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对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持何种立场，主要受自身偏好和倾向的影响。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框定了自身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决定了其对中国有关倡议的具体立场。

（一）利益偏好：框定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

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国家创立或加入国际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俄罗斯同样如此。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务实领域。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利益诉求和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排序情况，即何者是优先的“主要利益诉求”、何者是排在之后的“次要利益诉求”，集中反映了俄罗斯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虽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会受到包括国际规范、共同信仰等在内的“社会结构”的影响，^①但归根结底是根植于俄罗斯的核心和优先诉求的。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主要利益诉求”和“次要利益诉求”构成其“利益轮廓”（interest profile）^②，在具体情境下能够转化为对结果的特定偏好。换言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框定其“选择行为的结果排序”^③。

① [美]玛莎·芬尼莫尔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5页。此外，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将国际制度视为“社会环境”（social environments）。See A. I.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1, Vol.45, No.4, pp.487-515.

② M. Zürn, “Assessing State Preferences and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oice: The Case of Intra-German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7, Vol.41, No.2, p.301.

③ [德]维克多·J·范伯格著：《经济学中的规则 and 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例如优先支持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还是优先推动安全合作，优先支持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合作抑或优先促使上合组织发挥地缘安全作用。

在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情况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俄罗斯是否拥有可替代上合组织的“外部选项”（outside option）^①，即俄罗斯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对上合组织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自身主导的其他国际组织实现。其次，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程度变化，即外部威胁增大抑或减小。鉴于俄罗斯长期将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视作本国利益的延伸，这里提及的外部威胁不仅关涉俄罗斯自身面临的外部威胁程度如何，还涉及中亚地区面临的外部威胁程度如何。综合两方面因素来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可能呈现出四种情况：

第一，如果俄罗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没有“外部选项”，俄罗斯将非常重视借助上合组织实现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诉求，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主要取决于自身面临的外部威胁程度如何。当外部威胁增大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安全优先、经济次之”；当外部威胁减小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安全与经济并重”。第二，如果俄罗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拥有“外部选项”，那么它对上合组织能否实现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诉求的重视程度将变得有限，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亦取决于外部威胁的变化：当外部威胁增大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安全优先、经济次之”；当外部威胁减小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安全与经济并重”。第三，如果俄罗斯在安全领域拥有“外部选项”、在经济领域没有“外部选项”，无论外部威胁增大或减小，俄罗斯都将更加重视借助上合组织实现其经济利益诉求，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经济优先、安全次之”。第四，如果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拥有“外部选项”、在安全领域没有“外部选项”，无论外部威胁增大或减小，俄罗斯都将更加

^① 关于“外部选项”的讨论可参考下列文献：J. C. Morse, R.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 Vol.9, No.4, pp.385-412; 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81-109页；朱光胜、刘胜湘：“权力与制度的张力：美国国际制度策略的选择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2期，第62-63页。

重视借助上合组织实现安全利益诉求，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将趋于“安全优先、经济次之”。

“外部选项”和外部威胁能够塑造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将框定其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进而影响其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有关倡议持何种立场。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经济优先、安全次之”，那么它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将非常积极，会乐于支持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倡议。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与经济并重”，那么它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将比较积极，会倾向于支持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倡议。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优先、经济次之”，那么它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会趋于积极，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倡议的支持倾向会减少。

（二）地位承认：决定俄罗斯对中国有关倡议的具体立场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地位一般是指他者关于一国在其所属特定群体当中排位情况的集体认知，反映的是他者对于该国处于何种位置的共同认可。^①无论一国的综合实力如何，其都无法单方面获得国际地位，而是需要他者的地位承认。地位承认是指他者在言辞和行为上对一国提供标志着认可、尊重乃至是顺从的“地位象征”（*status symbols*）。^②例如，1971年10月25日，压倒性多数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其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便是对中国在联合国内部享有大国地位的公开承认。这意味着地位承认不限于强国承认弱国或守成国承认崛起国。另外，虽然地位承认主要发生在正式场景，但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隐晦的。例如，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后续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便象征着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

^① D. W. Larson, T. V. Paul, W.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 W. Larson, W.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7-9.

^② See D. W. Larson, T. V. Paul, W.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 W. Larson, W.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1-12; 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57页。

位并将中国与美国、苏联视为“战略三角”。^①

在奉行“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的上合组织内部，虽然全体成员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由于各国在能力、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各国的实际地位不尽相同。其中，中国和俄罗斯享有大致相当的“引领大国”地位，且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共同认可。不过，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地位已然有超过俄罗斯的趋势。特别是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有明显的优势。对俄罗斯而言，支持中国为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而提出的有关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接受中国引领相关合作进程，象征着俄罗斯隐晦地承认中国（可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因此，俄罗斯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中国倡议持何种立场。如果俄罗斯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那么它对中国有关倡议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如果俄罗斯不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那么它对中国有关倡议的支持力度会比较有限。

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俄罗斯与中国的实力关系主要反映两国的实力对比情况。如果与中国的实力相差无几，那么俄罗斯会在意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的首要地位，因为俄罗斯有能力获得与中国大致相当的重要地位；如果与中国的实力差距拉大，那么俄罗斯会更加在意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的首要地位，因为俄罗斯担心没有足够能力获得与中国大致相当的重要地位；如果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过大，那么俄罗斯不会太在意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的首要地位，因为它已然没有能力获得与中国大致相当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俄罗斯的地位认知，即俄罗斯对自己在上合组织内部应当享有何种地位的认识。如果俄罗斯认为自己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地位不应低于中国，那么俄罗斯不会倾向于承认中国在该组织内部享有首要地位；如果俄罗斯认为自己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地位可以低于中国，那么俄罗斯会倾向于承认中国

^① E.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6-200.

在该组织内部享有首要地位。实际上，无论中俄实力相差无几抑或两国实力差距拉大，俄罗斯都会在意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可能获得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因为高地位是稀缺的。追求高地位的动机往往兼具工具性和心理诉求，如获得更多话语权和特权，渴望荣耀和受到尊重，不愿意“低人一等”，摆脱因实力下降而产生的焦虑感或耻辱感。^①对于实力颇为强大且怀揣世界大国雄心的俄罗斯而言，接受自身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地位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满足其上述诉求，还意味着将更高的首要地位带来的益处“拱手让人”。也就是说，除非俄罗斯愿意接受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首要地位，否则它很难大力支持中国为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而提出的有关倡议，因为这种相对隐晦的地位承认带来的收益分配会更有利于被承认的中国。当然，这主要反映的是怀揣世界大国雄心的俄罗斯对自身地位颇为敏感，并不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位竞争，也不表示俄罗斯不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

大体而言，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框定了其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进而会影响其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有关倡议的整体态度。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对中国为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而提出的有关倡议持何种立场。在中俄高水平伙伴关系持续向好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宜也不会明确不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以此为前提，当俄罗斯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首要地位时，如果俄罗斯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是“经济优先、安全次之”，那么它会积极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与经济并重”或者“安全优先、经济次之”，那么它会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当俄罗斯不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

^① 关于国家为何追求国际地位可参考下列文献：J.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D. W. Larson, A.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M.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E. Côtz, “Status Matte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1, Vol.3, No.1, pp.228-247; 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6-139页；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02-130页。

首要地位时，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经济优先、安全次之”或者“安全与经济并重”，那么它会倾向于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如果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优先、经济次之”，那么它会有限支持或者有条件支持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概言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框定了“可能出现的可行结果的范围”，而它对中国在该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决定了“在此范围内的实际政策选择”^①。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与俄罗斯对中国在该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解释因素（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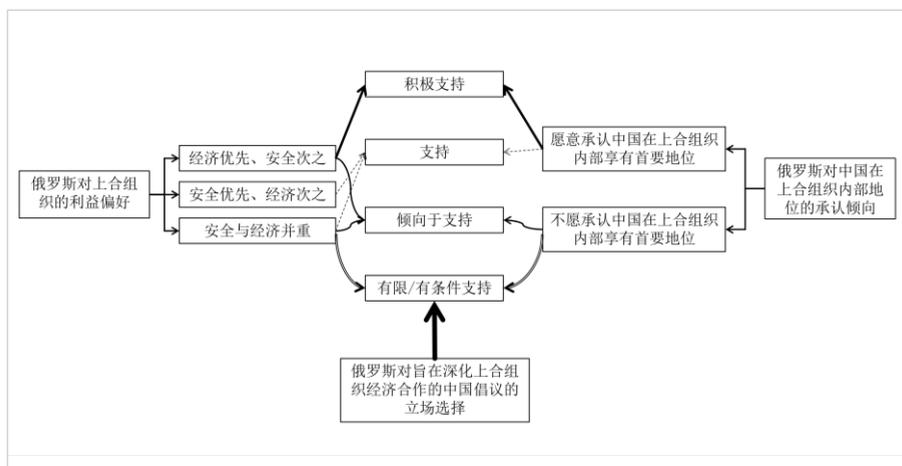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的立场选择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俄罗斯的立场选择逻辑及其表现

长期以来，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积极程度明显不如中国，其对中国提倡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整体把握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以及对中国在该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能够理解俄罗斯的立场选择逻辑。

^① H.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42.

（一）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

在俄罗斯的外交布局中，上合组织早已占据了稳定位置。俄罗斯官方对上合组织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对该组织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务实领域。早在上合组织发展初期，俄罗斯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便已基本形成。“9·11”事件、北约第二轮东扩、“郁金香革命”、安集延事件的陆续发生，对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外部威胁。考虑到独联体的作用日益衰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处于初创阶段，俄罗斯赋予上合组织以维护地缘安全的使命，重视借助有中国参加的上合组织实现打击“三股势力”、应对阿富汗问题、抵御北约东扩、防止中亚地区出现“颜色革命”等安全利益诉求。随着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在阿富汗驻扎、北约完成第三轮东扩并将乌克兰作为“候选成员国”，俄罗斯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消失，因而继续将上述诉求作为自己对上合组织的“主要利益诉求”。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利益诉求则是其对上合组织的“次要利益诉求”。虽然俄罗斯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支持加强多边经济合作；但是俄罗斯主张该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应放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等领域。对于推动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俄罗斯着力在其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推进相关合作。换言之，虽然俄罗斯愿意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但对推动该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持保留或不赞成态度”。^①这一时期，考虑到自身在保障地缘安全方面没有“外部选项”、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有“外部选项”，长期面临外部威胁的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优先、经济次之”。

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与西方关系明显降温的俄罗斯越来越重视借助有中国参加的上合组织服务本国的“东向战略”，以期实现平衡美国和北约在中亚的影响，防止中亚出现“颜色革命”，巩固本国在后苏联空间内的主导地位等地缘安全方面的“主要利益诉求”。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经济利益诉求仍然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等领域，对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依旧态度冷淡，鲜有实质性投入。2015年，俄罗斯主导建

^①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致力于推动该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成为俄罗斯深化多边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优先“外部选项”。

2017 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明确将俄罗斯和中国界定为威胁本国全球领导地位、侵蚀本国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①对两国发起了恶性战略竞争。这使得俄罗斯愈加希望上合组织发挥地缘安全作用，以期“借东制西”。^②2021 年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继续视俄罗斯为严重威胁，强调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构成挑战。^③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两国宏观战略层面的对立难以调和，导致相互制裁与强硬对抗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内容，^④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倾向愈加明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18, p.2,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Daniel R. Coats,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January 29, 2019,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2019-ATA-SFR---SSCI.pdf>

② 庞大鹏：“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政治研究》，2020 年第 2 辑，第 39-62 页；A. Sharshenova, G. Crawford, “Undermining Western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sia: China’s Countervailing Influences, Powers and Impact”,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7, Vol.36, No.4, p.455; M. Steven, M. Samarin, L. A. Way,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6: Pursuing Great Power Status”, *Asian Survey*, 2017, Vol.57, No.1, pp.93-95; N. Kuhrt, F. C. Buranelli,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7: Russia in Asia: Succumbing to China’s Embrace?” *Asian Survey*, 2018, Vol.58, No.1, p.56; S. Ü. Kocamaz, “The Rise of New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Russia, 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2019, Vol.16, No.61, pp.127-141; N. Swanström,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9: Relying on the Chinese Way”, *Asian Survey*, 2020, Vol.60, No.1, p.86.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23-4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④ 柳丰华：“俄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68-87 页；冯绍雷：“从特朗普到拜登：美俄关系新变化”，《当代世界》，2021 年第 2 期，第 12-17 页；张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3 期，第 25-36 页；孙成昊、郑乐峰：“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2 期，第 98-114 页。

显。^①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延续了对俄制裁。虽然美俄互动有所增加，且特朗普和普京于2025年8月15日在阿拉斯加进行了会晤，但是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国家关系实现根本性好转的前景并不乐观。^②在美国外部威胁依旧严重的形势下，俄罗斯强化了上合组织在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战略定位，^③借助该组织抵御和制衡美国的意愿更加强烈。这成为当前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主要利益诉求”。相比成员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显然无法成为俄罗斯实现地缘安全利益诉求的“外部选项”。就经济方面的“次要利益诉求”而言，俄罗斯将上合组织视作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计划的重要平台，^④积极推动以其为第三方制度平台的“一带一盟”对接以及“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协调发展。“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的实质是以俄罗斯为中心深化同其他欧亚国家的合作关系。^⑤在俄罗斯的战略构想中，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上合组织是有效补充。^⑥换言之，欧亚经济联盟仍是俄罗斯深化多边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优先“外部选项”。

① 冯玉军：“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流变、根源、功能及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2期，第106-124页。

② 张建：“特朗普2.0时代的美俄关系及其前景展望”，《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1期，第45-65页。

③ 李勇慧：“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再定位’”，《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38页。

④ 吕萍：“俄罗斯学界及媒体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最新评价”，载李进峰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1-283页。此外，2019年12月23日，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旁听了原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所作的题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中的作用》的讲座，诺罗夫也强调了俄罗斯欲借助上合组织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的意图。

⑤ 赵华胜：“中国与欧亚伙伴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27页。

⑥ M. Kaczmarek, “Non-Western Visions of Regionalism: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3, No.6, pp.1368-1370; M. A. Molchanov, “New Regionalism and Eurasia”, in Shiping Hu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s in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506-521; E. Vinokurov, A.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s: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Security in Eurasia”, in P. Dutkiewicz et al., eds., *Eurasia on the Edge: Managing Complexity*,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pp.35-52; A. Lukin, “Russian-Chinese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Idea of Greater Eurasia”, *India Quarterly*, 2019, Vol.75, No.1, pp.1-14.

在外部威胁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俄罗斯继续将抵御和制衡美国等国家的地缘安全利益诉求作为其对上合组织的“主要利益诉求”,加强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经济上的利益诉求仍是“次要利益诉求”。“安全优先、经济次之”的利益偏好框定了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积极程度不会高于安全合作,尤其是俄罗斯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有欧亚经济联盟这一优先“外部选项”。因此,俄罗斯不会太过积极地支持旨在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他国倡议。“安全优先、经济次之”的利益偏好使得俄罗斯的立场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俄罗斯始终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持开放立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俄罗斯对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相对冷淡,长期致力于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考虑到上合组织比欧亚经济联盟更加开放、更具“地区代表性”、更有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俄罗斯又非常重视推动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发展。

(二) 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

在上合组织内部,中国和俄罗斯都享有重要的“引领大国”地位。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由两国关系引入的新型合作理念,引领其他成员国同两国一道在上合组织中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伙伴关系网络,探索出“中俄引领、其他成员国平等决定”的“开放外溢”发展路径,不断扩大伙伴规模与合作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俄罗斯高度认可中国为促进上合组织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①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与该组织对接。2025年8月30日,普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对中俄关系表示高度赞赏。^②中俄两国长期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双方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树立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典范。两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均享有重要的

① “专访:中国为促进上合组织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访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表哈基莫夫”,中国政府网,2018年6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6/15/content_5298909.htm;“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年9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509/t20250902_1700238.shtml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新华网,2025年8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830/1592c4577f134f68a48bc6cd0ab63e99/c.html>

“引领大国”地位也是得到外界普遍认可的“常识”。因此，俄罗斯“没有理由”不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重要地位。

不过，受到两国实力关系和对自身地位认知的影响，俄罗斯对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首要地位心存顾虑。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与自身实力相近的中国同中亚国家联系日益紧密，在中亚的影响不断扩大，就已经引发了俄罗斯的疑虑。^①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为本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出于对中国可能威胁本国在中亚主导地位的顾虑，俄罗斯一度致力于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并防范中国。^②鉴于中亚是上合组织的地缘中心，中国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该组织和中亚的地位，同时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形成竞争。这不符合俄罗斯的预期，故俄罗斯对中国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该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态度较为消极。^③在怀有超级大国雄心的俄罗斯看来，本国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不容挑战，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地位不能明显低于中国。基于这种地位认知，俄罗斯姑且接受了外界所谓“中方管经济、俄方管安全”的地位承认。

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俄罗斯更多地将上合组织视作巩固本国在中亚影响力以及密切与中国关系的补充性机制。^④同时，俄罗斯也认为中国承认且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特殊地位”，所以逐渐接受了中国在中亚影响力持续上升的现实。^⑤然而，面对与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俄罗斯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过大会对自身

① E. B. Rumer, “China, Russ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entral Asia”, *Strategic Forum*, 2006, No.223, p.4; M. N. Katz, “Russi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oscow’s Lonely Road from Bishkek to Dushanbe”, *Asian Perspective*, 2008, Vol.32, No.3, p.185; A. Kazantsev,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6, pp.1079-1080.

② M. Kaczmarek, “Russia Attempts to Limit Chinese Influence by Promoting CSTO-SCO Cooperation”, *CACI Analyst*, October 17, 2007; A. Frost,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and Russia’s Strategic Goals in Central 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9, Vol.7, No.3, pp.83-102.

③ 赵华胜：“透析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20-22页。

④ W. Q. Song, “Interests, Power and China’s Difficult Gam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Vol.23, No.85, p.94.

⑤ M. Kaczmarek, *Russia-China in the Post-Crisis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5, p.93.

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形成冲击。虽然意识到无法阻止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合作关系,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借助上合组织限制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①俄罗斯大力支持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就有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考量。^②俄罗斯在扩员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亦有类似的战略考量。这一时期,俄罗斯开始将上合组织视作防止中国通过“一带一盟”对接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保持俄罗斯传统影响力的监督平台。^③

俄乌冲突爆发后,陷入战争泥潭且遭受西方严厉制裁的俄罗斯与和平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实力越来越不对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在惠及沿线国家的同时,进一步显露出俄罗斯在经济和国际影响方面相对于中国的劣势。“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发展对接,则强化了俄罗斯对其在该组织经济合作领域“失势”的担忧。在俄罗斯主导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中,自身应是欧亚地区的桥梁和中心国家。^④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不断提升,俄罗斯有可能逐渐沦为一些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的“小伙伴”(junior partner),^⑤即便两国之间的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这明显不符合俄罗斯的地位认知。

大体而言,中俄实力关系的变化,致使俄罗斯担忧中国在上合组织及其覆盖地区的地位超过自身。在俄罗斯看来,中俄(经济)实力的不平衡是一

① S. Erdoğan, “The Interac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vrasya Uluslararası Arastırmalar Dergisi*, 2018, Vol.6, No.15, p.941.

② 王佳、蒲玉琢:“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俄罗斯因素分析”,《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第80-81页;Salvatore Babones,“Why Is Democratic India Jo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nti-Western’ Club, the SCO?” November 29,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lvatorebabones/2017/11/29/why-is-democratic-india-joining-russia-and-chinas-anti-western-club-the-sco/#403bbec4cac7>; Yuan Jiang, “Russia’s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Inviting India to Balance China”, *The Diplomat*, January 23, 2020, pp.1-4,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russias-strategy-in-central-asia-inviting-india-to-balance-china/>

③ 吕萍:“俄罗斯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的看法与评价”,《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第55-63页。

④ M. Kaczmarek, “Non-western Visions of Regionalism: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3, No.6, p.1370; T. Bordachev, “Greater Eurasia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sian Politics & Policy*, 2018, Vol.10, No.4, p.599.

⑤ D. W. Larson, “An Equal Partnership of Unequals: China’s and Russia’s New Status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 Vol.57, No.5, p.803.

种挑战，^①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了一些挑战。^②俄罗斯政府常常对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感到担忧。^③因此，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持续深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越发在意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致使两国在多边合作中存在的认知差异突显出来。例如，围绕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俄罗斯不仅希望该组织发挥本不具备的地缘战略竞争功能，还不愿对推动该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投入太多。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并没有真正参加中方推动的互联互通项目”^④。对俄罗斯而言，大力支持中国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多或少意味着承认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首要地位。这种相对隐晦的地位承认，有利于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获得首要地位。届时，中国将获得首要地位附带的收益，中俄之间的实力和地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一言以蔽之，俄罗斯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享有与自身大致相当的重要地位，但不太愿意承认中国在该组织享有明显高于自身的首要地位。俄罗斯的这种地位承认倾向，决定了其很难大力支持中国为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而提出的重要倡议。

（三）俄罗斯在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 and 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倡议上的立场

受自身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以及对中国在该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影响，俄罗斯在深化与中国高水平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不时以“制度竞争”的态度对待中国提出的合作倡议。^⑤特别是在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方面，

① O. V. Grigorenko, D. A. Klyuchnikov, A. V. Gridchina, I. L. Litvinenkov, E. P. Kolpak,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in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6, Vol.6(SI), pp.256-260; J. L. Wils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China’s Silk 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hip”, in D. Lane ed., *The Eurasian Project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113-132.

② I. Yu. Zuenko, “China’s Activity in Central Asia in Light of Russian Interest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5, Vol.23, No.2, pp.146-164.

③ A. Lukin, D. Novikov, O. Puzanova, S. Yenikeef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midst the Rising International Tensi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25, Vol.16, No.2, p.175.

④ 孙壮志：“多边框架内的中俄战略协作：问题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第41页。

⑤ 顾炜：“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国际制度竞争策略的调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38页。

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一些倡议心有疑虑，且关注较少，实际支持和参与往往不够，^①其整体态度可谓“半心半意”。^②就深化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而言，俄罗斯更偏好欧亚经济联盟，对其的实际投入要远多于上合组织。整体来看，由于俄罗斯不太愿意承认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享有超过自身的首要地位，且对该组织的利益偏好是“安全优先、经济次之”，故俄罗斯对中国提倡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一直不够。俄罗斯对这两大“中国倡议”的具体立场如下：

为加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探索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方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2003 年 9 月 23 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第二次会晤上提出三点倡议。^③其中，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确定若干大的经济合作项目，顺利成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共识。^④但对于逐步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倡议，无论美国霸权的威胁是强或弱，俄罗斯都长期持保留或有条件支持的态度。

在 2010 年以前，俄罗斯的主要态度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俄罗斯不考虑与任何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⑤在 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批准俄罗斯加入之后，俄罗斯也并未改变此前的态度。例如，时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的伊戈尔·莫尔古洛夫（И. Моргулов）表示：“我想提醒大家，上合组织

① I. Facon, “Moscow’s Global Foreign and Security Strategy: Doe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eet Russian Interest?” *Asian Survey*, 2013, Vol.53, No.3, pp. 470-472; J. Schubert, D. Savkin, “Dubio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hy a China-Rus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Hard to Reach?”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16, Vol.2, No.4, pp.529-547; M. A. Molchanov,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CO”, in D. Lane, Guichang Zhu eds., *Changing Regional Alliances for China and the West*,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7, pp.133-150; J. Šćepanović, “Russi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Question of the Commitment Capacity”,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22, Vol.23, No.5, pp.712-734.

② 卢海清：“俄罗斯对独联体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比较”，《战略决策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70-80 页。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晤在京举行——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3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xgxw_683100/200309/t20030923_9388220.shtml

④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会晤联合公报》，2003 年 9 月 23 日，<http://chn.sectsc.org/documents>

⑤ 须同凯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7 页。

不是一个一体化联盟，自贸区也不在这个组织的议程上。”^①2017年12月1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Д. Медведе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原则上不排除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可能，但是需要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谈判。考虑到有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还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为达成自贸区协定，应当首先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达成共识。^②在卢金（А. Лукин）等俄罗斯学者看来，中国坚持为“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希望建立事实上的上合组织自贸区。^③近些年，中国不再明确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俄罗斯也一直没有明确支持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与对待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态度不同，俄罗斯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国签署自贸区协定。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后，有俄罗斯媒体强调，这对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甚至认为与中国在东亚合作无助于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④

为了深化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中国还提出了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10年11月25日，温家宝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研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探讨共同出资、共同收益的新方式，扩大本币结算合作。^⑤2011年11月7日，温家宝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第十次会议上再次陈述了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提议。^⑥2012年6月7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开发银行……推动贸易和投资

① “SCO Will Create No Free Trade Zone”, *Tengri News*, June 25, 2012, <https://en.tengrinews.kz/politicssub/sco-will-create-no-free-trade-zone-11046/>

②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здана зона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аявил Медведев. 1 декабря 2017 г. <https://ria.ru/20171201/1510028932.html>

③ A. Lukin, D. Novikov, O. Puzanova, S. Yenikayef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midst the Rising International Tensi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25, Vol.16, No.2, p.175.

④ 孙壮志：“多边框架内的中俄战略协作：问题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第41页。

⑤ “温家宝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议并讲话”，中国政府网，2010年11月26日，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0-11/26/content_1753763.htm

⑥ “温家宝再次提议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央视网，2011年11月8日，<http://news.cntv.cn/china/20111108/106995.shtml>

便利化”。^①2023 年 7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视频峰会上提出，要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份额。^②2024 年 7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提议，扩大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份额，积极推进筹建上合组织融资平台。^③2025 年 9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指出，要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④

对于中国提议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立场从有限支持逐渐转变为支持。例如，2012 年 6 月 25 日，时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在谈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前景时表示，“创建专门账户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计划与贸易自由化无关，但与在上合组织内建立金融支持机制的必要性有关”^⑤。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知名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 Габуев)则坦言，“俄罗斯一直阻止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成立，以期温和地限制中国向中亚地区的‘金融扩张’(financial expansion)”^⑥。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降温，这也促使俄罗斯对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立场开始转变。2014 年 7 月 31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创设项目融资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⑦2014 年 9 月 1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均表示，“为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发展基金(专

① “胡锦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 年 6 月 7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1206/t20120607_7945032.shtml

②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7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04_11107586.shtml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7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407/t20240704_11448356.shtml

④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5 年 9 月 1 日，http://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8631.html

⑤ “SCO Will Create No Free Trade Zone”, *Tengri News*, June 25, 2012, https://en.tengrinews.kz/politics_sub/sco-will-create-no-free-trade-zone-11046

⑥ Alexander Gabuev, “Taming the Dragon: How Can Russia Benefit from China’s Financial Ambitions in the SCO?”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19, 2015.

⑦ Россия предложила создать банк развития в рамках ШОС. 31 июля 2014 г. <http://s://lenta.ru/news/2014/07/31/shosbank>

门账户)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问题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责成继续努力以尽快完成这项工作”^①。2020年10月30日,俄罗斯副总理奥韦尔丘克(A. Оверчук)在上合组织银联体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上合组织银联体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在加强成员国金融领域合作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②。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面临着西方严厉的经济制裁。为减轻西方金融制裁的压力、抵御美国金融霸权的威胁,俄罗斯加大了对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就2023年中国又一次提出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方虽没明确表态,但对“落实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表示支持。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投资、银行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在相互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的工作必须继续落实,要“采取协调措施消除监管障碍,建立必要的支付基础设施,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③2024年7月4日,普京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上建议,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专属的支付结算机制。^④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西方持续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通过发展“战时经济”扛住制裁冲击,在满足“战争需求”的前提下推动再工业化复兴和经济结构转型,使得国民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实现超预期增长。^⑤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处于中心地位。西方孤立俄罗斯的努力仅仅凸显了俄罗斯作为非西方国家得以团结的关键支柱角色”^⑥。扛住西方经济制裁的压力,淡化了俄罗斯对自身与中国实力关系不平衡的担忧,增强了俄罗斯对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深化上合组织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2014年9月12日,<http://chn.sectsc.org/documents>

② Алексей Оверчук выступил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Межбанковск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30 октября 2020 г. <http://government.ru/news/40748>

③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4 июл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1578>

④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4 июл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4464>

⑤ 徐坡岭:“俄罗斯‘战时经济’:总体状况、增长逻辑及未来走势”,《俄罗斯学刊》,2025年第4期,第10-30页。

⑥ Fyodor Lukyanov, “Russia and China Anchor a New World Order Where the West is Optional”,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September 8, 2025,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cs-and-comments/comments/russia-and-china-anchor-a-new-world-order-where-the-west-is-optional/?sphrase_id=237272889

经济合作的信心。2025 年 6 月 3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俄方在内的与会各方均支持采取行动深化区域财金合作，在推进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25 年 8 月 15 日，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具有“破冰”意义的“阿拉斯加会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俄罗斯对西方外部威胁的感知，也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对中国有关倡议的支持意愿。2025 年 9 月 1 日，普京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表示：“我们主张发行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债券，建立本组织自己的支付结算和存管基础设施，组建联合投资项目银行。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有助于提高我们经济往来的效率，使其免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①当日，俄罗斯及其他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重申“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重要性，决定成立开发银行并就该金融机构运作的一系列问题加快磋商。”^②随着俄罗斯的立场从有限支持转变为支持，中国在十多年前提出的倡议终于要瓜熟蒂落。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有力地促进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不过，参考俄罗斯此前的立场和行为逻辑，其对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实际支持力度还有待观察。2025 年 9 月 5 日，普京在第十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表示，“正如我们一开始讨论双头鹰时所说的那样，也许我们的独特之处和力量在于我们不做选择，而是同时放眼两个方向”。^③这意味着，俄罗斯并未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关闭大门”，仍然坚持放眼东西两边的“双头鹰”战略。^④

五、结语

对于秉持“协商一致”决策原则的上合组织来说，深化经济合作、推动

①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1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891>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国政府网，2025 年 9 月 1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8676.htm

③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X Восточ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5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927>

④ Fyodor Lukyanov, “Russia and China Anchor a New World Order Where the West is Optional”,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September 8, 2025.

地区经济一体化，首先需要在成员国间达成共识。任何一国的不支持都有可能对合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鉴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异质性较强，为达成一致而进行充分的政治协调十分必要。然而，即便各国官方达成了基本共识，倘若不能消除部分成员国的疑虑，落实共识仍会受到掣肘。因此，如何减轻有关成员国的疑虑是关键。通过充分且持续的协调强化共识、在务实合作中更好地惠及有关各方，固然有益于推进合作，但是难以消除部分成员国对中国影响和地位持续上升的担忧。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中国提出有关倡议的立场选择便是典型案例。鉴于此，减轻俄罗斯的疑虑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不信任十分重要。^①中国有必要正视这种情况，推动上合组织遵循特定路径进行调适。

考虑到各成员国都有意愿深化经济合作，只是特定成员国对某一国引领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有所顾虑，可以在落实既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接合作。首先，由各成员国引领或者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等，与上合组织的地区定位契合程度较高，深化它们之间的对接合作符合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长远利益。其次，扩大和深化对接合作具备形成“多中心”合作格局的潜力。在此框架下深化经济合作，能够减轻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担忧或抵触。在合作的过程中，除中国外，兼具能力和意愿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可以尝试发挥“牵头”作用，即“多元引领”。如此既能照顾到更多成员国的诉求，又可减轻特定成员国对于某一国有可能“主导”合作的担忧，还能削弱一些成员国“搭便车”的倾向。这或许可以为落实中国有关倡议、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共建“繁荣发展的上合组织家园”提供些许助力，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当然，欲将设想成功转变为现实，需要完成诸多任务，如整合不同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协调各参与国的认知和诉求、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对接机制等。为此，有必要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 杨 辉）

^① W. C. Cha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Leading with Balance”, *The Chinese Economy*, 2021, Vol.55, No.4, pp.293-302.

Аннотации

Интервью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дискуссия о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и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м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Чжай Кунь, Бао Шэнъюн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ентябре 2022 года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 стало дисциплиной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в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что ознаменовало начал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этап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важной нов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и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добились значитель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дисциплины, развит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и создан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Серия интервью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углублённый диалог, посвящённый развитию дисциплины. Начиная с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создания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сследу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ая ценность эт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слу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траны и построении самобы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роль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 систем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и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тройной» путь построения, включающий с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подготовку кадров и развити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В ходе диалога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ся,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снованы на ценностях равенства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общим будущим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Также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слу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одейств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 инновациям, развитие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и воспитани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талантов, опираясь на опыт Институт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е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Разъясняются миссия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как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амобы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амобы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деи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о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Юй Бинь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чиная со второго срока Трампа, дискуссия 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е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 рамках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реализма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ась на Китае. «Теор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иршаймера возводит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гегемонию в Западной полушарии – узкий нарра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уникаль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ключая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и жестокое истребление, агрессию и грабёж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и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 в ранг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й аксиомы отношени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Эта «истина», наряду с либеральным тезисом о «конце истории», попадает в ловушку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расизма» – чрезмерного «теоретизирования» и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ре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о чём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ст Моргентау. «Теор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иршаймера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долгий мир»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ой биполя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конц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полностью игнорирует нормальные, равноправные, стабильные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труктурный реализм когда-то отдавал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биполярной систем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й реализм игнориру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траекторию Китая,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гармонии без единообразия» и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е без гегемонии», питая опас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мирного подъёма Китая. Серьёзно следует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и

это следствием под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то есть расовой) предвзят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ложного и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ющегося мира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й линей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Миршаймера — большая нация неизбежно стремится к гегемонии, а гегемония неизбежно ведёт к войне —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кардинально раз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двух сверхдержав: милитаризирова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США XXI века,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инициативе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к «одна бомба, один путь» и их политику «дон-ротшильдизма», направленную на разорение соседей, против масштаб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на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общим будущим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реде следует с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ю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подобной предвзятой и крайне пессим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За различными вариациями «ореола» западного реализма скрывается много нереалистичного и антиреалистич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мы не должны подменять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и глубо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упрощённым подход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иршаймер,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й реализм, культурный расизм

Влияние примен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Пан Сюнь, Цюй Минчжу

【Аннотация】 Все стороны, участвующ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широко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хнологи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ИИ) для сбора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едения войны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кибервойны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войны, расширив масштабы операций с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уши, моря и воздуха до незаметного цифрового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оля боя. Будучи первы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в котором все стороны широко применяют во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оказал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е влияние, чем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война. Он стал предвестником будущи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эпоху ИИ, показав, как н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ор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ют власт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повышают сложность и многомерность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И приводит к асимметр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ч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в виде сокраще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цикла, многомерной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и «проблем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сил», предупреждая крупные державы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множества элементов власти.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также расширяет поле боя от военных операций до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за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усиление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ценности и модел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сложность и далеко идущие масштабы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 эпоху ИИ. Наблюдая з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и вмешиваясь в него, крупные держав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планируют борьбу за власть в эпох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готовятся к сдвигу в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парадигме, а также проверяют и оценивают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риски различных новых влас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Эти действия приводят к провалу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блоков, движимых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 и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ласть,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исков

Вызов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Сунь Чао

【Аннотация】 Затяжной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не только глубоко обнажил присущую ЕС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ь между статусом «нормативной державы»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реалиями, но и ускорил е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в «военного игрока»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Европу». На фоне всё более напряжё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ША и ЕС из-з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кращения расходов США и снижения сплочённости внутри транс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ЕС, будучи приверженны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ограничен внутренним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м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и дефицитом потенциала. Внешне он глубоко погряз в тройственном затруднении: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ая помощь Украине и растущая маргинализация в системе альянса США.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мир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ж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по трё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й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гибрид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 «деру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панъевропей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ого, как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конфлик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ЕС и Россией вряд ли вернутся к состоян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здание н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ключающей российск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но сохраняющей миним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ризисами,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для ЕС из «сложного выбор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неизбежность», знаменуя собой формальное вступл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новый этап,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йс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ей,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м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жесткой сил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ранс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й альянс, европе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Углуб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логика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Ли Сяотянь, Цзо Фэнжун

【Аннотация】 Углуб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двигателем развит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и наиболее активным лидером и участником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днако энтузиазм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глуб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не так высок, как у Китая. У России ест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усиления поддерж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таких как создание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ШОС и банка развития ШОС.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её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ми и склонностям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определяют её общую позицию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глуб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тенденция России признавать статус Китая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определяет её конкретную позицию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глуб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ходя из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принцип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кономика во вторую очередь», Россия не проявляет особ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в углубле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и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предпочитая продвига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интеграцию в рамк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Кроме того, поскольку Россия опаса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усиления позиций Китая в ШОС, о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а условную позицию поддержки создания зоны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ШОС.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оздания банка развития ШОС,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изменилась от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к полной, но фак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поддержки ещё предстоит оценить. К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ямо взглянуть на эту ситуацию и изучи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пут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чтобы ещё больше укрепить консенсус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глуб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с Россией и объединить мощные си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процветающего и развивающегося дома ШОС».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ШОС, Россия, выбор позици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признание статуса

Abstracts

Interview on Discipline-Building of China'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A Discussion on Guiding Principles and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Zhai Kun, Bao Shengyong

【Abstract】 In September 2022,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was officially designated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under the categor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marking the entry of this strategically emerging field into a stage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relate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ross China have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disciplinary plan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think tanks. The interview on the discipline-building of China'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consists of in-depth dialogues center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Starting from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discussion explores the field's distinctive value in serving China's external strategy and in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interview analyzes the role and positioning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withi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think-tank system in the new era, highlighting its practical, policy-oriented nature (*jing shi zhi yong*) and advocating a "trinity" approach that advances discipline-build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ink-tank development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The interview emphasizes that China'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is grounded in th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rawing on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the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interview also examines how to balance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ies, promoting academic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disciplinary norms, and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t further clarifie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reatise: A Critique

Yu Bin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rump’s second term, debate ov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GPC) among America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ts has centered largely on China. Mearsheimer’s version of GPC theory, however, elevates Americ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 including its genocidal treat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ts sustained aggression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 into a universal model of great-power behavior. In doing so, it transforms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experience into a general la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ke the liberal “end of history” thesis, this grand theorizing risks falling into what Hans Morgenthau warned against: a form of “cultural racism” embedded in excessive theor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and civilizational diversity. Meanwhile, Mearsheimer’s framework chooses to skip the “long peace” of the late Cold War bipolar system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t also overlooks the normal, stabl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that have developed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hereas Waltzian structural realism recognized the stabilizing logic of bipolarity, the 21st century offensive realism turns blind eyes to China’s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practicing “harmony of differences” with its neighbors as a “benevolent hegemon”. One wonders if offensive realists’ persistent anxiety about China’s rise reflects a deep-seated “civilizational”, or racial, subconsciousness. In a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Mearsheimer’s central claim or solipsism – that great powers inevitably seek hegemony, making hegemonic war unavoidable – seems overly deterministic. It fail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ivergent strategic trajectories of the two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US militarized forever-war propensity now juxtaposed with a newly-coined “Donroe Doctrine”; on the other, China’s expan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these

reason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approach GPC theory with caution. Within the broader Western realist paradigm, elements that claim to be rigorously “realist” may in fact rest on historically narrow or normatively loaded assumptions. Common sense, careful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intellectual prudence are therefore essential when engaging with such theories.

【Key Wo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ohn J. Mearsheimer, Offensive Realism, Cultural Racism

Impacts of AI’s Involvement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ng Xun, Qu Mingzhu

【Abstract】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ve employ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on a large scale and in diverse ways for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drone warfare, cyber operations, and AI-enabled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campaigns, thereby extending the scope of operations from physical domains of sea, land, air, and space into less visible digital and informational battlefields. 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which belligerents have used AI-enabled military technologies at scal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far exceed those of a regional war. It has actually become a rehearsal for future geopolitical conflict scenarios in the age of AI, revealing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power relations and adding complexity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to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particular, AI introduces asymmetr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se are manifested in shortened innovation cycles, multidimensional contests over power, and a “synchronisation problem of power”, which warns that great powers must strive to couple and integrate diverse elements of power. AI’s involvement also expands the battlefield beyon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competition over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military empowerment, values, and governance models, demonstrating the complex and enduring space of great power rivalry in the AI era. By observing and intervening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reat powers are engaging in strategic planning for power competition in an intelligent age, preparing for shifts in competitive paradigms, in addition to testing, assessing

multiple risks associated with novel power relations, and taking actions that carry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ese action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al strategic deterrence, bloc formation driven by techno-nationalism,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reat Power Relations, Power, Global Risk Politic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Rebuild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ami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Sun Chao

【Abstract】 The protracte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not only laid bare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s identity as a “normative power” and geopolitical realities, but has also accelerated its transformation toward a “military actor” and a “geopolitical Europ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growing estrangement in U.S.-EU relations driven by the U.S.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nd a declining cohes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while striving to advance strategic autonomy, the EU remains constrained by internal divisions,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and capability shortfalls. Externally, it is caught in a triple dilemma: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s on Russia, insufficient capacity to sustain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deepening marginalisation within the U.S.-led alliance system. Looking ahead to a “post-peace era”,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may evolve along three possible trajectories: a “confrontational cold peace”, “hybrid coexistence”, and a “de-Russified pan-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gardless of how the conflict ultimately ends, EU-Russia relations are unlikely to return to a cooperative track.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excludes Russia from a leading role while retaining minimal crisis-management mechanisms is shifting from a “difficult choice” for the EU to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This marks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s entry into a new phase characterized by multipolar competition,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eturn of hard power.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Transatlantic Alliance, the EU-Russia Relations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The Logic behind Russia's Choice of Position

Li Xiaotian, Zuo Fengrong

【Abstract】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a key engin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proactive leader and contributor in this regard. However, Russia has been less enthusiastic than China about advancing the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arding Chinese proposal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 SCO free trade area (FTA) and creating an SCO development bank,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stronger Russian support. Russia's position is shaped primarily by its preferences and inclinations. Specifically, Russia's interest preferences regarding the SCO set the overall tone of its stance toward deepening the organis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On this basis, Russia's inclination to recognise China's status within the SCO determines its specific stance toward Chinese initiatives aimed at strengthening such cooperation. Guided by an interest preference of "security first, economy second", Russia is not sufficiently proactive in promoting deeper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ut instead tends to adva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Further, because Russia is sensitive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a may attain a pre-eminent position within the SCO, it has long adopted a position of conditional support for establishing an SCO FTA. As for creating an SCO development bank, Russia's stanc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limited support to support, though the extent of its practical backing remains to be seen. China needs to acknowledge this reality and explor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paths so as to further build consensus with Russia on deepening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o pool strong momentum for jointly building "a shared SCO hom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Russia, Position Choice, Interest Preference, Status Recognition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2 万-2.5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6年第1期(总第257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 元